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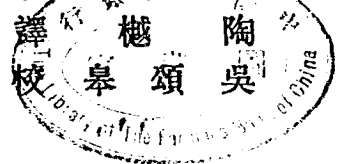
2



俄國現代史



By G. Vernadsk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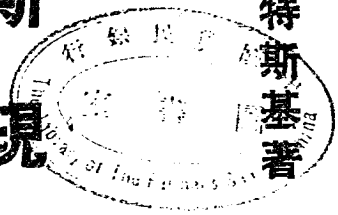
黎明書局版

館書

©

美國耶魯大學
佛那特斯基著
歷史特約研究員

俄
羅
斯
現
代
史



陶
越
譯
黎明書局
版

農民銀行圖書館
LIBRARY OF THE
FARMERS BANK OF CHINA



鍾敬之裝幀



吳序

外交評論社前已刊行第一種叢書——徐景薇所著非戰公約與世界和平，茲又將陶樹所譯俄羅斯現代史列爲叢書之二。陶君一面爲外交評論工作，一面又利用工作所餘的時間，譯成這樣的一本著作，獻給社會，這種刻苦耐勞的精神，殊值得我們的欽佩。就原著之內容言，固可謂「條理明晰」「敘述精確」；就譯者的文筆言，却也可算得「信達兼顧」「流利可誦」。陶君譯完以後，要我作一篇短序，代爲介紹，當然是我非常願意的事。

記得在十年以前，我同一位朋友談到中國青年的思想問題，他說國內思想界之紛亂原因

，固不止一端，但一般青年大都偏重主觀的想像，而忽視客觀的研究，要為原因之一，所以他以為要補救這種缺點，祇有提倡歷史的研究。我當時並不以為他的見解一定是對的，可是到現在迴想起來，恍然明白那位朋友所說的話，確不是「無的放矢」。誠以歷史的最大功用，不過把過去各種事實，加以系統的記載與說明，使我們得根據歷史的智識，瞭然於一切社會現象的變遷，自有其淵源所在，決不是憑空發生的。譬如甲國制度之形成，或是乙國革命的爆發，都是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原因，要不能以一個「原則」或是若干「定律」來解釋牠。所以歷史所供給我們的智識是實際的，不是幻想的；是有根據的，不是憑空捏造的。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在未曾得到某種事實之正確的智識以前，總不要妄加排斥或輕易相信，宛如新聞記者撰述評論一樣，在他對於某種事件，尚未得到相當的認識之先，最好不要貿然動筆，加以批評。這種態度不僅為治學的人所當有，就是要做個有智識的國民，也應該了解歷史的智識的重要。

可是我們一觀國內的情形如何？那些絕無半點歷史智識而侈談高深問題者，比比皆是，尤其可笑者，祇聽見人家開口革命，閉口主義，說得天花亂墜，娓娓動人；要是問他各國的

革命經過如何，所謂主義的來歷如何，其對於制度的影響又如何？則往往瞠目不知所答。然而這種好作幻想的智識分子，固儼然爲青年之導師，民衆之喉舌，隨時隨地，都能爲驚人的言論，惹起社會的注目，在此畸情形狀態之下，思想界安得不混亂，智識界又安得不日見墮落呢？

歷史的智識之被人輕視，其影響所及，足使社會受害於無形，誠如上文所言。此外尤有一端，不能不申述者，便是國人對於蘇俄認識之不足。蘇俄與我國的關係，非常重大，她在現代國際間佔着很重要的地位，這都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可是我真不明白爲什麼，蘇俄在我們人目光之中，依然是個神秘莫測的「啞謎」。崇拜她的視爲唯一的理想國；嫉視她的則把她看做洪水猛獸一樣的可怕，實則「理想國」也罷，「洪水猛獸」也罷，要是單單憑着「二人」的傳說，或是受着少數人的暗示，便於不知不覺之中，因一時的盲從，而成爲永久的偏見，這不但是不應該，且也未免不智了。須知蘇俄也是人類創造的和經營的國家，她既有她的特殊的制度，特殊的國情，則就一般通例而論，如欲明瞭其制度與國情，最不可缺少者，自然只有先從歷史方面着手，探究其過去的事實，才可明白她現在的情形。換言之，澈底了解蘇俄之

真相，固非由國內專家組織團體赴俄作長期之考察與調查不爲功，但就一般國民而言，要是關於蘇俄立國之普通史實，且猶茫然不知，則初步的認識，還沒有做倒，怎樣可以貿然的排斥蘇俄或是盲目的崇拜她贊美她呢？

雖然，歷史智識的灌輸，並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關於蘇俄歷史的介紹，其爲困難尤甚。我們所以挑選佛那特斯基所著俄國史，而商請陶君譯述者，祇因爲此書比較的敘述公允，比較的記載賅要之故。從史學的眼光看來，原著誠然不能認爲俄史中之唯一佳著，但經陶君細心編譯之後，我相信牠多少能引起國內智識界之注意，倘能藉本書之出版，而使國內有志之士，都能從歷史方面着手認識蘇俄與了解中俄，使蘇俄兩國間之友誼，因雙方國民的了解，而日益增進，這是我們所竭誠盼望的事。

民國廿二年四月

吳頌皋

譯者序

近年來我很想譯些比較真確可靠的史料出來，貢獻給社會上的一般讀者，因為我個人鑒於現今國內的出版界上，關於研究學理和討論問題的譯作，實已多過於歷史的譯作，其所以形成這樣一種的畸形的發展者，原因不外乎由於作者之好高騖遠與讀者之喜歡新奇的理論，而厭惡過去的事實所致。殊不知「今日」的一切事物，無不由「昨日」演化而來。如欲明白「明日」的事物，便非讀歷史不為功。蓋歷史所供給我們者，是一種過去的實際材料，其功用不僅使我們「溫故而知新」，且可使我們明白祇有歷史的事實，纔可以滿足人們的智識慾；也祇

有歷史的事實，纔可以掃除人們有時沉於幻想的危險。無論是對於政治或是社會問題，若不以歷史來解釋或不以歷史作研究的基礎，則結果縱不自欺欺人，至少在思想方面便會錯誤百出，引入歧途。這是一看近年來我國學術界上的許多矛盾現象，就可相信的。

我對於俄羅斯，向來具有深切的研究興趣，最先吳頌皋先生把耶魯大學特約歷史研究員佛那特斯基所著的俄國史 (*A History of Russia*) 介紹給我，說這本書大有一讀的價值，當時我便費了幾天工夫，把它仔仔細細誦讀一過，讀完之後，我就覺得這本書十分合意，字句既然流暢明達，所敘事實又都負責可靠，佛氏純然用一種客觀的眼光，好像在顯微鏡的下面，細察俄羅斯的過去狀況，其長處是既不抹殺蘇維埃制度的優點，也不隱飾它的許多缺點。如說要找尋一部不偏不倚而較為完善的俄國史，我想佛氏此書，至少在現在汗牛充棟的出版界上，可算是令人滿意的巨著。所以我們覺得它非但有一讀的價值，也有譯成漢文，介紹給國人的必要。於是我便鼓起勇氣，利用編輯外交評論所空的餘暇，從事遂譯，惟以時間所限，爰將原書的戰後一部分史料，先為譯出，并改名俄羅斯現代史付梓問世。在此中我們可以看到佛氏敘述戰後數章史蹟，如何精采詳確，關於蘇維埃的新經濟政策、外交政策以及五年

計劃等事，著者的見解，尤有獨到之處，真使我們不能不欽佩其眼光之遠大與觀察的透澈。

國內真正了解蘇俄的人似還不多，有的人以為蘇俄是個奧妙莫測的謎，其實呢？蘇俄既不如一般無智識之流所想像的那樣可怕；也不如一般帶了有色眼鏡者那樣宣傳把她當做人間的樂園。誰都知道蘇俄是一個所謂蘇維埃式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因為主義的不同，其制度文物，當然與資本主義的國家也隨着不同，考其所以不同的原故，乃由於彼此不同的特殊環境所衝積而成，決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欲明瞭此種特殊環境的起源、成因以及結果，則必有賴於歷史的探討。我料讀者如平心靜氣讀完佛氏此書後，對於蘇俄的真相，當有適當而深切的認識了。

國際一載的中俄復交，如今突然已成事實，這不可不說是我國外交上的一大進步，此舉實是我國自主外交前途的發軔，其值得世人稱頌，自不待言；不過復交以後，橫在我們目前沒有解決的事尚多，凡為國人，非先經過一番周密的攷慮不可，否則恐蹈前次的覆轍，前途將不堪設想。我認為現在我們第一步工作，須先認識整個俄羅斯的過去實況——尤其是最近的過去——，方能談到其它的一切問題，因此之故，歷史材料和歷史智識的灌輸，乃是刻不

容緩的事。拙譯如能稍稍有補於邦人君子的求智慾望，則是最所希望的了。

本書敘述至一九三〇年初爲止，以後的史實，如有機會的話，擬另編附於蘇俄現狀一類的書，以補前書之不及。

我譯述本書的動機，實受了吳頌皋先生的鼓勵與慫恿，譯完後並承吳先生校閱一過，并爲作序，允爲外交評論叢書之二，至所銘感。孫寒冰侯厚培兩先生允在黎明書局出版發行，也是很可感激的。

吳先生說拙譯可算得「信達兼顧」流利可誦，實是謬獎的話。此中誤譯的地方，諒來很多，還望讀者隨時指正才是。

民國廿二年四月十日陶樾自序於新都

羅氏原序

英文著的俄國史大綱之類，坊間很多，雖然我並不是一個這門的專家，但這些史書，已大半讀過，就中最好的要算是從俄文中繙出來的譯本，一半可說都是近代最好的純正卓越的著作，有幾部且很適宜供研究俄國史高深的學者之用；不過這許多書，却是俄國人專寫給自已同胞們閱讀的，所以不能完全滿足對俄羅斯或對俄國史有興趣的美國人之需要。還有的近代新出版的書，多少是帶點假面具的宣傳色彩，就中大都是歌頌布爾希維克黨在俄羅斯的試驗。自從美國對於俄羅斯及其歷史逐漸地而確切地發生興趣後，一般人很覺得需要有這樣一

部從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觀點所出發的，而須完善的合於近代的與毫無偏見的俄國進化史著述出來。

我會仔細地讀過佛那斯基教授的著作，讀後，我覺得有許多話要說：在近代，佛氏可說是研究俄國史最優良的學者之一，他知道材料的來源，也知道怎樣去適用材料，他所讀過的書很多，觀書末的參攷書目非常完備和合於近代的。佛氏現在任著名大學的特約研究員，得到多才多能的學者之幫助，終於他努力——據我所見：這種努力是完全成功的——著成了這部書，足以解答俄國史上的各種問題。至對於這些問題，美國讀者具有特殊興趣的。

佛氏書中材料非常豐富，但他並不覺得過多，也並不只是變成一個堆積的棧房，他很細心地把材料集合起來和連貫起來，而又加以一種解釋，常令人信服與引起興奮；不但此也，而且他還是第一次試將俄羅斯人民之一的進化，用一種不偏不倚的科學精神，在書中敘出，表明這種進化是與過去的俄國革命有連帶的關係的。在他的筆下，布爾希維克黨的活動，另有一種新的看法，這與俄國人民過去的忍苦茹辛有極漫長的連鎖關係。

此書的重要性質，將各種俄國史上的大問題，用新穎的和殷殷期望的方法敘出，他誠足

以與近代許多有才能的學者平分秋色的了。他的觀點所以如此者，因為他是一個歐亞混血種的人，雖然在政治上誰也知道他的信仰則頗有不同。至關於其它歷史的研究，倭爾加達報 (Vulgate) 在逐漸記述俄國的史料，許多有名的俄國史學家都在努力——這種努力是十分成功的——表明俄國的進化在大體上實與歐洲各國相同，所謂「歐化」俄國，是一種自然的過程，正與歐洲各國的逐漸進化毫無二致，不過從俄國閱歷的特性上看來，稱為落後與複雜一些而已。

固然，這種見解似乎太着重相同點而忽略了相異點，大多數有名的俄國學者不注意俄國史上尚未解決的事，這就是說：從地理和文化的觀點上看來，俄國正與中歐密切一樣，與大部分亞細亞洲亦相密接；就是從文化的發展上說：也有特殊的關係。我們不應該忘記從早年幾世紀的俄國史看來：俄國會構成大而有力的亞洲帝國，如意拉尼亞 (Iranian) 與蒙古帝國，迨與蒙古種人長久而密切同居以後及經過困難的奮鬥以後，俄羅斯始成爲歐洲的國家之一，不過她依然還佔據着大部分的亞洲領土，蓋俄國一方面在吸收歐洲種族，它方面又在歐化亞洲種族，殆無疑義。但是有一個問題須問：亞洲種族對於俄羅斯的發展有甚大的供獻呢？

可惜我們所知道中亞細亞人民歷史發展的材料太少，我們依然有待於中國歷史的一個真正的檢討，而這種檢討又須根據有用的材料，作深刻的研究，如說因為所知道的材料太少，就廢棄和不注意它，則是大謬不然的。我極其尊重佛那特斯基先生的努力，他在寫此書時，估量到俄人民與亞洲的密切關係，這是一個良好成功的發軔，也許將來會促成許多重要的不朽的結果。

羅斯多甫齊夫 (M. I. Rostovtzeff) 一九二九年二月於康涅狄格

(Connecticut) 紐海文 (New Haven)

作者原序

這是我寫給英美讀者的第一卷書，書中不但敘述幾世紀來俄國之政治與軍事，也及於俄國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在發展中的重要潮流。

這本書並不是兩年前我在巴拉加 (Prague) 所出版俄文著的綱要的譯本，而完全是新寫的，對於近代的時事更其注意。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以後新的事件，非本書內所能預料。我對於政治上的時事與過去的史蹟，都嘗試採用完全不偏不倚的態度。

我的原書，除最後一章，用英文寫的外，都是用俄文寫成的，俄文本乃由倪鮑爾辛碩士

(George A. Nebolsine)譯成英文。

沃拉齊(Sterling H. Tracy) 卡樸維駒(Michael M. Karpovich) 暨台維斯(Malcolm W. Davis)諸先生都曾熱誠地修飾全書的英文辭句，我尤其應該感謝卡樸維駒教授對於本書內容上的極有價值的指教。

耶魯大學出版部編輯台維斯先生個人會盡力幫助和鼓勵我寫這部書。

臨了，我還應該感謝吾妻，因為她供給我許多關於俄國音樂史的材料。

佛那特斯基(George Vernadsky)一九二九年二月

於康涅狄格紐海文(New Haven, Connecticut)

作者再版原序

作者覺得無限的榮幸，對於本書的各種批判及讀者的迎合，應該竭誠容納的。

再版時已加入一章，敘述一九二九年所發生的事件，我會將全書再看過一遍，並利用許多新的史實，而有幾處不經意的地方，我已把它取消，書末的參攷書目，也已增多不少。

我應感謝卡樸維駒教授，他答應我校閱第廿一章（本譯本第九章）的新材料，並也幫助我補充了許多參攷書目。台維斯先生把再版所增多的一部分譯成英文。

佛那特斯基一九三〇年五月於康涅狄格紐海文

目錄

吳序	頁數
譯者序	一
羅氏原序	五
作者原序	九
作者再版原序	一三
第一章 大戰時的俄羅斯（一九一四—一九一七）	一五

第一節	戰時的外交背景及德國對俄的戰略	一
第二節	巴爾幹的紛亂塞拉甲窪暗殺事件及俄國的動員	四
第三節	大戰發軔時全俄的情緒	九
第四節	大戰第一年俄國邊疆上的軍事行動	一〇
第五節	俄國的政治危機——國皇與國會之爭	一五
第六節	「戰敗者」的宣傳	一九
第七節	俄國的經濟困難	二〇
第八節	自一九一五年秋至一九一七年春俄國前綫上的軍事行動	二二
第九節	俄國的政治危機皇室革命的計劃以及拉斯普丁的被殺	二三
第二章 俄國二次革命（一九一七）		
第一節	革命的力	二五
第二節	帝權的傾覆	二七
第三節	臨時政府及工兵代表的蘇維埃	三二

第四節	戰爭問題及臨時政府的初次危機	三八
第五節	俄軍的解體及克倫斯基進攻的失敗	四一
第六節	一九一七年七月布爾希維克派在彼得格勒的起事	四三
第七節	俄國的經濟危機	四五
第八節	郭尼洛夫運動	四九
第三章 共產政府的成立（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第一節	布爾希維克派成功的原因	五五
第二節	克倫斯基政府的傾覆及彼得格勒莫斯科布爾希維克政府的建立	五八
第三節	布爾希維克權力自彼得格勒莫斯科擴張至各省的情形	六二
第四節	與德軍和平談判的開始及舊俄軍的解體	六八
第五節	南俄武裝反抗布黨的準備	七〇
第六節	國民大會之解散	七二
第七節	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之簽訂	七三

第四章 俄國內戰（一九一八—一九二〇）

- 第一節 農民對布爾希維克政策的不滿及濟窮委員會在鄉村中之建立……………七五
- 第二節 反革命運動的爆發及紅軍的發展……………七七
- 第三節 義勇軍哥薩克人與布黨的鬥爭及德國人之佔據烏克蘭……………七九
- 第四節 捷克斯拉夫人的起事及執政部的成立……………八二
- 第五節 列強在停戰前的聯合干涉……………八四
- 第六節 列強在停戰後的聯合干涉及召集普林基坡會議之提議……………八七
- 第七節 南俄與東俄的反布爾希維克政府……………九〇
- 第八節 柯爾察克的軍事行動及其與協商國的關係……………九二
- 第九節 紅軍戰勝柯爾察克與鄧尼金……………九五
- 第十節 紅軍戰勝胡蘭吉及俄波戰爭……………九七

第五章 蘇維埃政府的經濟政策

- 第一節 社會主義的經濟「戰時共產主義」及強迫勞動制度……………一〇一

第二節 經濟的難關飢荒及賑務行政部的組織……………一〇五

第三節 新經濟政策……………一〇八

第四節 俄國的經濟改造……………一一〇

第五節 蘇維埃經濟制度的特質……………一一二

第六節 蘇俄的經濟困難……………一一六

第六章 蘇俄的政治構造

第一節 蘇維埃國家的最高權力……………一二一

第二節 蘇維埃的選舉制度……………一二四

第三節 共產黨在蘇維埃國家的地位……………一二六

第四節 蘇俄的地方政府……………一二九

第五節 蘇聯的邦聯主義……………一三一

第六節 蘇聯公民的權利……………一三六

第七章 蘇俄的外交政策（一九二四）

第一節	第三國際	一四一
第二節	西俄邊界的重行劃定	一四四
第三節	近東與中東方面的外交	一四六
第四節	日俄關係	一五〇
第五節	蘇俄與中國蒙古滿洲的關係	一五二
第六節	新經濟政策時代的外交政策及基諾亞海牙兩次會議	一五四
第七節	洛桑會議	一五七
第八章 列寧去世後的蘇維埃內政與外交政策		
第一節	列寧的繼承者及托洛斯基的反對	一五九
第二節	一九二五年的農民政策及新的反對力	一六一
第三節	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的共產國際	一六三
第四節	中國革命的爆發	一六七
第五節	歐洲的安定及羅迦諾條約	一六八

第六節	一九二六年的蘇維埃政府與英國	一六九
第七節	蘇維埃在中國方面之勢力的盛衰	一七一
第八節	大不列顛與蘇俄外交關係之破裂	一七三
第九章	關於煤油的爭端	一七五
第十節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間共產黨中的反對派	一七六
第九章 戰鬥共產主義之復興		
第一節	全聯邦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	一七九
第二節	軍縮問題	一八一
第三節	凱洛克公約與蘇維埃以及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情形	一八四
第四節	一九二九年之中俄衝突	一八六
第五節	英蘇恢復邦交	一八九
第六節	一九二九年之美蘇關係	一九二
第七節	「可明探」的活動與蘇維埃政府的代理者	一九三

第八節	五年計劃	一九四
第九節	五年計劃的第一年	一九七
第十節	集合農場	一九九
第十一節	一九二九年之俄國勞工	二〇二
第十二節	一九二九年之俄國農民	二〇四
第十三節	新經濟政策的終了	二〇六
參考書目		二〇九

第一章 大戰時的俄羅斯（一九一四—一九一七）

第一節 戰時的外交背景及德國對俄的戰略

俄羅斯是歐洲列強集團中的一員，其勢是不能不參加大戰了，她與中歐同盟國，三國協商發生關係後，已決定怎樣攻擊前者，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在戰事未發生前，德意志覺得自己已的準備總比協商國方面充足得多，她也早已知道她的兩個假想敵法俄兩國的勢力一天一天地擴張起來了。

德國非但已看清俄國軍力的膨脹，且也及於俄國經濟和文化方面迅速的發展。俄羅斯托雷賓 (Stolypin) 農村改革的施行，是使農村地主組成一種新的階級，以奠定俄國新的社會基礎。在一九一四年時，我們還可計量俄國內部的憂難，尤其如新的立憲統治制度，至今還未能完全實行，在十年當中，俄國革命的可能性似乎是很微細的。德國參謀部對俄的戰略，旨在攷量俄國的戰略問題及其內部的弱點，德國想用兩種方法來就弱點中取利：一，挑撥帝俄羅斯的人民分裂離間；二，喚起俄國社會和經濟的不和。講到最要的俄羅斯民族問題是波蘭問題，其起源可追溯到維也納會議的時候，十八世紀波蘭被瓜分時，因為普魯士也會佔得一部分，所以德國對此並不什麼重視，迨十九世紀末葉，奧國會鼓勵在她所佔土地上的波蘭人實行自治，所以俄國也未便輕易提出這個問題，如果一旦提出來，恐遭德甸的抵抗，蓋德意志是極力反對斯拉夫勢力擴張到海普斯堡 (Hapsburg) 王國中來。

足使德奧活動的另一地方是烏克蘭 (Ukraine) 加利西亞 (Galicia) 和勃高維那 (Bukovina)，那是海普斯堡王國的領土，但居民都是和俄羅斯烏克蘭同血統與同文字的斯拉夫人。當大戰前，奧國政策是在扶助加里西亞的烏克蘭文化運動，以與在俄國境內阻止烏克蘭運

動的政策，正相頡頏，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至二十世紀初年，俄國政府反對所有烏克蘭人民的分立運動，壓迫凡用烏克蘭文字所出版的種種學術書籍。這種政策會引起過南俄人民的惡感，雖然這分立運動實際祇限於少數智識分子，可見俄國行此壓迫政策，徒使烏克蘭運動益發強烈化罷了。於是德奧兩國看到俄國政府的缺點後，便從中取利，不過她們未免過於重視那烏克蘭運動對於俄羅斯的危險，（註一）這點是錯誤的。要這個運動現諸事實，只有等到俄國戰敗後才可以，不過當時在德意志武力維護之下，烏克蘭主權總算還存在呢。

在中歐同盟國方面看來：俄國的另一弱點是社會的不安。在大戰時，德國扶助反帝俄政府的革命宣傳，但俄國雖有許多社會上的缺陷，一時却不能如同同盟國所願，其革命會立刻奏功。德國甚至希望大戰剛爆發時，俄國便起革命，迨至一九一七年時德國便已打得筋疲力倦，如欲將協商國戰退，機會似乎已經很少了。於是在帝俄羅斯推倒後的十八個月中，德國也接着起了革命，將德意志帝國政府傾覆殆盡。

（註一）他們重踏十八世紀時佐治十二（Charles XII）的覆轍，因後者曾想端賴烏克蘭哥薩克人來救他。

第二節 巴爾幹的紛亂塞拉甲窪暗殺事件及俄國的動員

一九一四年前幾年整個歐洲的霧圍氣，已似預知大戰之不久來臨。戰爭的近因，是由於巴爾幹連綿的紛亂。

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葉時，俄奧在巴爾幹所施的外交，已把這個半島分成兩個勢力範圍，俄則主領東部巴爾幹的斯拉夫族，最要為保加利亞 (Bulgaria)；而奧則控制西部巴爾幹，最要為塞爾維亞 (Serbia)與波斯尼亞 (Bosnia)，羅馬尼亞 (Rumania)則於一八八五年後也和奧國同盟，但是一九〇八年自從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併入奧國版圖後，情勢又變更了，在奧地利的整個控制之下，塞爾維亞人他們自己也彼此極難一致，當割併以前，奧國在波斯尼亞的勢力，固未合法承認，塞爾維亞人仍能暗暗地期望西部巴爾幹的斯拉夫族得到統一，但自一九〇八年被割併以後，已無異把這種期望根本剝奪，因此喚起塞爾維亞人反奧的民族思想。

俄國看到一九〇八年後的種種情勢，於是便轉變她的外交政策，想托巴爾幹人從奧國的

勢力下解放出來，至一九一二年時，這個目的已幾乎要達到了，巴爾幹半島上的各國，如塞爾維亞、保加利亞、與希臘互相同盟，合攻土耳其，巴爾幹戰爭的結果，這個同盟獲得完全的勝利，把幾乎所有土耳其在歐洲斯拉夫族和希臘人所居住的土地剝奪殆盡，但隨後同盟中便發生意見的衝突，接着引起了第二次的巴爾幹戰爭，一方是保加利亞，一方是塞爾維亞與希臘，羅馬尼亞又加入了塞希方面，因使保加利亞便一敗塗地，孤單單地想謀新的聯合。其時塞爾維亞因受協商國方面的援助，保加利亞於是加入了同盟國方面。

一九一四年巴爾幹的外交局面，已與二十世紀初年大異，保加利亞已在奧國方面，而塞爾維亞與羅馬尼亞則歸俄國方面，質言之：一般的情形顯出極度地不安，巴爾幹好像是一架火藥機，隨時在預備爆發。保加利亞人想對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予以報仇，而塞爾維亞只想把她的弟族在奧地利的控制下解放出來，有如以前她們反土耳其的成功一樣。這由塞爾維亞的民族思想，隨時可惹起在奧國的塞人的革命，如他們幾次試想暗刺奧國政府的要人，終於有一人將奧國王子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nd)刺死。

在一九一四年六月廿八日斐迪南被刺於波斯尼亞的一個城市中賽拉甲窪(Sarajevo)。

這個事件發生後一個月，七月廿三日奧國即最後通牒與塞爾維亞，斷然說這個謀殺案是塞政府所主使的。

塞爾維亞的覆牒，實際已完全屈服了奧國的許多要求，但滯留在斐爾克拉特 (Belgrade) 的奧外長却依然表示對塞爾維亞的覆牒不能滿意，遂立即晉與都維也納。

這時，俄國不願坐觀塞爾維亞孤力無援地被奧國所毀滅，是顯而易見的事；而一旦戰事爆發，法將聯俄抗同盟國，也是十分明顯的，至於英國將處如何地位，則曖昧不明，在德國，也許可以希望英國不致參加戰爭，那時英國的外交與克留 (Edward Grey) 個人都想設法消弭，不過如要渡過這次慘禍，其唯一的方法，只要先使英與法俄完全聯合在一條線上，可是英國却並沒有照這樣做。

俄國的外交擬在可能範圍內避免這次戰事，(註一) 但是專用外交來解決奧塞紛爭的種種嘗試，已都歸失敗，至七月廿八日奧國終於對塞宣戰了。此事發生以來，俄國置諸不聞不聞

(註一) 這裏並不能將「戰爭責任」問題加以論究，以上所述一點，我個人可用有用的實據來證實的，不過一般人都承

，坐視塞爾維亞的被侵略呢？還是命令全國陸軍動員去援助的呢？當前只有這兩條路好走了。原來的提議是一個折衷辦法，先命在南俄一部分的動員，這樣可顯然表明只敵奧而不敵德，俄外長山茶諾夫 (Sazonov) 立刻便將這決議案向歐洲各國政府宣佈；可是俄國一部分參謀部中人和軍事專家都極力反對這個意見，其理由——專門的——是說部分的動員足以延宕和攪亂將來全體的動員，如果以後德國宣戰，則全體動員將被最先那部分的步驟所毀敗，這樣便足以使俄國的聲勢一落千丈。蓋俄國的動員問題，所以值得加以討論者，由於它非但對國際關係大有影響，即在軍事效能的實際上着想，也很重要。假定說：這一般的局面是很不安的了，而不得不準備全力以赴衝突，那末她所預備的動員計劃，如有數日的延宕或遇相當的紛亂，則雖是強國，也得無力去抵抗敵國初次的襲擊。

七月廿九日那天，德大使普丹萊 (Count Pourtales) 至俄國外交部去訪山茶諾夫，宣稱即使俄國部分的動員也得立刻引起德國的全體動員等語。因處於這樣的環境中，俄國便不得不於七月廿九日下午五時命令陸軍全體動員了，在當天下午九時二十分鐘，俄皇尼古拉 (Nicholas) 忽接到德皇威廉 (William) 的電報，相約他在力謀聖彼得堡和維也納間的諒解，尼古

拉捧讀之下，便立刻將全體動員收回了成命，而仍然代以部分的動員，寅夜即將這道命令去通知基輔 (Kiev) 敖得薩 (Odessa) 莫斯科 和 喀山 (Kazan) 各防區的指揮官。七月三十日開始部分的動員，但這許多命令發出後，俄國 軍部又接到了消息說：德國 在那裏開始秘密動員了，而同時山茶諾夫 想得到一種滿意談判基礎之最後的努力，也被德奧 所拒絕，山氏 遂與陸軍部長 參謀部長洽商後，決計面奏國皇 再發全體動員令，尼古拉 於七月三十日下午四時接見山氏，但皇 則不願同意全體動員，山氏 不得已，便咨令陸軍部長 與參謀部長，直至七月三十一日全體動員才容易開始實行了；不過這個意義並不就是戰爭，這點在七月三十一日俄皇 尼古拉 給德皇 威廉二世 的電報中及山茶諾夫 對克雷爵士 表示繼續外交磋商可以看出來。蓋山氏 所盡力需求者，祇望奧國 軍隊不犯西伯利亞 這一回事。

當俄國 動員命令尚未傳到柏林 以前，同時德國 政府也下了一道 *Kriegsgefahrzustand*，這除了名義上不同以外，便等於動員令。八月一日尼古拉 再電威廉 要求後者將動員並非戰爭一點給以保證，不等到有什麼回音以前，駐聖彼得堡 的德國 大使於要求制止俄國 動員後，便忽然通知山茶諾夫 道，德國 已向俄國 實行宣戰了。

第二節 大戰發軔時全俄的情緒

德國對俄的一聲宣戰，所引起俄人的情緒，與十年前日俄戰爭開始時迥然不同，誰也認識時局已趨嚴重，在幾個俄羅斯的都市中，可以看到許多愛國的表現，自從這次外交關係破裂後，沒有幾天，連彼得格勒的罷工，也立刻自動停止了。

國會(Duma)即召開特別會議，完全同意政府所取的政策，這種表示顯出俄國政府與人民代表已趨一致的了。八月十二日秦斯忒服(Zemstvos)的代表們組織一個全俄秦斯忒服聯盟，以作救傷事業，因此這次戰爭是在一個十分良好的政治朕兆中所展開的——全俄一致對外。自從政府宣佈解放斯拉夫族的政策以後，更引起狂熱的民族思想。這次戰爭確然是為解放塞爾維亞人而戰，最初俄羅斯總司令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cholas)更想解放另一的斯拉夫族——波蘭人。俄國的外交政策，並未避免那錯綜複雜的難題，而依然勇往直前有意整理古亭(Gordian)問題，俄國對波蘭人宣言，曾相約後者替其重行釐定：「將波蘭有機體分成三部分」。(註一)不久以後，俄國又鼓勵所有被與、句壓迫着的人民一致起來。

德國會估量如俄國一旦動員，必然引起後者國內的紛擾，可是事實上却並不如此，俄國陸軍的動員，是按照羅空斯基（Tukomsky）將軍所預定的計劃，其實行却是意想不到的迅速，而且一些也不發生困難，這實是得力於禁酒令的頒佈與所有酒店的發封。

在大戰開始後一個月當中，俄國因懷有昔日俄戰爭時的經驗，已顯然獲利，雖俄軍不能阻當德國的軍力，但經過一番完全改組之後，總比較十年前日俄戰爭的時候，至少已好出三倍的了。

第四節 大戰第一年俄國邊疆上的軍事行動

德國對俄宣戰後，接着便於八月三日對法宣戰，隔了兩天，奧國又對俄宣戰，旋德國破壞比利時的中立，以致引起英國的對德宣戰，一九一四年十月土耳其加入了中歐同盟國方面，這時協商國的聲勢，似較同盟的為大，不過前者的人力與財力方面過於複雜不均，而後者因受德意志的指揮，較為統一。至於協商國方面並無一統的軍事命令，且各國的軍事活動也

（註一）這是指俄德在奧波蘭所佔有的三部分，至在俄國保護之下者則歸統一。

頗不一致。起初，其軍力分成不平均的三部分：一是西綫，包括英法；二是東綫，俄國；三是東南綫，西伯利亞。至於西伯利亞的軍力較中歐同盟國所有者脆弱得多，除非德意志因應付其它的主要陣綫而無暇及此，則西伯利亞綫還能保住。所以戰事的進展，祇靠幾條主要陣綫攻勢的成敗與否以為斷。

德國的軍事計劃，其性質如次：假如同時與法俄兩國戰，則以其全法去攻法國，而祇讓一小部分軍力來對付俄國，先把法國打敗後，再與俄國火拼一次出人意表的持久戰。這樣看來，這種陣圖與法國頗關緊要的，故一俟戰鬥行為開始，俄國即應進攻德國，因此才可逼使德國不得不將西部進攻綫上的軍力撤回一部份。在動員以後十六天，俄國遵照一九一三年與法國所結的軍事盟約，便開始侵入德國，於是俄國遂漸漸完成她所預定的程序，戰事是發生在八月一日，至八月十七日，萊能加勃夫（Reichenkampf）領導下的俄軍，便開始侵入東普魯士，沒有幾天後，森索諾夫（Sansouov）所領的第二軍，又從南部進攻東普魯士，俄軍因看到那時法軍正在西綫上被德軍重重地壓迫，所以行動便愈加迅速，終於俄軍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垂手而入東普魯士，只是俄國第二軍在沒有獲得戰利品以前，略見不甚穩固而已。

德軍按照他們的計劃，即自維斯的拉河(R. Vistula)撤退，放棄東普魯士給與俄國；但是俄軍侵入東普魯士後，却引起德國輿論方面強烈的影響，故使德國最高命令不得不改變戰略，繼續抵抗俄軍的襲擊，授命德軍新任司令與登堡(Hindenburg)和總參謀羅登道夫(Luden-dorf)指揮東北綫，將一部分原定抗法的軍隊，調去抗俄，這樣決定了後，立將六個師團和一個騎兵團調到普魯士去應戰，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日坦能堡(Tannenberg)一戰，羅登道夫將森索諾夫所領的五個師團俄軍包圍起來，打得落花流水。坦能堡戰場就是昔日一四一〇年波蘭軍、立陶宛軍及俄軍打敗德意志武士的所在。下一個星期中，羅登道夫便把俄軍自東普魯士逐出。

德軍自西綫調至東綫，便是它所以能克勝俄軍的原因，但唯其如此，却弄亂了西部的進攻綫，戰事的結局，也因此大受影響，因德國在馬納(Marne)一戰的前夕，未置重兵，才使法軍得以阻當德軍的進迫。

德俄的最初一戰，德則全勝，俄祇打败了東南綫的奧軍，佔巨里西亞(Galicia)，賴俄將亞歷西夫(Alexeiev)的活動，俄軍又進佔了許多奧國的軍事要塞和捕獲二十萬的俘虜。德

軍在東普魯士戰敗後，更欲在東綫有所行動，以援奧軍，一九一四年九月羅登道夫率領五十個師團的德奧軍向華沙(Warsaw)進發，經過一月的苦戰，俄軍勝利，羅登道夫便於一月廿七日命令撤退。這一九一四年十月華沙之戰，可算是俄軍在世界大戰中所努力的最高點所在了。但是結果德軍並未完全敗北，俄軍如爲實行進攻起見，還需要隨時防備，當時英法的軍令堅持要俄軍速即進攻德軍，以解決後者從西綫上所調來的殘餘，俄軍便立刻答應了，雖然那時德國在東綫上的新軍力，已不足以令人注意，乃與協商國方面所想像者已迥然不同。俄軍的繼續進攻，倒便宜了英法，使後者得從容休息，補充軍需與軍火。但俄軍連戰了三月以後，已損失不貲，其勢恐較英法是更需要休息的了。俄軍旋適應協商國方面的需要，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命令進攻西里西亞(Silesia)和波森(Poznan)等地，可是德軍已先發制人，將西綫上的十四個師團調來猛攻俄軍，終致俄軍非但失敗，且受極大的損失。

德國因鑒於對法進攻綫的失敗，便設法轉變她的戰略，毅然進攻俄國，先在東綫取勝後，再行進攻西綫。一九一五年春天，隔了一個短時間實際軍事行動的休息以後，德國再將原在西綫的十三個新師團調至東綫，並將大量的重砲集中於俄羅斯邊境，以麥根遜(Mackens-

(B) 率領之。不久便很顯然，俄軍畢竟不能抗拒麥軍的猛攻，這是由於俄軍軍需不敷之故。迨一九一五年夏天，俄國不得不告退兵，此次結果不但完全喪失了在敵國所佔的領土，而且也失了波蘭、立陶宛、康萊特(Courland)以及許多西俄諸省的進口地方。

整個的一九一五年，俄國已尖銳地感到軍需的缺乏，在那年八月，沒有武器的俄兵，激增至百分之三十，軍隊專靠傷兵與陣亡者所遺留下來的武器，才能繼續奮鬥。那時德國也恐怕軍隊離軍事根據地的距離愈趨愈遠，或致食糧和軍火的不濟，亦無意再進，一九一五年秋天，德國的進展，即止於里加、特文斯克、泰諾波爾(Bi-ga-Dvinsk-Tarnopol)諸地。

當俄軍撤退以後，因為軍械局製造量的增加和戰綫的略趨平靖，軍火的供給，即時顯有進步，至於外來的供給，只自一九一六年起。當俄軍於一九一五年夏天撤退時和同年秋天西伯利亞綫慘敗時，英法從未在西綫上大規模地活動過，足以敗退中歐同盟國的軍力，她們雖曾試欲援助俄軍與西伯利亞軍，進攻達丹尼爾斯(Dardanelles)，但終於是失敗了，迨至一九一五年五月意大利參戰時，已不能有所援助。這樣看來，一九一五年的德國，已足以使俄國軍力受一個可怕的打擊，終至撤退，這點算是德國成功了，可是德國所希冀的要把俄國軍

力一網打盡的目的，却未達到，蓋同時東綫方面，經英法的同意，已重新把軍力集中起來，準備對德戰鬥了。（註一）

第五節 俄國的政治危機——國皇與國會之爭

當時參戰各國都感到糧食供給的危機，幾乎沒有一國會精密預算過戰爭要延長到什麼時候，以及需要多少的軍需物品。如一旦戰事延長，必須想法如何供給充分的軍火，因此德英法三國便立謀發展工業的事，不過俄國比較其它列強來得艱難，雖然在大戰前，俄國工業着着進步，但畢竟是比較微弱的；而且俄軍又較其它協商國爲多，當然軍需也大，在第一年時，俄軍簡直是馬不停蹄；可是英法自馬納一戰之後，差不多已站定永久的脚跟了。至於講到俄國內部的政爭，又很複雜，一九一五年的慘敗，使政府與國會間發生了裂痕，軍需的不濟，如說應歸罪於政府與參謀部的淺見，這句話只有一半是對的，此外，如撤兵後，便把許多

（註一）戰爭開始時，中歐同盟國在東綫上駐有六十三個師團，西綫上九十三個師團，迨一九一五年九月，總們集中一百六十一個師團以抗俄國，至在西綫上祇有八十四個師團。

人民所居住的領土忍心放棄，撤兵令實由軍事當局所發施的，他們只是承繼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侵俄時的政策，這簡直是一大錯誤，故使全俄的輿論，都指摘軍令的缺陷。

秦斯忒服聯盟及許多城市和公共機關，都願幫助政府，來應付當前的難題，他們從事救濟難民與供給軍隊的需要，以工業作為無數統系的核心，改由戰時工業委員會 (War Industry Committee) 和國會去調度，以便輔助政府應付一切戰時的問題，各種代理機關的工作，使軍隊得到了許多助力，不過這種助力愈昌旺，則政府的威信愈沒落。協商國方面對這次俄國內部的改革，都不甘心俄國國會方面的措置，在協商國方面，當然也看得出俄國國會的行動，頗有助於俄羅斯的作戰，但在它方面，俄國國會反覺得只有協商國始能滿足俄國軍火的需要，孤獨的俄國工業，決不能應付這個問題，因此國會在一方面與公共機關密切聯絡，而它方面則與協商國的代表們相互聯絡，這便引起皇室的必然的恐懼，發生政治上的嫉妒，而且在這個裂痕中，還參雜了個人間的仇恨，以致愈演愈熾。因政府領袖高爾梅金 (Gorenkin) 曾把第一次國會解散，故使國會方面非常懷恨。一九一五年八月政府同意國會的短期會議，允許將退兵的負責陸軍部長蘇克霍列拉夫 (Sukhomlinov) 免職，但尼古拉就表

示不願接受國會中的領袖地位，來指揮軍國大事，這樣便發生了國會與政府間的裂痕，頓令人追念到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最初兩次國會的往事。卒由自由派領袖米留可夫（Miliukov）建議，以溫和右派（Moderate Rights）和自由派（Liberals）聯合控制國會中的多數份子，至此，國會很需要有一個為全國所信仰的內閣，那時在尼古拉二世的當前，只有兩種行為可取：應從國會呢？還是不願負協商國之約而停止戰爭呢？國皇躊躇不決，終於他做了全俄陸軍的最高命令者，一般人都希望這種舉動，可使國皇在全國在軍隊中，及全協商國的關係方面，或能提高皇的威信；其實這是一種危殆的冒險，因為以後如果再敗，從此許多公衆的懲判，將集於皇之一身了。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尼古拉大公爵軍隊被調至哥薩克的邊境上，尼古拉二世就任俄軍總司令，這時俄國的政治空氣非常濃厚，在最短期間，把國會召集起來，俄皇用九牛二虎之力去找尋國會中能幫他的忙來解決現實問題的黨魁，可是尼古拉二世終於又失敗了，職是之故，他便毫無理由地將行政官任意更動，這種朝不保暮的內部局面，致引起協商國方面的疑慮，尤其將外長山茶諾夫免職，而簡命有親德派嫌疑的施得末（Sürmer）繼任一事發生後更甚。

國皇漸漸感到自己政治地位的孤立，他初被左右兩派集團所擠斥，終於又被協商國方面所擠斥，國會覺得他無力再指揮戰事，極端右派且要求單獨講和。這時誰也在暗地懷疑皇權乃由斐華鐸綠娜皇后 (Empress Alexandra Feodorovna) 所獨攬，因為她的操縱，才使意志薄弱的國皇弄得一敗塗地；而又誰也知道斐后是受一個無知識的鄉下預言家名叫拉斯普丁 (Rasputin) 所支配，因為她簡直崇拜他為聖人，這由於拉斯普丁具有吸引人的魔力，而一方面皇后又帶點神經質的成分，她相信他有保護皇子健康之力，蓋當時皇子正在害一種無可醫救的疾病(註一)。

因此，產生一種連鎖的勢力關係，如要得到國皇的信仰，先須得到皇后的喜悅，如要得到皇后的喜悅，先須得到拉斯普丁的好感，縱然是有名的人物，如不願去求媚拉斯普丁的話，那他終於與皇是慳緣的，拉斯普丁祇在軍隊中沒有勢力，尼古拉二世的總參謀——即事實上的總司令——是亞歷西夫，他雖想不受外來的侵涉，但對國皇不能不將軍事行動的策略去告訴他，於是先從國皇一傳傳給了皇后，再傳便傳給拉斯普丁終於也知道了。

(註一) 皇子一九〇四年患，天生遺傳的血管炎病，拉斯普丁於他生後沒有幾年，便進入皇宮。

可是軍隊與全國的利益有密切的維繫，如國內發生動搖，不消說：免不了影響及於軍隊的精神。

第六節 「戰敗者」的宣傳

國會與國皇的政爭，非常危險，終致兩敗俱傷，致使威權淪喪，而開闢出一條社會革命破壞力的道路，這種社會革命，自一九〇六年始，已漸漸抬頭。如今這種情勢，是很有利於極端社會黨實施「戰敗者」(‘defeatist’)的宣傳。大戰時全國社會黨固已放棄國際主義，揭發着國家主義，蓋在俄羅斯社會黨中固有許多的愛國份子，但也有不少有力的社會國際主義者的集團。

說俄國是個「戰敗者」，最活動的機關是布爾希維克黨，其領袖列甯(Lenin)已於一九〇七年後出游國外，但是他們對於俄國政治，有極大的影響，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國會中的布爾希維克份子最初表示附和抱「戰敗者」政策的領袖，迨一九一五年春天他們忽然被補，處以叛亂之罪，有的監禁，有的放逐不等，但他們的思想，却已漸漸深入俄國勞工大眾的人心，殆

無疑義。其時列甯繼續在瑞士做他的準備功夫，一九一五年他更發起第三國際的組織，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他在兩次國際社會黨會議中重申他的「戰敗者」的政策，而獲得成功，他如今已公開提倡低階級對高階級的內爭，以制止人間帝國主義的戰爭。

第七節 俄國的經濟困難

代議機關和政府的政爭，其有利於革命的宣傳，已如上述；更甚於此者，由於一般精神的頹喪，致喚起經濟的困狀。戰爭使各國大多數的人馳赴戰場，俄國政府也受了協商國政策的影響，使力能荷鎗的人都去拼死，一九一七年初，新募一千五百萬的兵士，但政府並不能立刻有充分的武器，去供給這許多人，幾百萬的兵留在後方無所作爲，因此易作政治宣傳的適當場合。由於大多數的動員，致引起了經濟的困難，欲供給上百萬的新兵，政府當然需要大宗的軍餉，於是又引起運輸和生產業的困難，都市全靠鄉村運來的食物，最先感到困苦，一九一六年秋天，彼得格勒已起了必需物的恐慌，於是政府不得想法取給於鄉村的農家，遂增加政府方面不少關於行政和財務上的負擔，何況還有二百萬失去了西俄領土的難民，也

正嗷嗷地欲賴政府的救濟呢！

政府因要供給軍隊的軍火，卽出資振興工業，一九一六年來，幾乎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工業工人，專事軍備的生產業。國家的支出在逐漸增加，但收入却逐漸減少，赴前綫去的兵士，家庭都不能照納平日的捐稅，此外，政府自厲行禁酒後，又少收了一筆大宗的間接稅。政府迫不得已發行紙幣。一九一五年在市面上流通的盧布，達二、九四六、五〇〇、〇〇〇之譜，迨一九一六年，增加到五、六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因流通紙幣大量的增加，使物價抬高，於是官吏和勞工的薪金，便須不斷地增加，經濟不安的印象已瀰漫全國，遂使人民的精神漸次沮喪。

第八節 自一九一五年秋至一九一七年春俄國前綫上的軍事行動

經過一九一五年的一度撤退，軍隊的狀況反倒開始進步了，一九一六年三月，曾想侵入德軍的中綫，但不幸未達鵠的，攻擊的計劃既未臻完善，又乘春雪溶解向下流的時候開始行動；所以俄軍之所以失敗，與其說是因為德軍的猛勢，無如說是由於泥滯的阻礙。進攻的失

敗，在軍隊中留下了不良的印象，他們都以爲德軍的脚跟已經站定了。

迨一九一六年夏，俄軍又戰奧軍，這正好是一個援救意軍被侵的良機，蓋那時意軍已被奧軍壓迫不成樣子，五月中奧軍且恐嚇要全部毀滅意軍，俄軍聞悉之下，遂於六月四日在俄西南綫上着着進攻，這次行動却獲得大大地成功，白里西洛夫(Brusilov)所指揮的俄軍，直將奧軍打得支離破碎，潰不成軍，又把四十萬以上的俘虜生生擒住，以致中歐同盟國便不得不告退軍，擬另行設法抵抗俄軍，至一九一六年秋，羅馬尼亞參戰，敵門中歐同盟國，但不久就失敗了，羅馬尼亞敗守的結果，使俄軍得以南進，以達黑海，稱援羅軍。

如德國要對白里西洛夫和羅馬尼亞軍予以反攻，非有非常的大力不爲功。中歐同盟國自在東綫上打過一回彼列克(Pyrlie)勝仗後，要在西綫方面再得勝利，便毫無把握了。一九一七年的德意志，簡直危險到萬分，當時中歐同盟國的勁敵，即協商國在西綫上的兵力，在一天天地繼續擴張，而同時有英美軍需的接濟及俄國工業的改良，至一九一七年春，已能供給俄軍充分的軍火了，雖然過去已歷盡艱苦，但在一九一七年正可期望協商國方面的新的征陣也許能克服中歐同盟國的。

第九節 俄國的政治危機皇室革命的計劃以及拉斯普丁的被殺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冬，尼古拉二世與國會的政爭，愈形尖銳化，許多重要的惡果，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卒使雙方兩敗俱傷。國會恐懼權奸拉斯普丁也許有與反動勢力聯合而謀對德單獨講和的可能，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國會開會時，許多人演說攻擊皇后的弄權，當時社會上的最高階級決定要去掉拉斯普丁爲快，公認他是一個國皇身邊的最惡的魔神，追那年十一月三日，拉斯普丁終於被一個有名的貴族所殺死，兇手是受一個國會中的保守份子和一個皇族中人的幫助。可是魔神死後，國皇的政策，却並未變更，因此有的皇室中人甚至計劃要將尼古拉二世推倒，另易其他皇族份子，可是這個時機早已過去了，因爲在皇室革命以前，羣衆運動早已起來了。

俄
羅
斯
現
代
史

第二章 俄國二次革命（一九一七）

第一節 革命的力

正當一九一七年三月俄軍準備進攻中歐同盟國的當兒，革命猛然爆發了，遂使這次進攻，功虧一簣，因為革命是希望俄軍全部崩潰的，欲使俄國立刻敗退。

雖然，渴望繼續戰爭與想像推翻專制政體的人們也歡呼革命，他們想激起俄羅斯人民的愛國思想，因此可尤其助長他們那種戰鬥員的聲勢。同情於革命的最有力的集團是上中階級

，他們想覬覦國會中自由份子的領袖地位，還有許多是軍官們，也有的是上級軍官，迨至最後，革命又得到協商國的代表——英法——所贊同。

國會中的自由份子，反對帝政府的任何設施，這由於最高的愛國思想所發動的，都相信要增進俄國的利益，與其與舊統治制度（Old regime）相妥洽，無寧反對。觀察俄國革命史，常常會對俄國許多集團的宗旨，領袖的意見及其所實施政策之截然不同，發生奇突。

國會中反對派的領袖，祇希望一個政治革命，不是社會革命。但幾年來那戰爭的極度緊張，在俄羅斯的非常狀態中，發生一個無遠弗屆的社會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事。

大戰是在俄國未經社會改組以前——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以後——所發生的，農村改革已有相當的結果，關於地主資格的新的規則是斯托雷賓所提出的，雖很圓滿，但未得如何效果，農民依然鬧地荒，感到不滿意，他們希望等到帝政府崩潰後，便把大田產均分配置。俄國農民最看重土地問題的解決，對政治改革倒並不十分在意的。

革命發生以後，一般社會黨黨員便向羣衆宣傳，要進行一種擴大的社會改革方案，因為軍隊中新補充的兵士，大都來自田間，所以這次激變，留下一個嚴重的敗壞的影響，國會中

的自由反對派却並未認識這種激變的影響，因他們向來與一般人是很少接觸的，所以完全誤解了社會主義對羣衆的影響，畢竟至何程度。

反對政治組織的舊統治制度，其所以受到障礙者，由於國會中的自由黨沒有大規模地組織起來，當時社會黨已用祕密集團的連鎖，與城市中的工人們直接聯合起來了。

社會改革方案最嚴重的影響，足以沮喪軍隊的精神。俄軍的崩潰不是革命的因，而是革命的果，最初兵變者是後備軍，而不是上前綫的實編部隊。一九一七年的俄軍，雖已戰得筋疲力倦，但依然還能鬥爭，迨後軍需也已充實（註二），如此氣旺的軍隊，也許在那年有應戰的可能，可是反動集團的騷動，已立時達到他們的目的，而政府還在討論好高騖遠的社會問題，怎麼不崩潰呢？那時政府簡直已剝奪軍隊要繼續戰爭的願望，所以社會革命剛發軔時，已將俄軍的戰鬥效能摧毀殆盡了。

第二節 帝權的傾覆

（註一）自貨物自外洋運俄後及俄國工業發達後，遂與一九一五年的情形完全變更。

革命運動的成功，頗得力於俄國最高當局道德的淪喪，皇室已被斐華鐸綠娜皇后所包辦，而她又處於拉斯普丁的勢力之下，我們已於上述見之。一般優秀份子因此都相率離政府而它去，在俄國史中，最可憐的一個時期，是一般沒幹的人完全充塞在國會中，他們既無才能，又缺乏統治的意志力。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日拉斯普丁自殺後，情勢並沒有多大的進步，反使皇家自相分裂了，自這次事件發生以後，國皇便失去了事實上的統治權。

帝政府的自相分裂和創造新權力機能的種種情形，可用編年體次第追述如下：

那時俄皇在俄軍總司令部莫奇萊夫 (Mojisiev) 地方，忽然接到拉斯普丁在彼得格勒被殺的電報，當天（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卅一日）俄皇便到查斯科西羅 (Tsarskoe Selo) 去會見皇后。

事實上呢？正從那天起，俄皇便把皇權放棄了，這時剛巧總參謀亞歷西夫又在病重告假中（註一），亞氏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三日力疾到總部去，三月九日尼古拉皇也回到了總部，翌

（註一）他正在克里米 (Crimea) 療養，在其病中，總部職則由甘可 (Gurko) 代理。

日，接到電報說：彼得格勒因糧食不敷，頓起暴動，第一通電報的措詞，尙稱樂觀，但至再下一天，傳來關於彼得格勒暴動的極可怕的惡耗，國會議長路特岑可 (M. V. Rodzianko) 又把這事件說得非常淒慘可怖，他要求組織一個能滿足國會的內閣，使人民共同信仰，迨三月十二日皇弟邁克爾 (Grand Duke Michael Alexandrovich) 告訴亞歷西夫：說他相信祇有這個方法才能挽救這愈鬧愈大的局面。

幾小時以後，首相高立森 (Golitsyn) 也電致俄皇，貢獻同一的策劃，這時似乎在俄皇當前唯一的決心，只有接受這種勸告；可是他並不照這樣做去，反而採取有力的政策，以痛剿這次暴動，這些政策實行之後，却並未完全澄清那擾攘的局面，二月廿七日開新國會，至三月十一日，皇命忽停止繼續開會，派遣依范諾夫 (Ivanov) 率兵一營到彼得格勒去壓平暴動，但是這種政策是不適當的。

許多國會議員並未服從聖旨，三月十二日早晨擅自集會於陶里達宮 (Tauride Palace) 中，不過他們所取的政策，未盡妥善處頗多，國皇仍得胆大妄爲，正在這當兒，國皇於三月十三日早晨赴查斯科西羅總部去，他不在這些艱難的日子中，與皇后分離，而當時事件的

開展又非常迅速，連國皇也被這些事件所牽掣的了。

國皇的行爲，雖不足以壓制革命，但很足以阻止國會去統治動搖中的反動勢力，不久國會便不能再領導革命了。

國會的領袖們與許多社會黨黨員都沒有號召街上工兵的能力，彼得格勒暴動的近因，實由於糧食的缺乏，不過對於給養很好的兵士，並不受動搖的。三月十二日清晨，彼得格勒已充塞了革命的暴氓，街上的警察，竟被他們所殺，克里斯斗 (Kresty) 牢獄被他們用暴力打開，而又將宮廷放火，駐彼得格勒的後備軍，也加入他們的羣衆，有幾個官吏竟也被他們所慘殺，政府、軍事長官及警察總監簡直已無法下手，於是便開始了無政府狀態。

這似乎國會是能控制現實局面的唯一當局，兵士與公民的羣衆衝進陶里達宮中去，至午，國會議員決定有所作爲，下午二時選出一個國會臨時委員會 (Temporary Committee of the Duma) 引導革命，此會以十二個會員組成，以路特岑可爲主席，其中大多數是自由與溫和保守派份子，此外兩個社會黨份子也選爲委員——克倫斯基 (Alexander Kerensky) 和漆克海士 (Nicholas chikhvidez)，但漆氏立刻拒絕爲委員，此舉頗有意義，蓋漆氏想一手

自由進行純粹社會主義的政策。許多社會黨領袖與國會議員同時進入陶里達宮中，前者並不願參加國會，却試想創造一個如一九〇五年模樣的他們自己的政府。三月十二日那一整天，國會與社會黨領袖們所躊躇不決者，是不敢打破那舊的統治制度，他們祇領導暴氓去將幾個閣員提到議會來。直至那天晚上，臨時委員會才決定實施權力，派了許多委員到政府的各機關去，在一個時期，國會似乎有制服革命的權威。

但在同時，彼得格勒工兵代表的蘇維埃已組織起來了，工人的代表，每千人中選出一個，兵士則在每隊中選出一個，約於三月十二日下午七時羣集陶里達宮門口，社會黨且不開國會委員會的許可與否，擅將議事廳佔據，在第一次會議中，選出漆克海士為主席。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當然國皇再沒有時間馳赴查斯科西羅去，鐵部幹部已用電報報告革命黨將派代表為交通部委員，國皇的火車在特諾 (Dno) 站被阻，三月十四日皇達北斯哥夫 (Pskov)，他已意氣全消，決計退位了。

國會委員會已經決定實行革命的第二個階段，它推選出一個俄國臨時政府，以伏季 (George E. Lvov) 為主席，葛希可夫 (Alexander Guchkov) 長陸軍，米留可夫 長外交，

其他社會黨代表方面，則以克倫斯基長司法(註一)。

新政府的第一要着，即將國會取消，三月十五日新任陸軍部長葛希可夫與國會委員會委員許爾岑(V. V. Shulg'in)同赴北斯哥夫視察國皇的退位事，但國皇依依不忍與其太子分離，故其皇位並不傳給太子亞歷克西斯(Alexis)，而傳給其弟邁克爾大公，在退位之前，皇又命尼古拉大公為陸軍總司令與伏孚為首相，但邁克爾並不願居陸軍最高職，讓給臨時政府，至此，羅曼諾夫(Romanovs)再不能在俄羅斯統馭了(註二)。

第三節 臨時政府及工兵代表的蘇維埃

彼得格勒所發生的革命，非但為陸軍總部所贊助，也被全俄所承認，至此，舊統治制度

(註一) 勞工部擬請另一社會黨黨員漆克海士任之，但他不就。

(註二) 退位國皇、皇后及其子女即時被拘，且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一九一八年春，蘇維埃政府更把他們解到伊加忒

林堡(Ekaemburg)，即於是年七月十六日被政府所慘殺，至於邁克爾大公也於一九一八年春在拍爾姆

(Perm)被共產黨徒所拘，以後遂告失蹤，大概也被殺了罷。

的擁護者已失去了抵抗力，自尼古拉皇及其兄弟宣言後，革命便得到一個合法的性質，這種情勢無異卸去了革命仇敵的武裝（註二），皇權的傾覆及代以國會的權力，也被舊統治制度下的官僚工具資本家與各省所默認，雖然，隨後却立刻顯出新政府並未擁有真正的權力。

新政府的政綱有如下述：（一）一切政治、宗教、軍事犯的普遍的大赦；（二）言論、出版自由及結社罷工自由；（三）取消一切社會、宗教、民族上的歧視；（四）召集國民大會（Constituent Assembly）；（五）以人民自衛軍代替警察；（六）普遍選舉；（七）從事革命的軍隊須留駐彼得格勒，不得調至前綫；（八）不在伍的士兵享有同樣的公民權。

這個宣言不過是臨時政府與蘇維埃的折衷物，蘇維埃另外單獨發佈一個未經臨時政府所同意的宣言，這就是有名的三月十四日「第一號命令」，旨在破壞俄國的陸軍，其重要內容：（一）各軍隊選出代表，組織兵士委員會；（二）各軍隊應服從蘇維埃的決議案；（三）凡不背蘇維埃命令的國會軍事委員會命令始得服從；（四）一切武器概由兵士委員會管理之，不得發給官吏。

（註二）熱誠擁護國皇者因此自殺的很多。

這道命令擾亂了治軍方面，其發佈時既未經最高軍事長官的同意，且是引導對官級官吏的權力施以反抗。蘇維埃乃使軍隊捲入政治的亂源中，並使他們對國會發生懷疑，這樣可把軍隊的整個組織，立刻敗壞。這道命令的起草者，顯然欲使繼續戰爭歸於不可能，命令發佈後，臨時政府還想法廢止，但已不能如願了。至此已很顯明，真正的行政是蘇維埃，而不是臨時政府，但蘇維埃並不願公然握取政權。因為當時它恐遭自由與保守派份子的反對，蘇維埃是少不了臨時政府的，因為後者仍然是被全國與軍隊所公認的當局，蘇維埃寧願維持臨時政府為暫時的當局，以作反社會主義集團的引誘物，不過蘇維埃却不時控制與約束臨時政府的策略，視其有否與蘇維埃政策相抵觸。

這樣說來，在革命最初幾天，彼得格勒有兩個政府，一是臨時政府，代表政治革命；二是工兵代表的蘇維埃，代表社會革命。

臨時政府之所以孤立無援，一半由於其中份子的無能；它一半由於應付當前種種問題的困難。

第二次臨時政府的人員，差不多都是受過教育和具有智慧的人，竭誠愛其國家，但欲歷

制那些擾亂秩序者，却缺少堅強的意志和決心，有幾個人在承平時也許是優秀的關員，但在戰時與緊急關頭中，證明他們便不安於位了。

政府首相伏孚是具有忍耐不抗的性格，因而不足以壓制他的敵黨，他是一個托爾斯泰（Tolstojan）式的人物，相信對付「惡害的不抵抗主義」，他常常對偉大的不流血的革命，表示一種純直的信心。

陸軍部長葛希可夫與外交部長米留可夫也許是政府中能主持一種活躍的外交與軍事政策的數一數二的中堅份子，因而遭怨於蘇維埃方面，尤其對米留可夫為最甚。

至於講到他們的政治意見，則臨時政府中大多數份子是属于立憲民主黨（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的，他們想把歐洲立憲主義的原則，引用到俄羅斯來，却並未顧到如今是一個革命高潮的時候，需要緊急決斷，而不需要立憲手續的按步精密的做法。

臨時政府為適應地方秦斯忒服和全國選舉的目的，制定關於普遍、平等、直接及不記名投票選舉的新法律，最要在乎改組地方團體或秦斯忒服（Zemstvos），使其全權處理投票國民大會的名冊，因此種種，致使代表選舉直延至一九一七年秋季始得舉行。

這時期的第二個俄國政府，已見上述，是工兵代表的蘇維埃，這個政府在最初時，也是漫無組織的。在彼得格勒的蘇維埃中，包括二千五百個工兵，乃由彼得格勒的工廠與軍隊中不用任何專門的方式所選出，除工兵的真正代表以外，蘇維埃中還含有許多社會黨的領袖，自一九〇五年後，他們已認爲自己就是勞工利益的真正代表。這樣繁重的蘇維埃團體，實際於政治行動不能有所作爲，所以他們組織了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中全數幾乎都是社會黨的領袖，蘇維埃的重要政策，都由少數份子——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所決定，一切政策常先由蘇維埃最高機關的少數分子所採納後，再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副署，非社會黨黨員分成布爾喬亞(Bourgeois)或資本家，則爲蘇維埃所不承認的。蘇維埃中的多數份子是社会革命黨黨員(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他們自以爲是代表農民的，次要的團體是社會民主黨(Socialist Democratic Party)，自以爲是代表工人的，社會民主黨以後又分做門希維克(Mensheviks)和布爾希維克(Bolsheviks)兩派，迨列甯回俄(註一)，布爾希維克始與門希維克脫離關係，他另組一黨，就是後來的所謂「共產黨」，列甯與門希維克不同之處，在

(註一) 列甯乃於一九一七年四月自放逐地歸俄，見本章第六節。

乎基本政策的概念，門希維克相信除非等到國家比較工業化時，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總是不可能的，反之，布爾希維克派人要立刻在俄國實行社會主義。當革命最初數月中，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的列甯黨徒，祇佔最少數額，但因蘇維埃自己的散漫不振作，卒使列甯派份子頓然增加，那時較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期望臨時政府繼續執政權，而布爾希維克派人却大聲疾呼要一切權力立刻屬於蘇維埃。

蘇維埃雖然份子複雜，內容不整，其所以有特殊的力量，因比較臨時政府能與羣衆密切地接觸，不久，俄國各城都組織蘇維埃起來了，擴而至於各軍隊及各鄉鄉村也都樹起同樣的組織。

臨時政府又將許多舊統治制度下的官吏安插於各省中，以舊秦斯忒服委員會爲主腦，雖然他們大概都具有自由的頭腦，然而畢竟與民衆很少接觸，不過舊官吏具有治事的經驗，但新官吏是沒有的。彼得格勒的中央權，從最初起就缺乏各省的適當代表，臨時政府的委員們感到不得不將權力與地方蘇維埃劃分清楚，這種情狀，在每一個彼得格勒的地方都會中都可反映出來的。

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全俄蘇維埃大會(All Russian Soviet Congress)後，蘇維埃便立刻遍佈全國各地，許多蘇維埃概由社會黨人所支配，大會將所有蘇維埃的中央委員會集合起來，事實上就是社會黨領袖們的大會。

會議於六月十六日起舉行，就中最有力的黨是社會革命黨，共有二八五個代表，門希維克代表有二四八人，但布爾希維克派佔最少數，祇一〇五人。

據蘇維埃的同情者的眼光看來：這個大會是新俄羅斯的真正的代議機關。布爾希維克派要求立刻握取權力，但究佔少數，未能實現他們的願望，推翻臨時政府的初步計劃失敗後，列甯進而抓取下屆蘇維埃大會的權力。

誰也承認組織蘇維埃大會比較組織國民大會容易得多，前者在革命中是一個較有實際權力的機關，鑒於召集蘇維埃大會的初次成功，不難推測將來議會制度的勝利，這種制度乃仿自西洋，而由臨時政府所堅持主張的。

第四節 戰爭問題及臨時政府的初次危機

革命時代主要的政治問題，自然是戰爭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極端的見解，政府中的溫和份子希望繼續戰爭，以冀獲得勝利的結果，如外交部長米留可夫對駐在彼得格勒的協商國代表們會話時與對大衆演說時，常常表示這種意見；它如布希爾維克派及社會國際黨則抱相反的意見，他們的代表常斷斷爭辯要立刻講和，公然承認他們自己爲「戰敗者」。

在上述兩種極端派之間，還有一派是蘇維埃中的社會黨，他們認爲公衆的情感固已不欲擁護社會政策，但他們也不願使俄國的軍力歸於整個崩潰。

此外還有一種重大的影響，是由駐在俄國的協商各國代表們所主動的，當然，俄國如繼續戰爭，於協商國方面必大爲有利，後者堅持說：「俄國不應該任意失信於協商各國」。

當革命初爆發時，協商國對俄國政府極表同情，三月廿二日北美合衆國且第一個出來正式承認，繼之有英法意三國的承認，不過不久協商國各列強都對於新政府能否維持俄國秩序和能否繼續與中歐同盟國戰爭，表示疑慮，她們眼見社會黨領袖們組織羣衆的成功，故堅欲新政府與蘇維埃相妥協，組成一個統一的與強有力的政府，爲了上述的目的，法國派軍械部長湯木斯 (Albert Thomas) 一行勞工代表團與英國同樣性質的代表團到俄國去疏通蘇維埃

、臨時政府及西部民主集團三者間之誠意的諒解。

可是兩派對於戰爭的政策，抱完全相反的意見，很難調和，三月十八日米留可夫忽對駐彼得格勒的協商國代表們聲言担保俄國「誓在協商國側共仇敵愾，非達到目的不止」；但三月廿七日彼得格勒蘇維埃對全世界人民發表一個宣言說：「佈置與決計從事和平」，從那天起社會黨領袖們起來與米留可夫部長的「帝國主義的政策」作急劇的抗爭，至五月三日，布爾希維克派用「打倒米留可夫」的口號，作第一次反對政府的顯明表示，這種表示又引起了下一天晚上愛國者反對，不過臨時政府卒為避免與蘇維埃衝突更形擴大起見，便決計接受大遭物議的兩部長的辭呈，故五月十七日所新組的內閣中，已沒有米留可夫與葛希可夫了。迨五月十八日，政府更接受蘇維埃的要求，與中歐同盟國「根據民族自決的無割讓無賠款的原則簽訂和約」。

新政府內閣總理仍屬伏孚，但真正的首領是克倫斯基，他一身兼軍政與海軍兩部長，湯姆斯是擁護克倫斯基的，因經湯氏的疏通，新政府容納許多社會黨人，蓋湯氏相信社會黨人才是唯一的政治領袖，他們有誘致俄軍繼續戰爭之權，雖然蘇維埃已將他們的仇敵去掉，然

而他們的反對聲浪却始終未能平靜下去。

第五節 俄軍的解體及克倫斯基進攻的失敗

克倫斯基對於軍隊所取的策略，具有兩大原則：一是俄國再行準備全體的進攻；二是民主式的改組軍令。進攻中歐同盟國的觀念與克倫斯基先前委身於純粹的自衛戰爭及主張廢除帝國主義的目的並無二致，這次進攻的主要目的，在乎迫使中歐同盟國放棄她們在俄國所佔的領土；但進攻的主要缺點，在克氏並未仔細審量革命後俄軍所抱的新態度。

軍隊的改組破壞了軍紀的最後威信，至五月廿二日，克倫斯基不得不同意海陸軍所要求的命令，即所謂「兵士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Soldiers' Rights) 這道命令的內容幾乎完全確定了三月十四日彼得格勒所發佈的「第一號命令」，有幾點或更寬容。

克倫斯基所提出的改組方法，首先推派委員，作為軍隊中的政府代表，授與政治領袖的地位，然後軍隊中的最高命令者上則被政府特派員所約束，下又由革命初爆發時所組織的兵士委員會所牽掣。

軍隊中的最高命令者起初在俄皇剛退位時，對臨時政府的命令一一接受，從未反抗，那時俄軍中的指揮官頗效忠於革命與臨時政府，迨至日後，他們發見政府在一味破壞蘇維埃的勢力。當時克倫斯基且想把軍隊大行改組，將尼古拉大公的繼承者亞歷西夫它調，而另委白里西洛夫任總司令之職。

俄軍的解體已達到一個絕望的階段中了，上官的權力已經崩潰，軍隊蘇維埃公然發出反對指揮官的命令，所有軍隊務須捲入「戰敗者」三個字的漩渦中，不久前綫的兵士們竟與敵軍開始携手起來了，德軍遂決定停止軍事行動，相信這是促使俄軍瓦解的最好方法；但是當時克倫斯基仍堅欲完成其進攻的準備，他親自往前綫去視察，有人稱他為「總勸導者」，俄軍的進攻計劃遂於一九一七年七月開始，起初幾仗得到勝利，與軍確被極度襲擊而致潰退，但不久就顯見改組後的俄軍不能繼續進行，整個部隊竟不聽號令，戰至筋疲力倦時，常任意不顧前綫防務，這次進攻之所以初次獲勝，原由於上官與少數兵士的熱心從事而已，大多數人在戰事起初幾天時已是衰頹無能，故在進攻的前途中，可說已惡運來臨了。

俄軍進攻之所以終於失敗，一種原因由於與協商國缺少合作，英法兩軍早於五月中已取

攻勢，迨至七月，協商國已戰得筋疲力倦，而這時德國又剛巧將西綫上兩師之衆調至東綫，以援助那破碎不全的奧軍，德軍的反攻遂動搖了俄軍的軍心，在某一地方不受約束的一團兵竟自動放棄了戰綫。德軍的進展，卒止於齊白里河（R. Zoruch），但如他們高興的話，要佔據整個西南俄羅斯的領土，也是易如反掌的事。這個不幸的結局，使軍中一指揮官郭尼洛夫（Kornilov）急呈政府主張立刻恢復軍紀及對所有潰逃者應處以極刑，至政府委員們都贊同郭氏的要求，郭氏的呈文，於全國產生一種極深刻的印象，這可算是革命後第一次有力的文字，在一個時期，郭氏便一變而為一個抱愛國思想的中心人物，甚至克倫斯基也被他的要求所深深感動，迨七月三十日即委郭氏為最高總司令，以繼白里西洛夫之任。

第六節 一九一七年七月布爾希維克派在彼得格勒的起事

適當俄軍進攻崩潰的當兒，布爾希維克派人同時在彼得格勒實行武裝的起事，從七月十六日起至十八日止，他們領導着一羣水兵與許多彼得格勒警備團的兵士，試欲推翻政府，但終於被臨時政府從前綫召來的騎兵師所克服。

這次布爾希維克派起事的主要目的，想用蘇維埃的名義來奪取政權，其事前的準備是十分公開的，惜政府與大多數的蘇維埃並未設法制止這次爆發，而社會黨領袖們反發表宣言道：政府無權設法制止這次布爾希維克派和平的宣傳。

布爾希維克派之所以有權有勢，由於他們口號的動人及其組織的效能化，其政綱可分三點：（一）立刻講和；（二）立刻將土地分給農民，工廠須歸工人所掌握；（三）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雖然這派人在彼得格勒的蘇維埃與蘇維埃大會中祇佔少數，但他們在這些團體裏算是中堅份子，自列寧與托洛斯基（Trotsky）自海外歸國後，他們的行動即愈增効力，這兩個領袖都是出名的「戰敗主義者」，當革命以前，托洛斯基在美，歸途中道出英國時，曾被英國當道所捕，說他是一個危險的煽惑家，卒經臨時政府抗議，始許釋放歸俄；列寧則自一九一四年以後，即流居瑞士，經瑞士社會主義者普萊頓（Platten）的中介，他曾要求德國政府許其經過德境而回俄國，那時德國政府正需要利用列寧作為摧殘俄國軍力的唯一武器，許其搭乘經認可的鐵道從瑞士到瑞典，他卒於四月十六日馳抵彼得格勒。

行裝甫卸，列寧便開始在工兵的會議場中發表他的思想，他要求社會黨們拋棄他們反對

國會政治的舊方法，而勸他們擁護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

列寧政策的中心思想，旨在「農村和平」、「對皇室鬥爭」及「掠奪那掠奪者」(loot the looters)，他的演說最初祇能迷惑一般社會黨人，他的敵黨聽了他的演詞，常揚言道：『說這樣狂言的人是不危險的，他如能在如今有完善的見解才好』。但列寧是頗有成算的，他做事公開，他用他的毅力宣揚思想與改組共產黨。

第一次布爾希維克派起事的失敗是俄國革命史上的一個轉機，當時實是政府厲行威權的好機會，但可惜政府未能將此機會抓住，幾個布希維克派的領袖，如托洛斯基固被捕與列寧逃亡芬蘭；但布爾希維克派並未在蘇維埃中失去權利，政府又在此時重行改組，伏孚退職，由克倫斯基繼任總理，仍兼陸軍與海軍兩部長，內閣中的大多數現在已不是社會黨了。

第七節 俄國的經濟危機

隨軍隊與行政紊亂而俱來的是經濟危機，農業與工業的生產漸趨減少，運輸已漫無組織，政府的財政已一天壞似一天，尤其農田的局面更形紛亂，在國民大會之前，臨時政府對土

地之重行分配一事，尙遲疑不決，但當時民主黨與社會黨的領袖們已約農民去接收土地。在這種環境之下，農民竟等不及國民大會再來分配土地，有幾處地方，已開始非法的奪取，甚至同時還有搗毀房屋與殺戮地主的情事發生。

政府即欲制止這類運動，組織農田改革委員會 (Committee on Agrarian Reform) 及若干地方委員會，其中包含政府官吏與農民，但是這種委員會無力約束農民們的奪取土地，內政部長祖雷泰黎 (Tsereteli) 是一個社會黨黨員，在其七月三十日關於這次運動性質的官報中說：「各處土地強被農民所奪取，他們再也不向地主們去要求了，家畜被他們所殺，財產被強，米穀被毀，森林被伐，木材被奪，私有地主者祇得讓他們的田地輟種，以致毫無收成」。

農田危機對於糧食供給立刻發生一個重大的影響；在戰時，軍隊與都市的供給，有賴於政府審慎的攷量，都市糧食的不足是第一次革命爆發的口實，臨時政府有意解決關於糧食的供給問題，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二日制定穀類獨占法，每一農家概由政府直接支配，政府用確定的價格以謀均衡，但因貨幣的價值逐漸減低，頓使穀類的市價比較確定的價格低落數倍，因

此農民不肯出賣穀類。由於這種政策的結果與運輸的紊亂，遂使所確定的穀類供給的分配額不能滿足，政府對於軍隊與都市需要的購買力從七月份百分之二十六降至八月份百分之十。

至於工業狀況也未見得比較良好，在革命的最初幾天，工人們各取所需，並未與管理者商量過，他們自行八小時工作，經理得由內有工人所組織的工廠委員會所開除，結果遂使一切紀律與生產事業，敗壞得很快，如莫斯科冶金工業的產額，迨一九一七年四月降至百分之三十二；彼得格勒方面生產，從百分之二十降至百分之四十；丹內次河（Donets）流域的煤礦產額迨七月降至百分之三十，當時種種工業方面的工人不能顧及企業收入的減少，勢必需要增加工資（註二），例如丹內次河流域企業的利潤總額，一九一六年可得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但需付工資總額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現在應當決定工業畢竟應歸工人所有，抑歸國家所有呢？在俄國投資的外國股東代表堅持應歸政府管理，以作抵制工人無厭要求的保護。致政府管理的思想，是由戰時協商國方面所輸入的，駐俄的英國勞工代表漢德森（Anthony Henderson）主張最力，而俄國的社會黨想

（註一）所以勢必增加工資之故，一部分原因由於貨幣價值的低落，且自紙幣發行後，幣值更形低落，工資更需增加。

利用漢德森以實行他們「社會」管理的政綱——這就是說：採用社會主義，使工廠歸工人所有，在事實上這種政綱臨時政府從未實行過，不過有許多地方，工廠的管理權，確已操諸工人之手，因而增加不少糾紛，即此之故。

鐵道也同樣受到普遍的紊亂，一九一七年七月九日，交通部長下一手諭，命俄國國有鐵道的行政，交鐵道雇員所組織的委員會管理，鐵路工人委員會又組織一個中央委員會，爲其主幹機關，其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對政治則頗感興趣，不料鐵道方面從此便腐化起來了，失修的火車頭愈增愈多，裝貨車也漸行減少，迨一九一七年最初幾個月中，裝貨車已較一九一六年時少去九八〇、〇〇〇輛了。

一般的經濟生命崩潰，當然也影響到財政的狀況，我們已在以上說過：兵禍連年，使國家預算日重一日，革命不但沒有減少國家支出，却反而增加了不少。臨時政府覺得不得不補助振興工業，但因生產量減少而工資增加，以致未能與預算平衡，如在丹內次河流域，政府所撥的補助金共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軍費增加到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鐵道員工的工資增加到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給兵士妻子的救濟費共一一、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註一)。

國家支出着着增加，但國家收入並未俱增，在革命最初幾月中，錢糧降至四分之三，都市房捐降至百分之四十三，而臨時政府的公債，又未能暢銷，補短縮的唯一方法祇有加印紙幣，一九一七年上半年，所發新紙幣的總額幾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比較一九一六年全年祇發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已增加不少的了。

一九一七年七月，彼得格勒與倫敦銀票的匯兌率，以二二六·五盧布弱換十磅，至一九一七年九月，須三二二·五換十磅，可見俄羅斯的經濟狀況真是危險極了。

第八節 郭尼洛夫運動

革命後的最初幾月，軍隊的最高命令直接順從臨時政府的一切策略，但自一九一七年七月俄軍進攻崩潰，郭尼洛夫繼任總司令職，於是軍隊的態度便轉變了，陸軍總司令部變做了

(註一) 這所增加的數額已等於一九一五年全年的預算，自戰事開始至一九一七年所用兵士家庭救濟發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政治力量的所在地，郭氏就職前曾對政府提出以下的三項條件：（一）新總司令須握有全權；（二）政府不得干預總司令的軍令；（三）軍紀即須恢復。克倫斯基完全接受了郭尼洛夫的要求，如欲踐約，克氏當然不能不與蘇維埃斷絕關係，但自七月克氏平定布爾希維克派的反動後，已不願作此舉動，政治的局面已經極度混亂。當布爾希維克派起事以前，俄國還有兩個權力：一是臨時政府；一是蘇維埃，臨時政府的主要勢力，則賴軍隊的忠順、擁護，而蘇維埃的活動的力，全恃其左翼共產黨，這兩種極端的集團都與中立的溫和派勢力相分離。布爾希維克派繼續用蘇維埃的名義行動，儘自實行他們自己的政策，第一次起事失敗並未挫折他們的力量，而軍令方面也同樣準備各自行動。

雖然，郭尼洛夫却漸漸得到人民的擁戴，但他不能靠他自己的力量，他還得靠臨時政府的權威，在幕後活動，正如布爾希維克派是以蘇維埃為幌子的。郭尼洛夫關於復立軍紀的計劃，是須靠臨時政府的合作，假如他是對於第一次伏孚所領導的那樣臨時政府，那末他要政府屈從他的意志，也許是做得到的事，但不幸現在的領袖已不是伏孚而是克倫斯基了，這個人雖然不能充分保持他自己的權力，但頗具政治的狡猾手段，也許臨時政府存在一日，終難

在他手中奪取任何權力(註一)。

至此，陸軍總司令部與政府間忽發生了裂痕，克倫斯基切欲使蘇維埃不能干預他，而答應了郭尼洛夫關於恢復軍紀的條件，但事後他又恐懼蘇維埃的全歸消滅，或致自己被郭尼洛夫及軍隊中擁護他的人所屈服，他的恐懼終於證實了，郭尼洛夫的計劃，擬用軍力將蘇維埃一網打盡，郭氏並想得到臨時政府的合作，然而臨時政府在最終的一剎那間，却抖將起來了，遂使郭尼洛夫憤而擬將臨時政府與蘇維埃全部取消。

迨八月廿七日，莫斯科舉行「全國政治會議」(National Political Conference)，召集國中主要社團的代表，郭尼洛夫亦往出席，他被一般保守份子所熱烈推戴，但會中一半社會黨份子却都一致歡迎克倫斯基，因此分裂即肇其端，郭尼洛夫與克倫斯基都預料如果把恢復軍紀的策略一旦宣佈，必引起彼得格勒布爾希維克派的反動，為預防緊急事件發生，郭尼洛夫同意臨時政府的主張，將第三騎兵隊調至首都，迨至幾乎有解決希望可能的時候，郭尼

(註一)講到克倫斯基與最高命令官的衝突，可回憶及當年尼古拉二世與國會之爭，尼古拉二世雖也無統治力，但有禁止別人篡位的才能。

洛夫與克倫斯基間忽發生劇烈的誤會，這是由前國會議員伏孚(V. N. Lvov)與前總理 Prince G. E. Lvov 爲兩人)於九月到總司令部時所引起來的，他負奔走調解之勞，郭尼洛夫與伏孚談話後，知道克倫斯基在準備把獨裁的大權交給郭氏，克氏只要新政府中担任一職已足，郭尼洛夫對伏孚所交來的克倫斯基的提議表示同意，後來伏孚回到彼得格勒以後，又想出了一個計劃來，將郭尼洛夫的一封信的美敦書送給克倫斯基，九月八日克倫斯基直接電致郭尼洛夫，問他會托伏孚所傳達之一切計劃和目的的種種消息究竟是否確實？郭氏在正面回答了，但沒有問起伏孚對他說的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九月九日克倫斯基用電報報告郭尼洛夫說：郭氏已被斥職了，命其立刻到彼得格勒來；這對郭尼洛夫是一個出乎意外的打擊，也已被壞郭氏受任總司令時所得到的最初條件。郭氏決定這是他活動的好機會，九月十日他通電全國公民，決不放棄總司令職，要求公民共同反抗臨時政府，同時他命克雷莫夫(Krymov)率領第三騎兵隊向彼得格勒進發。

那時克倫斯基投入彼得格勒的左翼集團，命彼得格勒警備部準備與克雷莫夫抵抗，於是所有俄國社會主義的組織都不得不擁護克倫斯基了，就中最要的部份是鐵路工人執行委員會

，因為他們足以控制運輸方面。但兩方的鬥爭不久就轉變方向了。

克雷莫夫使命的正式目的，原想壓平布爾希維克派的起事，因為政府如果同意了郭尼洛夫的政策，也許他們要起來的，但郭氏的政策既未被政府所同意，又未印刷出來，所以並沒有什麼反動發生，克雷莫夫的軍隊後來終於叛變，兵士們都樂於諦聽敵黨的宣傳，同時一般鐵路工人都不服從郭尼洛夫要援助克雷莫夫的命令，因使克雷莫夫終於不敢進攻首都，旋隨了克倫斯基來到彼得格勒自行報告，到後一天，他忽而便自殺了。

克雷莫夫的使命已全歸失敗，郭尼洛夫及其部下鄧尼金（Denikin）羅空斯基馬可夫（Markov）都被臨時政府用命令盡行逮捕。

第三章 共產政府的成立（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第一節 布爾希維克派成功的原因

郭尼洛夫運動崩潰後，俄國革命進入一個新的狀態，克倫斯基顯然已將他的兩大敵黨克
服了，如郭尼洛夫被捕，列甯離開俄國，但這不過是一種虛渺的勝利；克倫斯基並不是一個
真正的權威者，不過是一個政治的鬼魂，不能控制在劇變中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的無政府狀態
。軍人派失敗後，他們立刻反抗臨時政府，國家的統治力現在已不是政府與軍隊，而屬諸蘇

維埃與布爾希維克派的大團結。

在許多真心擁護政府的人看來：克倫斯基戰勝了郭尼洛夫，却使政府的威信終於沒落了。一般官吏與中產階級們都相信克倫斯基的統治制度，也並不比工農的蘇維埃來得怎麼好，他們對於列甯比較對克倫斯基渴望得多，還有許多反動的集團甚至希望蘇維埃的勝利，但在那時誰也不相信這種勝利會持久的，及布爾希維克派會永久統治的。當時有許多建議都未經臨時政府之手，直接轉給社會黨中的極端急進派，因為這些人曾扶助過克倫斯基與郭尼洛夫的抗爭，因此克氏對他們不得不稍予讓步。七月起事時所逮捕的布爾希維克派領袖也被釋放了，就中有托洛斯基其人（註一）。

政府於將來並無如何嚴厲的計劃，他們所希望的充其量不過想在國民大會開過後那把握政權的事。國民大會將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廿五日起開始選舉，十二月十二日舉行開幕，日子一天天地接近了，布爾希維克派迫不得先行召集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他們於十二月七日開會，計劃欲在開會後立刻實行行政變（*Comp. d'etat*），得到大會的同意，制出新政府的憲

（註一）那時列甯還未敢公然自奔回國來，不過他會秘密出席彼得格勒的幾次布爾希維克派會議。

法來。

布爾希維克派人因決心要從事篡奪政權之爭，即行擴大他們的組織與宣傳，所以他們成功得很快，不久便獲得大多數彼得格勒與莫斯科工人的擁護，城市選舉足以表示他們權力的擴張，在莫斯科方面，七月份所舉行的市會選舉，他們祇能控制百分之十一的選舉票，迨至九月，他們已能控制百分之五十一了；在彼得格勒方面，也可以看到他們同樣的發展情形。市選的結果表示勞働階級已不信仰臨時政府與溫和社會黨的了。至於共產黨呢！則有健全的組織與簡明的政綱，端賴工人的擁護，似乎它是能解除俄國當前混亂狀況的唯一的政治集團，前綫的兵士們也表示同樣的感想。

自郭尼洛夫運動崩潰後，前綫的狀況，既不像是戰爭，也不像是和平。當時布爾希維克派堅持要簽訂和約，以為這樣才能制止當前的危機，蓋自郭氏崩潰後，布爾希維克派已漸漸代表俄國最有力的集團，甚為顯明。

布爾希維克派不但與軍隊中的蘇維埃具有密切的關係，且與北俄軍隊中的最高命令長官也有相當的聯絡，這是由於克倫斯基的策略，將總部中郭尼洛夫的徒黨，完全易以有社會主

義傾向的將官，北軍的新指揮官漆里米索夫（Cherenisov）與蘇維埃又與其防地北斯哥夫（Pslov）的布爾希維克派進結一種相當的關係。

布爾希維克權力膨脹的關鍵，在乎他們能否在彼得格勒的蘇維埃中獲得勝利，一九一七年十月托洛斯基被選為總裁，同時他們又得控制了蘇維埃的軍事委員會，實際已變為他們黨徒政策的總機關，駐在彼得格勒的大部分警備部兵士們也服從他們的權威。至此，布爾希維克派遂準備作最後的擊鬥了。

第二節 克倫斯基政府的傾覆及彼得格勒莫斯科布爾希維克政府的建立

十一月四日晚，蘇維埃的軍事委員會處於布爾希維克的勢力之下，發佈第一道命令給予彼得格勒的警備部，命駐在首都的兵士統統歸從於軍事委員會，這實是反抗克倫斯基政府的一種公然的叛逆行為，那時克倫斯基與一般溫和黨派的領袖們還盲目地不知輕重，依然彼此爭論，不謀實際的自衛策略。

迨十一月七日深夜，彼得格勒的政府官舍盡被布爾希維克的軍隊所佔，那天早晨布爾希維克黨所發的傳單上，宣佈以下的幾條政綱：（一）立刻與德開始和平談判；（二）瓜分大產業；（三）所有工廠由工人管理；（四）創立蘇維埃政府。

克倫斯基到最後才認識自己已陷入危險中，遂潛離彼得格勒，重復去集合軍隊與布爾希維克黨人作頑強之鬥。當他離開政府時，總理職則由另一閣員暫代，可是那時彼得格勒的警備部已加入了布爾希維克黨，政府已沒有足可自衛的真正軍力了。當布爾希維克黨人進攻冬宮（Winter Palace）時，內閣剛在開會，祇有少數的武備學生和一隊娘子軍出來抵抗，遂即慘敗，終至內閣閣員亦被逮捕，於是政府的大權便落入列甫的手中。

臨時政府推倒後，他們便接連召開第二次蘇維埃大會，大會中的社會革命黨與門希維克派却對布爾希維克的起事提出異議，不過終於未能阻止這次大會的進行，十一月八日夜，全體同意布爾希維克黨所提出的政綱。

內閣則用人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的名義也組織起來了，以列甫爲主席，托洛斯基被推爲外交委員會委員長，雷可夫（Rykov）爲內政委員長，斯達林

(Stalin) 爲民族委員長，以及盧那却爾斯基 (Lunacharsky) 爲教育委員長。

人民委員會的第一次舉動便是一致通過「和平決議案」(“Decree of Peace”) 「土地決議案」(“Decree of Land”) 前者提議所有參戰人民及政府爲達到正義與民主的和平起見，立刻開始無割讓與無賠款條件的談判，雖然這和平決議案乃對所有參戰國家而發，但昔日曾與俄國同盟諸國却顯然並未注意及此，這不過使俄國邊疆上迫着停止了敵鬥行爲，也就是布爾希維克黨所求之不得的事。

土地決議案廢止了土地的私有制，以及土地應由一般農事工人平均分配，所以十一月八日那夜，布爾希維克黨不但組成了政府，且宣佈了許多對於當日主要問題的新政策。

當時克倫斯基到北斯哥夫總部所在地去，北綫指揮官漆里米索夫因與地方蘇維埃已有聯絡，故對克氏之欲恢復政權，不予幫忙。克倫斯基至此自己知道已成爲衆矢之的了。至於第三騎兵隊指揮官克拉斯諾夫 (Krasnov) 則是個固執的保皇黨黨員，對克倫斯基的政策也不表同意，而且他的部隊又散處各地，不能緊急召集攏來對抗叛軍；其它如控制首都交通的鐵路工人委員會也對克倫斯基不予援助，因此每况愈下，雖然，克拉斯諾夫曾調其一小部分隊伍去

抵抗布爾希維克黨，直達查斯科西羅，離彼得格勒祇十五英里了，不料遇着自從彼得格勒開來的武裝工人的大隊與一部分水兵的強敵，終因孤軍無援，毫無建樹。當時更有布爾希維克的軍事領袖達朋可(Dybenko)煽動一般克拉斯諾夫部下的哥薩克(Cossacks)人勸他們反抗克倫斯基而投效列甯。

迨至十一月十二日，又有一小部分的人起事於首都，這時唯一的反布爾希維克的軍力只是許多武備學生，經幾仗巷戰後，連這少數人都被繳械和鎗殺。當時克倫斯基被人警告道：克拉斯諾夫的軍隊都要離貳而投布爾希維克黨了；於是克氏深怕被殺，立即不參與對布爾希維克的鬥爭，偷偷地逃了。

克倫斯基去後，頓使臨時政府的徒黨們缺了一個領袖，他們與布爾希維克黨抗爭，在軍隊方面與在全國，都沒有堅強的組織，軍事最高命令官的制制權先早被克氏所壓制，而一般兵士們也已公然擁護蘇維埃，即官吏們也不信任而懷恨克倫斯基，全國各地的工人們也都傾向於布爾希維克主義，至於一般布爾喬亞與智識份子雖然反對，但可惜他們是沒有組織的。

自從八月郭尼洛夫運動失敗後，各城市警備部的司令部，曾由克倫斯基以新員，他們所以能被克氏任命者祇因政治主張是同情於臨時政府的，但在他們的指揮之下，都被一般官吏們所不服，而且警備部的兵士們又對當時政戰，十分淡漠，更有一般人已被布爾希維克黨所感化。

當布爾希維克黨第一步圖謀改變時，最頑強的抵抗力是在莫斯科，上千的武備生與義勇軍，大多數是大學生，很想抵抗布爾希維克的起事，經過一星期的浴血巷戰，布爾希維克黨居然把他們的敵人完全壓平，布爾希維克黨奪取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大部分軍隊的權力後，他們便有堅強的力量，如今真正的反抗者，只是東南俄國的哥薩克區域，在中部俄國，布黨（即布爾希維克黨，下仿此）已至高無上了。固然，布黨之奪取政權，祇費一星期的短時間，但新政府欲獲得實際統治全俄之權，恐為期尚遠呢！

第三節 布爾希維克權力自彼得格勒莫斯科擴張至各省的情形

蘇維埃政府當前的問題是停止戰爭，剷除那迅速發展的南俄反革命運動，以及經濟危機

的解決，最要者在能克制克倫斯基所繼承下來的大政府機關，從前布黨在野爲敵黨時，當然很易批評政府的政策，曾對民衆許以若干動人的諾言，到如今他們該實行他們的諾言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初革命後，中央國家機關的官吏與地方上的當局都服從新政府，但布黨革命後，新政府却遭遇合格的政府公務人員的反抗，如在彼得格勒，前政府的有權者堅決反抗新政府，這所以反對的原故，由於前政府中贊同布黨的政變者，祇限教育階級中的少數份子，其他一般智識與中產階級不像兵士和工人們，却都對布黨表示不信任，在大部分民衆的眼光中看來：布黨只是中歐同盟國的代理者，它背負俄國對協商國的信約；就是至今一般俄國布爾喬亞階級還是這樣感想着。不但此也，而且其時誰也不相信布黨政府是會永久的，似乎兩三個星期也難維持的樣子。

彼得格勒人都希望莫斯科不要也落在布黨手中，莫斯科人也同樣希望總部或哥薩克人能對布黨作頑強的抵抗，政府官員的罷工就是表示這種希望，國家銀行的職員也拒絕服從新政府的指揮，那時布黨人毫無辦事的經驗：幾乎弄得孤力無援，但傾覆新政府的起事始終不起來，致使蘇維埃政府迅速地擴張它的權力，人民委員會漸漸控制了這個局面，許多前政府官

員都被斥職，否則令其加入新政府服務，而重要職位都派共產黨中的新人物去承乏，在幾星期以內，布黨居然已將莫斯科與彼得格勒的政府機關克服住了。

布黨不用武力漸將他們的威權從莫斯科與彼得格勒擴張到各省的大部分去，不過由共產黨所獨裁的蘇維埃政府只限於都會地方而已。布黨革命本來只想把臨時政府的權力移到蘇維埃去，在各省方面，地方蘇維埃裁撤省政府委員會，但蘇維埃的權威祇能擴張到各城，至於一般鄉村基本社會，即在臨時政府之下的，也反抗中央，現在並完全對新政府獨立，另由傳統的鄉村理事會所統治，所以各省地方政府各各不同，非等到布黨獲得各個蘇維埃的統治權後，地方蘇維埃之依賴蘇維埃政府，總不過是名義上而已，迨後派遣游說者和武裝保護者到各省去，才算名副其實。

新政府所用剷除亂源的主要策略，便是政治警察制度的厲行，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由列寧命令，成立「剷除反革命特種委員會」(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 俄名 Чекка 基卡)，第一任領袖為特善岑斯基(Felix Dzerzhinsky)，宣佈「紅色恐怖」(Red Terror)，對抗蘇維埃國家的一切敵黨，一九

一八年秋發生反抗布黨領袖的事，南俄的反革命表示以及協商國的干涉俄國，自此以後，「紅色恐怖」愈形活動，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冬，「紅色恐怖」已活動成熟，將許多人活活慘害，蓋布黨之慘殺事件並不算一回偶然濫用權威的事，所謂「紅色恐怖」簡直已成爲布黨政府一種不可少的成分（註一）。

列賓大言道：『普羅列塔里亞的獨裁政治非用恐怖與暴力不爲功』。正式講：「基卡」是用來對抗布爾喬亞的。「紅色恐怖」的領袖（領袖之一）賴基斯（Latsis）說道：『我們並非與個人鬥爭，我們要消滅布爾喬亞自成一個階級』。在事實上「基卡」是要不分彼此消滅一切有反對布黨政府嫌疑的人，其中固含有較高的階級，但也含有農工。「基卡」所用的一種方法是使非共產主義人民的集團中人作爲質押（Hostages），其實這種抵押者常常是一些不反對政府的人，他們却隨時慘遭格殺，尤其自謀刺共產黨領袖的事發生後，益發變本加厲，至於得到

（註一）這便是「紅色恐怖」與所謂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主要區別之點，「白色恐怖」乃是許多人與反革命力量量的代理者所濫用的權力；不過白色政府他們自己是不敢公然宣佈或執行的，而且在「白色恐怖」下遭害者總較「紅色恐怖」少得多。

罪狀與認招後，而加以慘酷的刑罰，更是無論的了（註二）。

除由「基卡」明令處決之後，還有許多人被各省個別布黨集團所正法，一九一八年春，山凡斯托樸爾(Sevastopol)官吏之被聯合處決案便是一個好例。

除了政治警察以後，政府又有「紅軍」或「工農軍」的扶助，所謂「工農軍」是在一九一八年所組成的，其中含有以前軍隊中的兵士與年青的工人；最初「紅軍」是一種雇用的軍隊，獲得優良的報酬與特殊的定糧，也賦予兵士們合法的強劫機會，軍隊的紀律不甚完善，其效能不過對付對付手無寸鐵的民衆而已。它只是代替舊時的帝軍，蓋帝軍自與德國開始和平談判後早已潰不成軍，而自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Brest-Litovsk Peace)簽訂後，帝軍終被解散。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冬，國內政治機關已全歸布黨所統治，那時經濟困難的急需

（註二）中央與地方「基卡」所處殺的人，簡直不勝枚舉，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正式」的就刑者在千人中約達十人

（約七萬人），其他還有許多無從統計的及不公開發佈的案件，鄧尼金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f General

Dankin)司觀察南俄「基卡」之行動，據其計算，光在南俄一處，已曾處死過一百七十萬人。

解決，是當前全國最嚴重的問題，布黨不但未能把它解決，且看它隨時間的過去，因而愈攪愈大，終至無可收拾，如盧布的價值日跌，物價已較從前高出數倍，鐵道狀況愈趨腐敗，以及工業生產方面，已反映出工人管理工廠的不切實際。布黨所能解決的唯一問題（還只是一半）是城市的糧食供給問題，尤其供養一般共產黨份子、蘇維埃組織的雇員以及一般工人爲最甚，這件事的成功，端賴索取城市的所有糧食與來自鄉間的食料，再用定糧券分配給各種居民，共產黨份子與工人算是得到最多的一類人，政府人員爲中類，受雇者與匠工爲第三類，除此以外，都稱他們爲「不生產份子」(Unproductive elements)，這類人不算是政府所留意的對象。至於平均的定糧，每人每日可得一磅麵包，無論何人不能用合法的方法去購買超過定糧的餘物，如誰被剝奪了這定糧券，誰便幾乎要餓死，這種情形得使布黨對城市人民操握着生死的大權，因爲食物的分配，全由此管理着。不過這種分配法尙屬問題，我們知道食物是來自鄉村的，從前因在克倫斯基的統治制度之下，政府於供給製造物或安定幣制流通兩點，完全無能，所以農民們早已拒絕與政府相合作；不料現在布黨政府於滿足農民的需要一點，甚而至於更顯得無能了。

十一月八日關於國有產業的決議案，以作緩和農民的策略，其重要處不過等於具文；何以呢？因為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前地主們的產業早已被農民所瓜分完了。當時城市的穀類非常需要，政府遂毫不遲疑地用武力奪取了農民們的穀類，組織特別的「食物軍」(“Food battalions”)，包含紅軍、警衛隊與「基卡」的人員，派到各鄉村去，農民們想把他們所有的穀類藏匿起來，或甚至有憤而消滅它的，然而大量的穀類終被他們所奪去，而送到城市中。

這種策略當然激起農民們對政府嚴厲的反抗，以致愈鬧愈大，竟惹起邊陲各地的武裝的反抗，蓋在這些地方，大都政府的權力極其微弱，而離中央又很遼遠，政府大有鞭長莫及之苦。

第四節 與德和平談判的開始及舊俄軍的解體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廿日布黨政府命令陸軍總部速即提議停止對於敵國的敵鬥行爲，總司令杜可甯(Dukhonin)回答道：這是政府的事，並不是軍隊的事。翌日政府即將他斥職，另

委克里倫可 (Eusign Krylenko) 繼任之。十一月廿二日托洛斯基通牒駐在彼得格勒的協國大使，建議「在所有戰綫上都立刻停戰與立刻開始和平談判」。又對駐在彼得格勒的中立國外交代表，也送達同樣的牒文。

駐俄協商各國的軍事代表，都抗議俄國與德國的單獨講和，似乎他們並未認識這嚴重的局勢，有許多協商國代表似還信任布黨會提出一般的民主和平，不信後者已準備與德單獨講和。十二月一日美國軍事專使團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團長裘德森 (Judson) 訪謁托洛斯基，謂「對於蘇維埃政府的抗議與恐嚇時期已經過去了，假如這種時期以前曾存在過的話」。

昔日臨時政府召集國民大會的決議案，蘇維埃政府並未把它撤消，大會的選舉於十一月廿五日開始，顯出布黨尙居少數份子，在七〇三個代表中祇能控制一六八人，大多數的代表盡屬社會民主黨。故選舉的結果，顯出布黨的不穩固的地位，却促成了德人所欲的和平談判，中歐同盟國與蘇俄間的停戰，遂自十二月三日始。

當時軍隊已不成其爲一個有效的組織，前總司令杜可寧已被殺死，布黨間諜克里倫可已

完全統治了總部，因而激起軍隊的最後的解體，在西俄和哥薩克邊綫上那上萬的兵士都擅離職守而解甲歸田了。

第五節 南俄武裝反抗布黨的準備

正在這時（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南俄已在準備對布黨作武裝的反抗，其中包含兩種主要力量：頓河（Don）庫巴（Kuban）流域的哥薩克人及舊軍隊中一部分官員。

我們看到哥薩克人是代表帝俄的傳統單獨集團，他們比較平常的俄國農民來得富有，也多多享受真正的自治，故他們都不願順從共產黨的統治。

因此反抗布黨的武裝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事，不過在哥薩克人中，祇有少數才認識這個鬥爭的不可避免性，在起初時，大多數人都希望布黨不敢冒進攻的危險，因此之故，哥薩克人很是大意，並未動員作鬥爭的準備；不但此也，在頓河和庫巴兩流域還居有許多未能享受哥薩克特權的農民，所以哥薩克人的聲勢，甚見微弱，除全人口百分之四十八是農民以外，頓河的工業區域還引入了不少的織工與礦工，達全人口百分之十一，這大部分人是同情於布黨

的。

這種情形迫使哥薩克人的領袖們作鬥爭的準備，頓河的哥薩克領袖們最怕俄軍官長的運動也許會喚起布黨對頓河的進攻。官長組織的領袖自然是屬諸前俄軍總司令亞歷西夫與郭尼洛夫。布黨起事以後，亞歷西夫便從彼得格勒來到頓河，那地哥薩克人會長加萊亭(Калейтин)是亞氏的好友，許他組織義勇軍，並担保嚴守秘密；至於郭尼洛夫呢？一九一七年九月叛變運動失敗後，即被克倫斯基所監禁，迨布黨起事後沒有幾個星期，他即乘機潛逃，也來到頓河流域參加亞氏的運動，與頓河官長組織同時而起的，還有一部分官長，在俄軍接近羅馬尼亞的邊綫上，也自行有一種組織，不過兩者彼此獨立，至於俄軍官長們之所以反抗布黨者，除了政治的圖謀以外，還有一種職業的原故，心想重建俄軍，得繼續與德國戰爭，以資恢復在協商國眼光中的俄國光榮，蓋那時蘇維埃政府實已喪失了對協商國的信約。

義勇軍的發展並不甚速，大約每天可徵募七十五個士兵，其中大多數都是職員，武備生與中學校中的孩子們，軍隊既沒有大炮，也沒有來福鎗或軍器，其經費的來源，全靠莫斯科與其它都市私人的捐贈，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八年冬間，亞歷西夫總共收得五百萬低價的

盧布，反布黨運動的最高命令是代表一種三頭政治，包含亞歷西夫是運動的主要人物；郭尼洛夫是軍事行動的總司令；加萊亭是頓河哥薩克人的會長。一九一八年初，義勇軍遂決計準備對布黨開戰。

第六節 國民大會之解散

正在與中歐同盟國進行和平談判時，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國民大會舉行於彼得格勒，布黨為運動代表們擁護蘇維埃政府起見，會將此次大會延期舉行，會中大多數人是社會革命黨，故使政府頗感為難，布黨所用剷除異己的第一部方法，是將所有的非社會黨代表盡行逮捕，就中有兩人甚至被布黨慘殺於醫院中，然而其餘一般非布黨代表依然拒絕承認人民委員會為俄國的合法政府，布黨代表不得已祇得一致退出會場，反對政府的舉動仍不稍息，在馬路上鬧得如火如荼，不幸終於被布黨所壓平了，到了一月二十日早晨一點半鐘，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發佈解散大會的命令，將所有代表逐出會場，而在布黨的軍力保護之下，不准再開任何會議。

第七節 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之簽訂

國民大會之解散，足助長德國人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與布黨所開和平談判的聲勢，德人要求俄國許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Latvia）與愛沙尼亞等國的獨立，烏克蘭的代表也要求給以自治權，這些提議實超過布黨所預備接受的限度，故於一月廿三日宣佈反對德人所提的條件。德人因欲在俄國握權，做得好像是中歐同盟的代理者，布黨雖欲解脫這種羈絆，然已過遲了，蓋俄國自將軍隊解體後，在德意志軍國強暴之前，已顯得是孤力無援的了。

德人更進一步甚欲完全消滅軍國列強俄羅斯，先鼓勵烏克蘭的自治運動，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烏克蘭遂自行宣佈是一個自治的共和國，實際起初是被中歐同盟國的代表所統治的。說也奇怪，英法兩國隨後即承認烏克蘭共和國的獨立，但其生存的時間是極短促的，至二月八日其首都基輔即被布黨軍隊所佔領。

當此之時，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的和平談判遂陷於停頓中，蘇維埃政府的交涉代表托洛斯基已拒絕接受德國的條件，但於二月十日宣佈說：俄德的戰爭已經終止，俄軍亦已解散等

語，這種失望的表現，反喚起德人的恐懼，可謂奇突莫解（註一），德軍忽又進攻俄國，而佔基輔；奧軍亦直達黑海之敖得薩地方，因而逼使蘇維埃政府放棄對於和平條件之堅持，遂於三月三日毅然簽訂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

和平的條件對於俄國是非常不利的，烏克蘭、波蘭、芬蘭、立陶宛、愛沙尼亞暨拉脫維亞等都獲得獨立，一部分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割給土耳其，俄國失去了百分之廿六的全人口數，百分之廿七的可墾種的土地，百分之三十二的平均的穀類，百分之二十六的鐵路綫，百分之三十三的生產工業，百分之七十三的鐵工業，百分之七十五的煤場，除此以外，俄國還須償付大量的賠款；且在戰時，俄國死傷之數竟達二百五十萬之譜，如此這般，算是俄國參戰的結果罷！

（註一）羅登道夫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那時托洛斯基實做了協商國的傀儡。

第四章 俄國內戰（一九一八—一九二〇）

第一節 農民對布爾希維克政策的不滿及濟窮委員會在鄉村中之建立

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簽訂後，俄國遂停止參加戰爭，得使布黨從容從事剷除南俄的
反革命勢力與農村區域中的反對派。

布黨蒐集食料的政策，各地農民們對之都表示不滿，他們本想一致起來反對政府的，奈

農民羣衆缺少一種統一的組織，以致未能實現，一九一七年夏起，不法的土地掠奪頓行開始，當臨時政府崩潰後布黨革命前，許多產業早被農民們攫去，至一九一八年春，幾乎所有的土地都已重行分配給農民們了，以前土地的主人不管是鄉村自治團體、地主、或斯托雷賓改革後的農夫（註一），概無軒輊，盡被一般農民所奪去。

每一州（County俄名 Uyezd）全部土地的面積，根據純粹數額重行分配，以前的地主們每人祇能得到殘餘的部分，因為各州面積有大小之不同，所以新分配的土地總數常與州中地產的數目與體積有所不符，以致各州農民所能得到的部分也各各不同。土地的分配，概由農民們自行實施，政府頗少與聞，一九一八年的政策，消滅私有地產制，一概賦予基本社會（Community），這足以鞏固鄉村的利益者極大。

當時政府欲行攫集積穀以供給軍隊與都市中普羅階級的政策，在各方面深怕農民們的反對，因是想出一個方法，將鄉村中的農民分成團體，使他們互相對立，以冀消滅整個農民們的政治力量，這方法便是濟窮委員會（Committees of the Poor）的創立，將農村的人民分

（註一）一九一七年這類農夫有六百萬。

成兩個團體，其一包含較為富有的農民（富農俄名 *Kulaki*，中農俄名 *Seredniaki*），其它包含貧農（俄名 *bedniaki*，這類人沒有田牛，或沒有積穀）。布黨在鄉村中所代表的權力屬諸貧農，使後者組織委員會，監視富農不致在政府徵收員來鄉時有藏匿穀類之情事，他們也有權攫取剩餘的穀類和田牛，這種政策實將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輸到鄉村中去了，「掠奪那掠奪者」的標語，初於攫奪大地主的土地一點上見之，但如今轉而對於農民雖或佔有少數田畝或兩三頭牛也反對的了。

濟窮委員會的行動，反使農業受到嚴重的衰頹，富農們所出售或藏匿的穀類與屠殺的田牛比窮人所攫奪的數目來得多，輸到鄉村社會中去的革命的鬥爭，盡將整個農民們的力量吸收住了，因此得讓布黨自由措置其它的計劃，可見濟窮委員會實是擁護鄉村中布黨的主要份子。

第二節 反革命運動的爆發及紅軍的發展

到了一九一八年夏，布黨的權力不但伸張到俄國的都市中，抑且及於鄉村的區域，它的

障礙力只是南部東南部和東部俄國的反革命運動的爆發（註一）。

布黨欲重獲其所得的領域起見，急需改組紅軍，因為當時紅軍尚未形成一種有效的戰鬥力。一九一八年六月蘇維埃政府根據強迫的徵兵制開始實行改組，托洛斯基被推為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幹，即陸軍部部长。舊俄軍隊中的將校和參謀部的官長都被調任於紅軍的新組織中，蓋紅軍仍是仿倣帝俄軍隊的模樣。一九一七年所組織的兵士委員會取消，另由共產黨份子組織「共黨幹部」（'Communiste cells'）以代之，授以維持嚴格紀律的威權。紅軍中大部分官長都是舊俄軍隊中人，不過許多共黨官長都由該黨遞升官級。

至於舊軍隊中人所以不得不服務紅軍中者，也許由於他們恐懼「基卡」，或缺乏其它糊口的的方法，更或慣於職業的兵役之故，迫應募後，許多官長很怕一旦被反布黨所擄，難免報仇，因此使他們誠意替紅軍服務，這可說是一個有力的動機（註二）；而在它方面，如有人謀叛蘇維埃政府後，須將此人家庭中人抵押給「基卡」，以迫其順從。

（註一）參看本章第三節第四節。

（註二）許許多多紅軍官長俘虜都被反布黨所殺。

在內戰聲中的紅軍最高命令官大都是從前帝軍中的老練的官長，如蘇維埃的最優良的戰術家加米尼夫 (Colonel S. S. Kamenev) 便是昔日帝軍總參謀部中人(註1)，不過也有後起之秀做了新的領袖，就中以劉加察甫斯基 (Lieutenant Tukhachevsky) 與白特內 (Sergeant Budenny) 爲最著名。一九一八年所行的徵兵制祇將一半人徵來，然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蘇維埃政府已擁有四十萬的大兵了。

蘇維埃政府的第二個演進的形態，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間軍事勝利的直接結果，內戰使紅軍變爲一個有力的組織，也使蘇維埃政府變爲一個强有力的集權的政府。反布黨的努力反產生一個與他們的旨趣全不相符的結局，他們倒促成了服從蘇維埃政府意志的堅強的軍力。

第三節 義勇軍哥薩克人與布黨的鬥爭及德國人之佔據烏克蘭

一九一八年初，正在與中歐同盟國磋商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時，布黨想把南俄的反

(註1)不可與 L. B. Kamenev (Kosenfeld) 相混，此人是個共產黨的首領，但後來變爲反對黨的主要份子。

對派完全剷除。頓河和庫巴流域統由軍隊所佔領，這種軍隊是由西綫上與土耳其的高加索邊綫上所調回來的。頓河哥薩克人的酋長加萊亭眼見哥薩克人一日衰敗一日，忽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憤而自殺。

在那時候；唯一的有組織的布黨的反對派是新組的義勇軍，所部不到四千人，武器與設備很壞，經費又不足，雖然他們乃由顯赫的領袖及舊俄軍的優秀將官所指揮，而其中又都包含官長武備生與大學生，然而欲在頓河所能反抗布黨的力量畢竟太少了。二月廿二日郭尼洛夫所領的義勇軍進犯庫巴流域，目的在救援反抗布黨的哥薩克孤軍，與非常優良的布軍經過一次鏖戰後，郭尼洛夫竟能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二七日併合庫巴的小部隊，迨與後者鎔化後，郭氏即毅然進攻業卡忒里諾達 (Ekaterinodar)，乃是布黨軍力在庫巴地方的中心點，但不幸初次襲擊便失敗了，迨至第二次進攻之前，郭氏忽被戰死，於是鄧尼金 (Denikin) 繼任總司令，義軍遂退出業卡忒里諾達，轉向頓河流域前進，因為布黨在那裏的統治制度已經失去民心了。義軍雖受重大的損失，但比第一次參戰的人數為多，約有五千名戰鬥員，此外一千五百名已經受傷。

到了四月中旬，頓河的哥薩克人起來反抗布軍，想把後者逐出諾伏察加斯克（Novochebsk），經過幾次的得失，最後終歸哥薩克人所佔有，則該感謝義軍時的援助，蓋義軍在南俄劇戰後，當鬥爭最危險的當兒，常出沒於諾伏察加斯克，從羅馬尼亞的邊綫上（註一）去助戰。五月十一日召集哥薩克大會，舉克拉斯諾夫爲頓河哥薩克人的酋長。

當時雖然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已經簽訂了，但德軍依然向頓河進展，顯然旨在深入北高加索地方，羅斯多夫（Rostov）於五月八日被佔，克拉斯諾夫即與德人談判，德人願意供給克氏武器與軍械，去與布黨鬥爭，其目的無非想從事南俄的經濟拓殖，但同時又借駐在莫斯科第一任大使米爾布哈（Mirbach）伯爵之口，表示德人願與蘇維埃政府相互親善，可謂自相矛盾。德軍佔領烏克蘭後，與烏克蘭政府結一條約，於是德遂獲得南俄經濟的拓殖權利，在這區域內，重新使地主們恢復了他們的地產，立刻就推倒了半社會主義的烏克蘭政府，宣佈斯科羅班特斯基（Skoropadsky）爲政府領袖，但實際是由德國所統治的。

（註五）參看第三章第五節。

第四節·捷克斯拉夫人的起事及執政部的成立

在一九一八年夏間，頓河和庫巴地方已沒有布黨了，頓河已由克拉斯諾夫所領的頓河哥薩克人所平定；庫巴亦由一萬人衆的義勇軍與庫巴哥薩克人的努力所收服；另在東俄的倭爾加（Volga）河上游，蘇維埃政府又碰到一個更嚴厲的威逼，東俄對布黨的武裝反抗，首由捷克斯拉夫人發動，遠在俄國革命以前，昔在奧地利戰爭中的捷克籍俘虜，爲了實際行動起見，早已形成一種組織，一九一七年夏，他們也曾參加過克倫斯基對中歐同盟國的進攻，自從俄國退出大戰後，這些捷克軍隊約有四萬之衆，會要求調他們到西綫上去繼續與中歐同盟國戰爭，因此將他們調到西伯利亞，第一隊捷克軍於一九一八年五月抵海參崴，但最後一隊還未越過倭爾加河一步，蘇維埃政府顯然處於駐莫斯科德大使米爾布哈的勢力之下，即將捷克軍繳械，捷克軍是同意了，但隨後莫斯科的傳來的命令道：他們將如戰時的俘虜，被幽囚於中立國內地，於是激得他們憤而起來反抗布黨了，一九一八年六月初，捷克人佔據薩麻拉（Samara）與海參崴間所有的要城，自此以後，整個東俄與西伯利亞便發生反布黨的政治革

命。

傾覆西伯利亞布黨政府的計劃，是由舊官長的秘密組織與曾被蘇維埃政府所逐出的社會革命黨兩派所擬定，這兩種力互相密切地合作，他們起事所準備的理由，在攻擊蘇維埃政府沒收農民穀類的行爲，及利用烏拉爾(Ural)哥薩克人對蘇維埃政策的大不滿作爲口實。有力的農民合作社大多數雇員都是社會革命黨黨員，他們與捷克人維繫一種極密切的關係，因爲大多數捷克人也都是社會黨份子。他們在薩麻拉組織起一個政府來，以察諾夫(V. M. Chernov)爲首領，察氏以前是一九一八年國民大會的主席，政府中又網羅了大會中三十四個社會黨份子，但這個政府是很微弱的，它也會組織過一支「民軍」(People's Army)，但缺點很多，凡克倫斯基隊中的缺點，它都具備，農民們也並不信任這個政府，祇因社會黨的農村政策與莫斯科布黨所主張者並沒有多大兩樣。

民軍得到捷克人與地方哥薩克人的扶助，到了一九一八年八月，在西俄與東俄的戰綫而伸張到倭爾加和加麻(Яма)河邊，最初時薩麻拉政府的軍力確曾得勝過，自佔領了喀山(Kazan)城後，他們所奪得俄羅斯國家銀行的準備金共達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之譜

，後經紅軍反攻，逼得薩麻拉軍隊不得不撤退，當時在鄂木斯克(Омск)又組織一個政府，漸獲權力，這個政府內含許多保守份子，得到西伯利亞農民合作社的扶助，這便所謂西伯利亞政府，它能調動二十萬人，但也具備一九一八年秋民軍的弱點，其能命令反布黨的力量，幾及於整個的西伯利亞，直達貝加爾湖(Lake Baikal)。迨九月廿三日，薩麻拉政府與西伯利亞政府相聯合，但成一個執政部(Directorate)，內含五人，就中以社會革命黨勢力為最大，他們會想羅致亞歷西夫，當時他正盤桓於南俄，但不幸在事前忽已逝世開了，因之政府缺少一個有效能的領袖。當此之時，在俄國遠東存留着整個的亂象，許多地方政府正在那裏作爭權奪利之舉。

第五節 列強在停戰前的聯合干涉

捷克人的起事與西伯利亞新俄羅斯政府的組織在西歐發生一種極大的印象，協商國甚至想到可以重使俄國在倭爾加河上佈置起陣綫來抵禦德國，從這些希望產生一種良好的印象，於是協商國毅然出來干涉蘇維埃的政權。

協商國干涉布黨的決心，是經過幾月的躊躇才實行的。她們首先欲得布黨的諒解，直等到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簽訂以後，她們始失去了蘇俄再參戰的希望。先是法國人尤願與托洛斯基合作，因此之故，協商國從未接濟過南俄的義勇軍。同時駐彼得格勒的美國軍事專使團也曾發表正式公文，否認在加萊亭的軍隊中參有美國的官員，一月廿三日駐俄美國紅十字會也堅求華盛頓立刻承認蘇維埃政府，以謀寬宏的與同情的合作。

雖然，失望之餘，駐俄的協商國外交團便不得不立刻圖謀反蘇維埃政府的步驟，一月十四日對駐彼得格勒羅馬尼亞公使的被捕事件提出抗議，自蘇維埃政府宣佈鈞銷外債後，二月八日外交團又發出一通憤懣的照會，其反對布黨的主要理由，在乎追問協商國歷來供給俄國的軍械問題，因為如今這些軍械已在布黨控制之下了；協商國深恐布黨或將軍械轉給德國，故於一九一八年春遣海軍直達北冰洋，在麥孟斯克 (Muransk) 登陸，這種行動並不是正式反抗蘇維埃政府之舉，不過藉此增加聲勢而已，協商國的使館也自彼得格勒遷至倭羅格達 (Vologda) 與亞爾干日爾 (Archangel) 兩地。

八月二日協商國軍隊開到布爾干日爾後，即在那裏起來與布黨當局抗爭；又在協商國的

保護之下，在北俄組織一個臨時政府。

協商國在俄國干涉的性質，很難確說，總之，這是一種不徹底的干涉，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美國政府的正式公報，將這個情勢看得很清楚，它說：在俄國所取的軍事行動，只是助長捷克人反抗武裝的德奧俘虜，以冀努力促成自治與自衛，俄國人自己正願意接受這種援助呢！因此美國政府換一個方針，向日本提議彼此應派千人到海參崴去（註一）。

到了一九一八年秋，蘇維埃政府的地位似乎十分絕望的了，它祇能統治中部歐洲的俄羅斯。在南部，烏克蘭已被德奧所佔領，頓河流域也已經對布黨獨立，與德國友好的了，其餘如布黨在庫巴流域的勢力早已絕跡，但庫巴地方却是反對德人的，南部烏拉爾與西伯利亞之權，也已操在捷克人與執政部的手中——這是對德意志的一個有力的威逼；至於極北與極東一帶，已被協商國的軍隊所佔據，在蘇維埃統治之下的俄國領土，已回復到昔日十六世紀時那樣，祇限於莫斯科一隅，正在這當兒，苦戰告終，德國終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全部

（註一）

日本政府正急欲一現政治色相於西伯利亞，因遣大兵至海參崴，二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駐在西伯利亞的日軍

有六〇、〇〇〇人，美軍八、四七七人，英軍一、四二九人，意軍一、四〇〇人及法軍一、〇七六人。

降服了。

第六節 列強在停戰後的聯合干涉及召集普林基坡會議之提議

停戰對於俄國事務產生一種出人意外的結果，雖然布黨在相當限度中也許是德國的代理者，它曾失了協商國的信約，與德軍獨簽訂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可是中歐同盟國崩潰後，布黨却也受到不少的利益，最要者如昔日德國所佔領的烏克蘭與扶助朝三暮四的烏克蘭政府之行爲，都已放棄，讓給布黨軍隊所有；但反布黨則希望德軍自南俄撤退後，歸協商國佔領，德軍撤退烏克蘭時，乃以整個遣散爲條件，尤如一年前俄軍撤退時的情形一樣，不過並沒有協商國的軍隊從旁監視着，德人則不許斯可羅班特斯基領導下的烏克蘭政府用武裝軍隊衛護。不料當德軍撤退後沒有幾個星期及社會黨烏克蘭會長潘忒羅拉 (Petura) 尙未起來以前，烏克蘭便失守了，最初法國軍隊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佔據敖得薩，但是他們到得太遲，未能奪得德人所留下來的權力；且如欲征服南俄，那還需要一次激戰，不過這時協商國則已無意爲此了。

協商國軍隊的兵士們再也不願意參加新的戰爭，且以後所要進行的方針。英法兩國的見解又難一致，她們對南俄的反布黨運動，都不能加以完全的信任，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引不起真正的武力干涉。英國人並不想實行任何軍事行動，只要佔領了外高加索區域之地已算完事，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英軍所佔領者計有巴庫（Baku）是裏海煤油工業的中心區，巴統（Batumi）是外高加索煙煤區的極端，此外英國政府代表且曾援助過南俄的義勇軍，接濟軍需與軍械之類。

當時法國人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日宣佈在敖得薩區域有最高的權威，並欲從事反布黨的軍事行動，一方還佐以俄國自己軍力的扶助。那時南俄已被英法分成兩個勢力範圍，以頓河流域為界。後來英國停止接濟義軍的軍火，法國便出來直接進攻布黨軍隊，不料法國的政策終歸全部敗北，法軍被布黨的宣傳所感動，都不願出戰，兵士們都不信服上官的命令，結果較弱的布黨軍隊反將法軍逐出了南俄。

西綫上的停戰激成西伯利亞的進展。大戰告終後，協商國失去了俾爾加戰綫上的利益，同時捷克軍隊與布黨戰爭後，也喪失不少利益，他們與中歐同盟國戰爭，只是全盤中的一段

參插，終於被人引誘到了西伯利亞，其任務不過保護保護西伯利亞大鐵道而已。協商國現在想用外交的手腕來解決俄國事務，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中，曾討論到俄國問題，一九一九年一月廿二日威爾遜 (Wilson) 總統逼發請帖，邀請「所有曾在俄國實施或試行政權與軍事統治的各有組織的團體」速推派代表至麻莫拉海 (Sea of Marmora) 邊普林基坡 (Prinkipo) 開會，磋商休戰的事。

這樣一來，沒有幾個月中，蘇維埃政府當前絕望的情勢便完全轉變過來了。布黨與反布黨相同，都被邀出席會議，威爾遜的建議由蘇維埃政府所採納，但反布黨派則拒絕之。至於布黨之所以採納者，由於威爾遜的建議，曾許俄國反抗恐怖的威迫時，無論在其所佔的領土上或對付當前的仇敵，都將予以援助；反布黨之所以拒絕者，因恨蘇維埃的專權與他們辜負中歐同盟國以及不滿意布黨在其統治區域內所進行的難以容忍的政策，反布黨根據這個觀點去觀察，以為威氏的建議簡直是一種侮辱，這實是協商國對蘇維埃政府的一種間接的承認，且對布黨給予一種意義深長的道德上的助力。

第七節 南俄與東俄的反布爾希維克政府

蘇維埃政府乃由共產黨所獨裁，且有強力的中央集權，反布黨政府未免相形見拙，因為它是個既不統一又不集權的政府。

當俄國在內戰聲中，樹立起許多不同種類的反布黨組織，除了祇為外強背景下的政府——如在德軍佔領下的斯可羅班特斯基政府——以外，還有兩個重要政府的形式？第一種形式好像是由人民所選出的地方行政機關，如南俄頓河與庫巴流域的哥薩克組織屬於這一類；第二種形式是由汎俄羅斯組織所樹立的政府，如南俄亞歷西夫政府，乃以舊俄軍隊中的領袖為主腦，又如以薩麻拉社會革命黨為後盾的政府；除了這些汎俄羅斯的行政組織以外，還有西伯利亞柯爾察克 (Admiral Kolchak) 個人所獨裁的政府。

幾個主要反布黨政府的目的，旨在推翻布黨大權後，立刻召開國民會議 (National Assembly)，再按照國民會議的願望，在莫斯科建立一個新的汎俄羅斯政府，這個目的曾由柯爾察克與鄂尼金明白表示過，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對這些誠摯的陳述加以懷疑。

反布黨的主要弱點，一如帝國崩潰後的臨時政府所有者相同，他們也在需要行動的環境之下，還彼此斷斷爭辯，鄧尼金內閣中的溫和保守黨與自由黨領袖們却在從容討論關於將來法律的許多瑣屑問題，例如農田問題討論的結果，最後仍恢復以前農民所有的私人大產業與土地分配等原則，蓋當時原有地主們在反布黨政府的保護之下，想履行他們以前的權利，而因他們在烏克蘭所私有的土地已被人奪去了，所以一九一九年夏羣起反對鄧尼金政府，這可說是反布黨政府的主要弱點所在；不過他們對蘇維埃政府的政策，也未能完全融和。雖然烏克蘭農民所有的土地已被担保，但他們一方面於一九二〇年又起來反抗布黨的徵奪穀類。

鄧尼金政府中的財政部部長小心翼翼地限制紙幣的流入，他按照合理財務行政的原則做去，但結果鄧氏政府下的貨幣標記物太少，不能照付官員與兵士們的薪金，以致發生非法的取得，且有時竟出現公然的盜劫情事；而且農民所受的負擔又最重，故極怨恨這種政策。

沒有一個反布黨政府能為他們的目的，利用農民去反對布黨的政策。在反布黨政府，佔領下各地方的經濟生活，幾與中部俄國一般地支離破碎。爲了增益進款，築高關稅的壁壘，以致貨幣的價值反形低落，而運輸的機關又幾乎盡被軍隊所獨佔，以及鄉村則被戰爭所毀壞。

。在那經濟的領域中，對於反布黨派有利的一點，只是沒有採用社會主義，仍許私人貿易，惟設若干農民合作社，藉以擴張農民們的活動力。

第八節 柯爾察克的軍事行動及其與協商國的關係

我們看到世界大戰的結果，對於蘇維埃政府的情形，有一個很有利的影響，除了以前戰時危殆的毀滅不說，我們現在講到整個蘇維埃的統治問題。在軍事的觀點上看來：一九一九年那年是一個極危險的時期，蘇維埃政府所以能克制反布黨的勢力，由於南俄鄂尼金與西伯利亞柯爾察克雙方的行動缺少合作，他們彼此都想一己達到直接佔領莫斯科的目的，却忘了兩種勢力的第一步須謀統一的事。蘇維埃政府即利用反布黨雙方單獨反抗的弱點，因此易於取勝。

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政變後，柯爾察克為西伯利亞政府的首領，他是一個勇敢而愛國的人，具有至高的目的，指揮那反抗莫斯科的戰爭，不過他是不宜作處理艱難事務的獨裁者，最要一點，雖然他固是一個能幹的海軍司令，但他畢竟不是一個陸地的戰略家，也不

是一個外交家，且在他的地位看來：對於捷克軍隊與協商國方面，須用一些外交的詭計，是很重要的事。至於柯爾察克呢？既不習於西伯利亞的人民與習慣，又缺少個人的感動力；不能像南俄軍隊司令那樣使其屬員與他密切聯絡，柯氏十一月之政變，激起社會革命黨的反對，後者且想立刻用宣傳的方法來掀覆他的權力，並想利用捷克領袖們來共同損害柯爾察克，雖然當前有這許多阻力，然而柯氏依然對蘇維埃政府進行一種攻勢。

在柯爾察克獨裁政治的最初幾個月中，戰爭的勝利是屬於他的，柯氏先佔拍爾姆（Perm）城，一九一九年三月攻入烏發（Ufa），直逼得布黨軍隊潰亂撤退，到了五月，柯氏軍隊更進展到格萊索夫（Glazov）、勃求羅克（Buzuluk）、奧倫堡（Orenburg）及烏拉斯克（Uralsk）一帶。

柯爾察克的戰功給予協商國一種良好的印象，一九一九年五月廿六日巴黎最高會議（Supreme Council）報告柯氏道：協商國「準備援助柯爾察克的政府及其同僚，願接濟軍火軍需和軍糧，希望他們自己建設一個整個俄羅斯的政府」。協商國各列強在柯氏願繼續接受她們的援助之下，只問柯氏及其同僚同意相當的條件，這種條件是（一）召集國民大會（Con-

stituent Assembly)。(一)立刻允許在她們區域內的地方大會採自由選舉；(二)在俄國，不許恢復無論何種特殊權利；(四)承認芬蘭與波蘭的獨立；(五)承認波羅的(Baltic)與高加索領土爲自主的；(六)承認和會的權利得決定巴塞拉比亞(Bessarabia)的性質；(七)將來俄國政府應加入國際聯盟。柯爾察克答覆道：等到他破滅布黨後，第一道命令便是召集國民大會，不反對波蘭的獨立，不過將來俄波邊界及芬蘭與巴塞拉比亞問題須待俄羅斯國民大會決定之，柯氏也承認波羅的與高加索的自主，至於俄國內部問題的政策，柯氏担保允許不會再回復舊的統治制度。最高大會「歡迎」柯氏的答覆，所以協商國即於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二日履行原信上所說的話，願意資助柯爾察克及其同僚；同日鄧尼金宣佈投從柯爾察克，尊他爲最高的統治者。

柯爾察克的外交環境，似乎十分優良，不過協商國的資助不能證明是一個爭鬥成敗的真正原素，先決點還要看柯爾察克與蘇維埃軍隊雙方的軍事戰略如何以爲斷。

柯爾察克軍隊共計一二五、〇〇〇人，對一一〇、〇〇〇人的蘇維埃軍隊，捷克人蓋達(Gayda)所領的北隊，是柯氏軍隊中的最強者與設備最好者，柯氏的軍事計劃須根據這支北

軍的行動，因而加入白海濱的英俄軍隊，但這個計劃是陷入大錯的，其一，拋棄了與南部鄧尼金軍力相聯合的循環式計劃；其二，柯軍防綫的中心點兵力因此十分單薄。蘇維埃總司令加米尼夫。即前帝軍總參謀，他認清敵軍的弱點所在，立刻向柯軍防綫中心點着着反攻，卒獲成功，不過須立刻撤退，柯氏北軍恐絕歸路，也同樣撤退，這次柯氏的進攻不幸完全潰敗。

蘇維埃政府得勝之餘，遂升任加米尼夫為一切軍事行動的最高總司令，並將最親信的蘇維埃軍隊從西伯利亞戰綫上調來，指揮他們去抵抗南部鄧尼金軍隊，對抗反布黨軍力的第二次行動於是就開始了。

第九節 紅軍戰勝柯爾察克與鄧尼金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冬，鄧尼金的義勇軍在西部高加索與布軍接戰，至五月中旬，各地農民也風起反抗蘇維埃政府，一五〇，〇〇〇的鄧軍，遂乘勢向莫斯科進攻，到了六月，南俄的許多重要城市，如卡科夫(Kharkov) 葉卡忒里諾斯拉夫(Ekaterinoslav) 與察立達

(Tsaritsyn) 都被義軍所佔領，這時加米尼夫已制止柯爾察克的進攻，轉而注意鄧尼金，但是蘇維埃軍隊的第一次反攻是失敗了，到了十月中旬，義軍大為進展，直達服洛涅日 (Voronezh) 與萊爾 (Orel) 欠尼高甫 (Chernigov) 基輔與敖得薩等地，同時，尤特尼哈 (Yudenich) 所領的北軍，以愛沙尼亞為出發點，進攻彼得格勒，而佔蓋忒基那 (Gatchina)。

蘇維埃總司令在西伯利亞，南俄彼得格勒與亞爾干日爾四條戰綫上猛力反攻，居然破滅了鄧尼金的軍力，逼得義勇軍迅速撤退，最後直退至裏海濱，而不得要求英國人援助其軍隊家族與受傷者之安然退却。一九二〇年三月廿七日又放棄諾伏洛西克 (Novorossiisk)，義軍殘軍與頓河庫巴的哥薩克人過海退至克里米半島 (Crimean Peninsula)，鄧尼金辭總司令職，委胡蘭吉 (Wrangel) 繼任之。

至此，柯爾察克的命運已經確定的了，其軍力的全部崩潰只是遲早而已。一九一八年六月宣言後，他們所希望的協商國的扶助，從未實現過一言半語。被社會革命黨所激起來的農民的爆發，倒逼處西伯利亞各地，且唯一的交通工具——西伯利亞大鐵道——又被捷克人所把持，他們反對柯爾察克不遺餘力，以致愈形紛亂，柯氏甚至又被他的軍隊所排斥，統治伊

爾庫次克(Trkusk)的革命委員會經捷克人的默許與法將錢寧(Jain)的同意，即將柯氏逮捕，沒有幾天後，柯氏終被槍殺。

在兩個星期內，蘇維埃軍隊進佔伊爾庫次克，西伯利亞遂分成兩個主要區域：蘇維埃政府所統治的是直達貝加爾湖所有的領土，遠東呢？實際已處於日本軍隊的控制之下了，其後經過兩年的戰爭與外交談判，蘇維埃政府始佔領整個的西伯利亞。

自反布黨軍力崩潰後，不得不使協商國對蘇維埃政府改變她們的立場，英國首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早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八日說過：不能用武力去征服布黨的。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協商國最高會議撤消對俄國的經濟封鎖，並將所有協商國軍隊退出亞爾干日爾及俄國領土。

第十節 紅軍戰勝胡蘭吉及俄波戰爭

北俄與東俄的反布黨軍撤退與敗北後，還有一支反抗蘇維埃政府的力是胡蘭吉的軍隊，他統帶鄧尼金的殘軍，佔據克里米半島後，立刻重整旗鼓，繼續對莫斯科作武裝的抗爭。他

先積子軍隊以休息，重申紀律，製定嚴格的策略，不許向和平的民衆強迫勒索食物。因爲胡蘭吉是仰給於南俄農民的扶助，所以他宣稱道：滿足這般農民的要求是他的基本政策。一九二〇年六月七日的新農田法，賦予農民們以土地的所有權；這個改革案責成前帝國農業部長且曾主持過斯托雷賓改革案的克里伏西因 (Krivoshin) 實施之；可是新政策不能實現所希冀的成效，農民們大都是被動的。胡蘭吉更欲聯絡各派共同反抗布黨起見，進行游說波蘭與南俄農民運動的領袖，又派代表去謁見無政府農民集團的領袖馬克諾 (Makhno)，以謀聯盟，但胡氏代表却被馬氏所殺，且置諸不答。

胡蘭吉不信任祇有七萬人的自己軍隊能單獨克服蘇維埃政府，他却自信他的新農田政策或能得到農民的扶助，如果他們習慣了這種政策，即無異毀壞了蘇維埃軍隊的紀律，然而什麼希望都沒有實現，農民們都已厭恨內戰，新農田法再也引不起他們的注意，在南俄有許多地方的農民，對於胡蘭吉的新農田政策，竟置若罔聞。其時頓河與庫巴哥薩克人對抗蘇維埃政府的起事，又告失敗，故使紅軍道德上的趾高氣揚已登峯造極，胡蘭吉的政策，竟不能動撼其毫釐了。

波蘭與蘇俄之戰，非但沒有助長反布黨的運動，且得到相反的結果，蘇維埃政府利用波蘭對俄干涉時所激起的全俄民族思想，反得與國內許多強敵互相合作。

蘇維埃政府邀請歐戰名將白里西洛夫 (Brusilov)——現在退隱在莫斯科——出山，然後發表告全俄官長書，教他們一致擁護俄國軍隊抵抗波蘭，這個宣告是具有極大的影響。

第一步勝利屬於波蘭，一九二〇年五月六日經過一次短時間的鏖戰後，波軍佔烏克蘭首都基輔，蘇維埃軍立時反攻，才把波軍逐出基輔，退回華沙 (Warsaw) 覽界，七月十日波蘭求助於協商國，於是在魏根特 (Weigand) 領導下的法國軍事專使團被派到華沙去，同時協商國又想調解蘇埃政府與波蘭間的爭端。

法國看到蘇維埃政府的軍權一日膨大一日，有些恐懼，因是決計扶助胡蘭吉，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二日胡蘭吉政府被承認為南俄的實在政府。正法國專使到達之時，波軍即開始向蘇維埃軍大舉反攻，蘇軍大敗，幾乎潰退到明斯克 (Minsk)，波軍即停止進攻，雙方於是談判和平，初次會議於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二日結束。蘇維埃政府自在波蘭戰綫上停止軍事行動後，即調其軍力至南俄攻擊胡蘭吉，十一月雙方大戰於彼列可普 (Perokop) 一帶地方，直與

南俄克里米米相近。胡爾吉自認難以抗拒紅軍的襲擊，遂命令反布黨份子統統退至克里米半島，約一三〇、〇〇〇名兵士與公民及他們的家族都搭船向博斯破魯斯（Bosporus）進發。於是俄國內戰即行告終。

波蘇和約最後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在里加（Riga）簽訂，其解決的條件於俄國是極端不利的，波蘭東部的疆界直達昔日布黨革命爆發時的德國陣綫上一帶地方；這意思便是說：四百萬俄國人變了波蘭的屬民，俄國並須把一七七二年以來從波蘭奪來的一切凱旋紀念物、圖書館與藝術品統統歸還波蘭。這樣看來：俄國脫出內戰時期的代價，既失去了許多人民與財富，又喪失了不少重要的領土。

第五章 蘇維埃政府的經濟政策

第一節 社會主義的經濟「戰時共產主義」及強迫勞動制度

內戰終了後，得使蘇維埃政府有處理內務的餘力，主要的問題是它的經濟政策。一九二〇年，蘇維埃政府已告統一，於是開始實行革命後所公佈的種種策略，結果是一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告成，雖然名爲「戰時共產主義」，不過直等到內戰結束後，才算完成的。這個制度是基於完全否認私有財產權利與其它一切資本主義或布爾喬亞的經濟原則，蘇維埃政府想

握取生產的完全管理權，因此整個貿易、貨幣交易、信用以及銀行的種種機紐，根本便失其效用。

政府先行把持工業，不久自從十一月革命後，所有大規模的工業統統集中在它的手中了。國有工業漸漸推廣到各種小機器廠去，一九二〇年更發佈命令，將所有雇用五個工人以上與使用機器力的工業一律收歸國有（註一），比此標準規模較小的工業，則須處於政府的管理之下，這類包含所有農民的手工業。

蘇維埃政府把持了工業後，又轉向農業方面去，也實行同樣的策略。政府視農民不是一個土地的所有者，而祇當他是一個墾種政府所有土地的工人，凡農民所生產者都算是政府的財產，用各種的徵收（註二），使農民不得不服從政府的掌握權，農民們祇留下少些的食物，僅夠滿足其家庭的日常需要，及少量的穀類，以備來年下種之用。

整個國家的生產統由政府利爲己用，由政府將各種製造品分給人民，但其分配法顯然是

（註一） 或者十個工人以上而不用機器力的工業。

（註二） 參看以上第三章第三節及第四章第一節。

沒有一定的，其它一切物質如燃料、機械以及個人所用的物品，都用同樣的分配法，至於分配個人所用的物品，則用直接分配券，具有預定的數量，這種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使貿易變為不需要，故於一九一八年全部把它取消；而銀行亦然，故也同樣國有化了。一九一八年又創辦所謂「國民銀行」(People's Bank)，但這不過是徒擁虛名，實際是財政委員會的一部分，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九日命令，將「國民銀行」併入財政委員會的另一機關「主計局」(Budget Accounting Department)中。

貨幣雖並未廢除，但實際已毫無價值，因市面上已通行紙幣了，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流通的紙幣達一一、七八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同年十一月一日竟多一倍，一九一八年一月達二七、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又隔兩年後，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達二二五、〇一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再一年後，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竟達一、一六八、五九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一八年初，一元值九盧布，一九一九年初值八十盧布；迨至一九二〇年初，已值一、二〇〇盧布了。幣值的低落，使物價漸趨增高，一九二七年一般的物價指數比一九一三年時高出三倍，至一九一八年高出廿三倍半，一九二〇年二、四〇〇倍。

一九二一年竟高出一六、八〇〇倍了。

新社會主義的經濟已將優良的靈動的貿易與貨幣交易組織根本毀滅，所代替者是笨拙的官僚組織，以管理貨物的生產與分配，這些組織的主腦是全國經濟最高會議 (Supreme Council of National Economy)。這個局面的困難點，不但在乎要開展一個新的經濟組織，且須爲了整個的經濟樞紐尋出一個新的心理上的動機來，社會主義的制度蓋已消滅了天然的動機與個人的企業，需要已與供給不符，市場上的貨物並不根據所做工作的價值，却在乎視消費者各個不同的份子。蘇維埃政府也鑒於他們已把天然的工作動機破壞殆盡，因此不得不定出強迫勞動的原則，來設法補救，一九一八年便宣佈這個原則，最後更於一九二〇年一月明定於普遍勞動命令 (Decree on Universal Labor) 中，這不但在工廠中適用，在農業方面亦復如此。

這道命令實際無異恢復亞歷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改革以前舊俄時代所行的國家經濟制度，蘇俄的整個人民現在都與以前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葉時曾派往國家工廠中去工作的工農處於同一的地位，凡爲蘇俄公民，都被指派到一個特定的工廠中去或者一片特定的

土地上去工作，未經特許，且不得擅自移動；抑有進者，在蘇俄有幾種工業又引用軍工的原則，如煤礦工爲一例，一九二〇年更嘗試組織許多軍工的地方團體，很像從前亞歷山大一世時的軍工居留地一般。還有人提議解散紅軍，把軍事單位換做爲特殊勞働而設的工作單位，如木土、建築工、與修理農具工等。

第二節 經濟的難關飢荒及賑務行政部的組織

田奴經濟的特質是勞働的少量生產，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間所行的社會主義的經濟中可以完全表現出來。一九二〇年在棉紗工業方面每年每人的生產量，只值一九一二年的百分之廿二，在煤礦方面，只值百分之廿五，生產量的遞減，如單獨歸罪於社會主義的經濟，當然是不對的，其它的原因如一般的衰頹，戰後的困頓以及種植的普遍的銳減，不過基本的原故，總是由於社會主義的制度有以致之，因爲在這種制度之下，能使工人們對於自己勞働生產力，感到毫無興趣。

工業生產一年衰落一年，一九二〇年的生產量祇等於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十三。(註二)

運輸物的價值也在蛻減，工業生產的低減與運輸的紊亂，使國家漸趨貧乏，例如在戰前糖和精蜜的消費，每人占四·八七金盧布，至一九二〇年便減到〇·二四金盧布；又如戰前紡織物的消費，每人占六·七七金盧布，但至一九二〇年直減到〇·九一金盧布了。

農業生產低落的情形，更為嚴重。革命固然給予農民們一切可開墾的土地，農民們享有極大的產業，計增加他們百分之三十一的所有土地，但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却消滅了墾種土地的動機，農民們已不需要除為自己的目的着想以外，再增加些收成，所以結果是墾種區域愈縮愈小，在過去一九一六年蘇維埃國家的領域內，墾種區域達八千六百萬提雪丁 (Desiatins)，迨一九二一年減至五千四百萬，由於大地產的毀滅，農業生產遂隨之減少，且穀類收穫減少之數量，比墾種區域所減少者更多，一九一六年所收穫者達四千二百兆普特 (puds)，一九一九年減至兩千兆，這就是說：在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中，每人所得的穀率連下種的穀包括在內祇十五普特，這種情況幾乎要達到飢荒的程度了。此外蘇維埃

(註二) 戰前的價格，一九二三年穀類的生產價值達六、三九一、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但到了一九二〇年，

八三五、八〇〇、〇〇〇金盧布了。

政府的經濟政策，又倒亂了家畜的增殖，一九一六年俄國有馬三千二百萬匹，一九二〇年祇二千四百萬匹，一九一六年有牛五千萬頭，一九二〇年祇剩三千七百萬頭也不到的了。

因為俄國是在一個窮困的狀況中，以故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亢旱竟鬧成極可怕的荒災。一九二〇年所收集的穀類祇達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普特，一九二一年整個南俄毫無收成，翌年差不多三千五百萬的人民都陷入飢荒中，此外五千萬人也處於半飢荒的狀態中，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旱災聲中所死去的人達五百萬，換句話說：約合大戰時俄人死傷數的兩倍，如果那時沒有美國出來援助，所死的人恐還不止此數哩。主要的賑災組織是美國賑務行政部(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以胡佛(Herbert Hoover)為主幹，此部及其它賑務組織也幫助俄國的智識界，否則恐怕他們也是孤力無援的。賑務行政部所化經費的總額共達六一、五六六、二三一·五三元，所救濟的貨物總量共有七一八、七七〇噸，每天所救濟的俄國人有四、二七三、三三九個孩童與六、三一六、九五八個成人，一九二二年八月間每日一〇、四九〇、二九七人，除食物以外，賑務部還載運與分配許多藥品到俄國來，其總價值達八、〇七二、二五六·〇三元，(註一) 這批藥品乃由美國紅十字會和美

國軍隊所供給的。

第三節 新經濟政策

社會主義的統治制度激起俄國人民極大的反感，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間，農民因此疊次起事，最要的所在是泰卜省 (Tambov province)，乃由安托諾夫 (Antonov) 所領導，不幸他們即被政府所平定，為狀至為慘酷；最後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初，紅色海軍的水兵也相率在克羅斯達忒 (Kronstadt) 起事。反對派的主要要求，是召開國民大會及採用自由貿易，起事的水兵以前正是布黨革命的主要助力，初不料是蘇維埃政府當局的預兆的病源，雖然克羅斯達忒起事，不久便被武力所平定；但是列寧總看到情勢的嚴重，決計改變方針，補充警察的策略，以遏亂萌。列寧又欲如一九〇六年國會選舉問題發生時那樣地顯揚自己，準備使其政策嚴厲化起來；但在事實上呢？在他任內，却還預備採取折衷的辦法。列寧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間會說：『我們是處於這樣工農生產力貧乏、衰頹與困累的狀況中，不要管其它，

(註一) 此數遠以前救災費一起在內。

我們只要增加生產就是了』(註一)。因此種種，才引起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即是出名所謂 N. E. P. (New Economic Policy)

新經濟政策最初是關於農業人口方面的極端改革，改用捐稅制度代替以前分門別類的徵收，如穀類稅改做貨幣稅，這種改革的目的，在使農民墾種土地的意態，重新建立起來，蘇維埃政府約農民們採用稅收的方式，祇從他們勞力得來的生產量中，收取指定的一部分，並不取其全部的盈餘，務使不超過他們緊急的需要，農民們得任意處置盈餘的全權，換句話說：他們可公開賣給市場，職是之故，自由貿易的採用便替代以前強迫征稅的命令，到了一九二二年七月，當未經徵集收穫以前，即頒布自由貿易的命令(註二)。

除解放農業以外，同時又從事同樣的工業改革，以「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 制度替代社會主義的生產形式，「托辣斯」(“Trusts”) 制度替代單純的工業管理，大規模的生產管理權，固依然保留在國家的手中，但小規模的生產，一部分則讓給私人管理，對

(註一) 在共產黨大會中的演詞。

(註二) 受限於國內貿易，至於國外貿易仍由政府保留獨佔。

於國外資本，則採容許的制度，對於工廠原料與廠具的自由供給，則宣告終止，每一個工廠，不論是政府或私人所有，須自給自用的物事，於是自然而然的在適當的經濟事業方面，即恢復了錢幣制度，同時也恢復銀行與信用制度，到了一九二一年末，建在商業基礎上的國家銀行遂行開幕。

在貨物生產方面社會主義的制度消滅後，當然隨之而來者即應放棄關於分配貨物方面所用的社會主義的原則，現在能免費獲得貨物的權利者，祇限於紅色陸軍的兵士們、紅色海軍的水兵們、警察以及監犯等，經濟的改造也同樣將強迫勞動制度立即廢除。

第四節 俄國的經濟改造

新經濟政策對於俄國的經濟，具有一種有利的影響，農工業的生產都隨之發展，至於開墾的區域，一九二一年減至五千四百萬提雪丁，一九二二年祇剩四千九百萬，但到了一九二三年，忽然增加到五千九百萬，一九二七年幾乎能與一九一六年時相埒（八千三百萬提雪丁）；又如一九二四年所集的穀類，達二千二百五十兆普特，迨一九二六年，增加到四千六

百兆；餘如家畜亦逐漸增加，一九二六年的馬超過二千七百萬匹，牛有五千五百萬頭；各種工業的生產，也都抬頭起來，如煤的產額，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間祇有一千一百五十萬噸，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忽增至二千四百五十萬噸；棉織物生產，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祇五萬六千萬米特，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增至二千兆米特。

俄國的經濟改造，又改良錢幣制與確立固定的貨幣本位，一九二二年所重設的國家銀行，即於翌年發行金盧布券（Chervonets）銀行鈔票，一張金盧布券等於十個金盧布，約值五元（註二），其四分之一的價值由金幣、銀幣以及穩固國外幣所支持，其它則直捷由經過磋商之短期債務所担保，金盧布券發行後，並未把舊幣取消，如國庫仍繼續沿用舊紙幣，所以在一個時期內，有兩種通行的紙幣，一種價值是穩定的，還有一種是在永久跌落，引用在交易方面的金盧布券，好似英國幣制中的磅與元一樣，照一九二三年的紙幣價值計算，一張金盧布券值一一七盧布，以前則值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張金盧布券值一三、七〇〇個「一九二三年時的盧布」。一九二四年四月，值五〇〇、〇〇〇個「一

（註二）一個盧布含有一七·四二四鐳爾耶（obol's）的純金，一個鐳爾耶等於〇·六八五七六格來（grain）。

九二三年時的盧布」。

一九二四年春，政府授權國庫發行一盧布、三盧布與五盧布的小幣。國家銀行宣佈將盡量容納無限制的新幣，用以償付債務，其定率以十盧布合一張金盧布券。政府並停止印刷紙幣，發行銀幣與銅幣。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七日宣佈一個金盧布換五萬五千個「一九二三年時的盧布」，並宣佈舊幣的最後通行日期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十日為止，最後收贖日期至同年五月三十一日為止。所以到了一九二四年六月，在俄國所通行的錢幣，只有穩定的金盧布券與金圓幣了。

第五節 蘇維埃經濟制度的特質

新經濟政策在最初時似乎是整個回復了資本主義的經濟，不過蘇維埃政府却出以非常的力量，頗欲避免這點。一九二二年三月間第十一次共產黨大會宣佈說：「回復經濟邊綫上」

(retreat on the economic front)的事，務須停止。其它新經濟政策的讓許，是關於生產交易與尼諾夫哥洛特 (Nizhni-Novgorod) 每年市場的恢復，迄一九二二年末，所謂「回

復」在實際上已宣告終止了(註二)，自那時起直至一九二八年，在俄國所通行的經濟制度，既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乃是介乎兩者之間的一種制度，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所實行的蘇維埃制度與一切新經濟政策改革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不同，也與政府過度管理經濟事業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同，尤其在國外貿易方面最爲顯著。

蘇俄的政府經濟發展，可見下表所記：一九二三——二四年政府工業生產總額達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照戰前的價格)。私有工業的生產，包括國外殖民地內，其價值祇有八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換句話說：約合生產總額的三分之一。每年政府工業在着着發展，一九二五——二六年國家工業的生產達五、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私有工業的生產則達一、二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換句話說：約合生產總額的四分之一。國家則保留國外貿易的獨占，蘇維埃政府想調整全國的經濟生活，爲了這個目的，故幾年來當致力於生產的計劃，乃由國家設計委員會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俄名

(註八) 錢幣改革直至一九二四年告終，則爲例外的事。一九二五年實行許多有利於農民們的策略，但迄一九二七年，又行取消。參看以下第八章第二節與第十一節。

Gospian) 主其事。

蘇維埃政府的農業政策，是發展農民私人的家庭，就可能的範圍內，設法繁汰生產；但新經濟政策，並不恢復小規模私人田地的所有權，按照一九二二年的土地法，規定所有土地屬於國家，農民祇能自由使用而已，土地法第廿七節確禁土地的賤賣、購售、典押、遺贈與贈與，土地由基本社會耕種或由私人耕種都可以。蘇維埃政府並不扶助舊自治團體，但也不十分鼓勵農民離開自治團體，變做一個個別的租地者，這點可與斯託雷賓立法時相比較的。且農民如果離開自治團體。去經營他私人的一片土地，那他並不能從事個人經濟，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家庭經濟，家長變做了家庭所有物的管理者，地方行政委員會 (Local Executive Committee) 得徇家庭中人員的要求，撤換家長。

以前自治團體反對農民個人主義，今以合作運動代之，新經濟政策施行後，創立了許多蘇維埃合作社，從前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蘇維埃政府也和布爾喬亞的偏見一般，曾將各種形式的合作加以取締，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命令，重組農業合作社，同年八月十六日命令，承認合作社得享有財產權，並認合作社是有關國家的事業，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命令，

設立三三、五〇〇個農業合作社，如經營乳酪麵粉廠等，共有五、九四八、七六〇個會員。

蘇維埃合作社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社只是名義上相同，前者實則由政府所統治，具有一種半官的性質，而社中的較高管理權操在共產黨的手中，其設施悉照共黨所欲（註一）；故合作社不啻是握在蘇維埃政府手中的武器，去控制和引導農民的經濟活動，政府並希望用合作運動的手段，得到全體農家的統一，共黨領袖們的意見，力主合作社務須扶助農民的社會主義教育，又須幫助謀農家的一統，尤其應該抗拒富有家庭的伸張，職是之故，蘇維埃的領袖們才說這是一種農民合作社的社會主義的政策。

蘇維埃政府農業政策的影響，足以減少農家間的不同點，能使農民經濟趨於均等，無田可種的農家遂漸漸減少，其百分比，一九一七年為百分之一·四，一九二二年減至百分之六·七。墾種四提雪丁土地以上的農家，一九一七年為百分之二九·五，一九二二年減至一四·七。佔有較少土地的農民，如墾種四提雪丁以下的漸漸增加，一九一七年為百分之五·九

（註一）算是共產黨中的一部份。參看以下第六章。

• 一，迨一九二二年加至百分之七八。六，這最後一類的農家；其自給已感極難，能賣給市場上的數額當然很少。能供給市場的生產的農家都是大戶，這種數額漸形增多。但欲基於較低的平均數而強迫使農家平等，是很足以阻礙俄國農業生產物的增加。

第六節 蘇俄的經濟困難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戰時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制度可比之於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的田奴經濟，最近蘇維埃的工業經濟則可比之於魏忒 (Count Witte) 所主張的次一等制度的形式，在農業方面呢，則可比之於斯托雷賓改革以前帝俄時代的統治制度

(註二)。蘇維埃經濟確用了極大的力，已能恢復一九一三年時的各方面生產，但有幾種還有所不及。像在現時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 (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 的領域之內，一九一三年的農業生產價值總額達一二、七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七年有一二、七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三年工業生產的價值達六、三九一、〇〇〇

(註二) 但蘇維埃立法所採用斯托雷賓改革之處很少。

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七年增至六、六〇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註二）。煤的產量在一九一三年有二千九百萬米特噸，一九二七年增至三千萬米特噸。煤油產量在一九一三年有九百萬米特噸，一九二七年增至一千萬米特噸。棉布產額在一九一三年有二、二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米特，一九二七年增至二、三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米特。

蘇維埃政府從事許多新式機械工具的建築，就中如價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聶伯河（Dnieper River）水力大藥站（註二），格羅內（Groznai）的煤礦區，是從北高加索通到黑海邱普斯（Tuapse）港。此外還有一件事值得敘述者，是一九三〇年土耳其西伯利亞間鐵道的完成。

這些事實足以證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慘罹災難後蘇維埃經濟的大進步，如欲後顧將來蘇維埃的經濟，可視那幾種生產能繼續戰前的步武而發展，相與比較之即得。我們進而轉看歐美各國在戰後數年的生產，在各方面也都超過戰前的成績。

（註一）以上數表是根據蘇維埃官方的來源，至是否確實，不得而知。

（註二）此項工程乃由美國工程師郭普（Hugh L. Cooper）所測量及設計。

當時俄國最優良的生產，也鮮能超過戰前的水準。我們不但應考慮俄國經濟下的生產總額，也該估計各人的生產量，像在現時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領域之內，一九一三年的人口有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至一九二八年一月的人口，已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如國內一般的生產依然能大致保持以前的水準，則在人口的發達上着想，每人的生產量已漸低落。

蘇維埃經濟之最顯著的特質，是工業在逐漸發展，但以農業的凋疲為代價。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蘇維埃預算，以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供給工業公款，從此時起，工業上的津貼金着着增加，因此蘇維埃工業非常昌旺；但誰料其代價是把國家的元氣犧牲淨盡，換句話說：把農業根本犧牲，在這點上，我們即可看到工業勞働的生活情形總比農民好得多，工人的物質環境也許已與戰前相等，按照蘇維埃的官報，一九二七年俄國工人每月平均所得有六四·三六盧布，一九一三年祇二五盧布，可是一九一三年盧布的購買力比一九二七年時大得多，許多農產品與製作的零售價值，也由百分之二百增至百分之三百，因此工錢的真正購買力，並沒有增加；但在另一方面說：俄國大都會中工人的居住狀況，也許比革命前舒

服得多，工作時間也已縮短，一九二七年每日平均工作時間爲七。四小時，以代一九一三年時的十小時工作制。

蘇維埃國家工人的地位如與農民比較起來，則工人得享有特權，至於農民的生活標準，已顯然較革命前爲低，在一九二五年，他們平均祇能購買一九一三年時的百分之廿八的茶與糖，百分之四十的布，百分之六十的鹽，百分之八十的肥皂，百分之九十的煤油。

蘇維埃工業品的價格比主要農產物的價格高漲得快，一九二七年末，織產物批發價格的指數是二〇〇，與一九一三年時一〇〇相較，已經增加，同時黑麥價格的指數，只有一〇一，小麥爲一一三。這樣看來：農民從穀類中所能換得的貨物數量，實不過一九一三年時的一半罷了。

第六章 蘇俄的政治構造

第一節 蘇維埃國家的最高權力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布黨革命的口號，說要集中蘇維埃的權力，這個目的決定了俄國新政治構造之一般的性質。布黨革命時，曾舉行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藉以制裁新的權力，也曾籌攬過民選國民大會的職權；但我們看到兩星期以後，布黨黨員又開過第二次會議，即把國民大會根本取消。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鞏固了以列甯爲領袖的人民委員會，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政府。

雖然，新政府却不必迅速確定俄國的政治構造，在起初時，還有許多應立時解決的問題，最要者在使其地位充實起來，及考慮與中歐同盟國所締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的結局，直至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第五次蘇維埃大會時，才規定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Russian Socialist Federative Soviet Republic (R. S. F. S. R.)] 的新憲法。

當時蘇維埃的領土，在名義上講來：已擁有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中俄國所能保有的整個幅員，但據我們在實際上所見(註一)：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歸從蘇維埃政府的領域，與十六世紀莫斯科邦的幅員相仿，直待一九二〇年以後，才漸漸擴張到現時的幅員。

按照一九一八年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俄國的政治構造，基於蘇維埃或委員會制度。最高權力的代理機關是全俄蘇維埃大會，必要時均得開會，但每年至少須舉行一次，蘇維埃大會是一個極大而繁重的組織，決不能與立憲國家的議會所可比擬，蓋蘇維埃大會意欲代替一國選民的立法院，其決議可比諸普遍的覆決 (universal referendum)

(註一) 見第四章第五節。

(註一)。由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大會集會期間，它握有最高的權力。執行委員會中包含三百以上的委員，略似國會，開會有一定時期，委員亦得享受有如國會議員的特權，未經委員會主席同意，不得擅捕委員，而懲辦委員又須由委員會或主席之授意。

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集會期間，蘇維埃國家的最高權力，在名義上屬於主席團，它在性質上是一個蘇維埃國家的集權元首，但在實際上呢？人民委員會比執行委員會更重要，人民委員會是蘇維埃國家的內閣，起初時它在事實上是蘇維埃共和國唯一的政府代理機關，一九一七年末至一九一八上半年，用委員會名義頒佈了許多法律，如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頒佈關於紅色陸軍的組織，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四日關於森林法，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間，用人民委員會的名義發佈一、六一五道命令，但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所發佈者祇三七五道命令。

如以蘇維埃政府立憲權力的許多最高分枝機關與歐美立憲國家相比較，則並無明細的區別。在蘇俄，施行調補的原則，如蘇維埃大會不開會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有同樣的大會立法

(註一) 蘇維埃制度與立憲國家的相似處，只在對外方面及決斷政策，但前者並不是一個立憲制度，可於下述見之。

權與行政權，而在委員會集會期間，主席團是最高立法權與行政權的掌握機關，人民委員會在必要時亦得握有最高的權力。

第二節 蘇維埃的選舉制度

蘇維埃大會是蘇維埃國家的最高武器，大會乃按照具有確定特質的方法所選出的。蘇維埃國家並不施行普選法，以下幾種人沒有積極的與自動的選舉權：（一）凡為一己私利起見而雇用勞工的人；（二）凡賴利息、商業或各種財產而生存的人；（三）私營商人與商業中間人；（四）各種教門中的僧侶與教徒；（五）凡以前為警察者及管理房屋者，當最後一類人的選舉權被剝奪時，曾從事過政治上的審判，但為時甚暫的，至對於前四類人的限制，是屬於政府共產制度的必然形式。在這五類中所佔其他的個人極少，尤其因為許多人受了革命與內戰之敗壞的影響，早已變成平民了。

蘇維埃選舉制度的特質，並不僅僅限於這些限制，蘇維埃的選舉權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平等的，蘇維埃大會包含兩個團體，其一，許多都市蘇維埃的代表——此即工人的代表，

其標準以一人代表二萬五千個選民；其二，從各省蘇維埃大會所選出的代表——此即工農的代表以一人代表十二萬五千個居民。按照憲法所規定，各省蘇維埃包含（一）縣城蘇維埃的代表，一人代表兩千個選民；（二）服洛斯忒（Volost），或農民大會，一人代表一萬個居民，因此工人與農民相較，前者的代表多一倍。第一次工人在其單獨的團體中投票，其代表數額超過其他人民的兩倍半；第二次工農聯合投票。但就中工人的代表又超出農民之兩倍半，由此事實，可見工人得投票兩次，故他們的代表，必能超過農民，雖然全體農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七，而工人只占百分之十三。

不但此也，選舉權又不是直接的，例如市民代表選入蘇維埃大會，須經過兩個階段，鄉民代表則更甚，須經四個階級（註一）。

不過蘇俄並無祕密投票制度，一切選舉都用公開的舉手方法，且須在選舉委員會與地方蘇維埃代表的面前舉行，可見蘇維埃政府經代理員之手，極易控制選舉機關，這種控制的結果，又是十分驚人的：我們看到祇在蘇維埃政府制度的下層階級中，共產黨員較少，這情形

（註一）在蘇維埃制度下，一個選民「約等於兩個「居民」。

乃與上級政府完全相異，在一九二二年的村蘇維埃中，祇有百分之六·一，的共產黨黨員，此外都是無黨派的人；在服洛斯克蘇維埃大會中，則有百分之一·七的代表共產黨黨員，在猶延齊特(Тверь)大會中，有百分之五四·四，在省大會中，有百分之七八·八；但在全俄大會中，百分之九四·九的代表，都是共產黨黨員。

第三節 共產黨在蘇維埃國家的地位

蘇維埃政府的選舉制度有益也好，無益也好，總之，欲認識近代俄國之蘇維埃制度的實質，祇知這些專門的事務不為功，在性質上說：充其量這不過是裝點門面而已，要曉得錯綜複雜的蘇維埃制度，只是一個帳幕，隱在後面俄羅斯的真正領袖是共產黨。

共產黨在蘇維埃國家的地位，不能比諸立憲國家政黨的地位，共產黨在俄國，不是數黨之一，而是個唯一的黨，其餘的黨一概不許存在，所以蘇維埃國家政治制度，實就是共產黨的獨裁政治，在這點上看來：它近乎是一個專制的政府，而並不是一個立憲的政府，由此事實，可知蘇維埃國家最高權力的各代理機關所以不會彼此逾越所範圍的策略的原故，即在乎

此。(註二)一切機關都同樣秉承唯一當軸——共產黨——的意志，共產黨是蘇俄真正的統治階級，猶如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葉時的貴族階級一樣。蘇維埃政府的一切重要策略，只是反映共產黨的許多決議案而已，所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憲法是先由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所同意，於是才由蘇維埃大會毫無修改而通過，新經濟政策開始時，各種勒索的捐稅之代替稅(註三)是首由一九二一年三月共產黨第十次大會所決定，以後才由第八次蘇維埃大會所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實施。

共產黨是一個嚴格的集權政治組織，以鐵的紀律一致聯合，其中央委員會與政治局，(Political Bureau)乃由大會中選出，但在大會之中，各份子(註三)應絕對服從上級人員，實際上級統治團體可以準備與指導各級共產黨大會的議案，其中有一個團體常賦有獨裁的權威，列甯居此非官職位直至一九二四年他死亡為止，現時乃由斯達林承其乏。

(註一) 參看本章第一節。

(註二) 參看第五章第三節。

(註三) 關於共產黨中的反對派，可參看以下第八章。

加入共產黨先須經過一個試驗時期，爲候補黨員，然後視其才能如何而定，現時正式與候補黨員共有一、二〇〇、〇〇〇人，黨員須處於黨機關的監督之下。並隨時作「清黨」(“purification”)的工作，藉以排斥不合的份子。

共產黨黨員在日常生活方面得享有許多特權，可是他們的生命並不屬於他們自己的，如黨要他們怎樣做，他們便怎樣做去，決不能加以拒絕的話，例如黨的意志，要黨員從事行政、宣傳或兵役種種事務。共產黨中的大多數黨員是屬於勞働階級——一九二七年占百分之五十八，農民則祇占全黨百分之二十四，公僕占百分之十七。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念五萬共產黨黨員屬於鄉村的黨組織，還有七十五萬或大約全數四分之三的黨員，則屬於都市的黨組織。共產黨不單是一個有相同利益的許多個人所結合的團體，也具有同一的社會哲學——或可說是同一的宗教，才使他們聯合在一起的。

共產黨黨員盡被學理所感動，並不爲個人的利益着想，共產主義於他們當作一種宗教的替代物，能支配他們整個的生命。共產黨想建立者不是一種單純的政治理想，而是一個完全新的社會，但它的性質也是迷信的與不容任異端的，因此常與其它宗教與教會相衝突，尤其

是同基督教信仰是水火不相容的。

第四節 蘇俄的地方政府

共產黨不但在蘇維埃國家組織中握有最高的權力，而地方政府方面亦復如此。在名義上說地方政府的權是操在蘇維埃的手中，各村與各城的居民，選舉他們的蘇維埃，地方蘇維埃是在蘇維埃大會中集會，如各服洛斯忒、猶延齊特與各省都有大會。各蘇維埃大會選出一個執行委員會，這種執行委員會是地方的統治體，中央政府在形式上並不指派任何代表，去控制執行委員會的工作，故在名義上說：蘇維埃似在鼓勵公衆的自治政府，但在實際上並不如是，第一，蘇維埃大會已失去了一切權力，他們開會的時間極少，按一九一八年憲法，地方蘇維埃大會（省）每年至少須開會四次，服洛斯忒大會則每月舉行一次，但實際並不照憲法上的規定，最後却定以法律，規定地方蘇維埃每年開會一次，從此它便失去對於地方事務的直接統治權了。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第七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宣言：以地方蘇維埃歸作「煽動與報告的代理機關」。起初，執行委員會握有地方蘇維埃大會的權力，前者不但能實施後者的意

志，且有否決大會的獨立權，以及通過它們自己的立法。因地方蘇維埃大會羸弱無權，域村中的蘇維埃當然也隨之而失去權力。

在大的縣城中，蘇維埃人員竟有一千人之多，而在列甯格勒(Leningrad)與莫斯科還不止此數哩。所有工會會員及其它勞動組織的份子都得出席蘇維埃會議，且有顧問權，在這種情形之下，因使城蘇維埃不易工作，因而喪失完成其當前固有事務的一切能力。

按憲法所規定：城蘇維埃每星期開會一次，然而這條規則不久就失其效力，改做每月開會一次，蓋城蘇維埃被一般人認為猶延齊特與省蘇維埃大會的附屬機關，其執行委員會的權力，則被剝奪淨盡，在集會期間，乃由猶延齊特與省執行委員會全權處理，所以蘇俄的地方政府，實際上是脫出地方蘇維埃與蘇維埃大會之手，而另經執行委員會之手，但還不盡如此，又須由執行委員會交委員會主席團，在這種委員會中，包含省大會中之七人與猶延齊特中之三人，所以主席團不久便變做中央政府下的省機關，最後則交至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與人民委員蘇維埃。

各地方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應服從高級執行委員會的命令，所以省猶延齊特應服從省

委員會，上對下呢？則高級執行委員會得否決下級執行委員會的議決案，如省委員會得否決猶延齊特委員會的議決案，高級政府主席團且可對下級執行委員會施以訓練的策略，所以整個地方政府制度也是集權的，地方人民爲服官起見，用選舉方法供給政府以候選人，這樣看來：蘇維埃下的自治政府祇徒負名義而已，事實上蘇維埃是個極端的中央集權政府。

那地方與中央之顯著的衝突，倒鞏固了第三個權力，即是共產黨的秘密政府。共產黨在省、猶延齊特、服洛斯忒、城與村中，也都有地方委員會，正與政府蘇維埃相仿。共產黨又有嚴格的中央集權與訓練紀律，所以地方共黨委員會可完成中央黨部機關的意志。地方共黨委員會從事地方機關的一切工作及控制蘇維埃與蘇維埃大會的選舉，使有共產黨候選人選入地方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中。

第五節 蘇聯的邦聯主義

在最初時，蘇維埃國家自己稱爲邦聯的共和國，因爲事實上自帝國崩潰後，在俄國的離心力十分顯著。蘇維埃憲法也規定有幾個地方得到極大的自主權，那些地方即所謂自治共和

國 (autonomous republics) (註一)，還有許多地方獲得較少的獨立程度，此即所謂自治地 (autonomous regions) (註二)，在事實上說：這些地方與行省並無區別，亦將蘇維埃領土實行分化 (註三)，直等到一九二三年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 (U. S. S. R.) 成立後，始見自治地的重要，因為自治地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院中得到代表權了。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土，限於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中所留下的範圍，此即除烏克蘭以外的領土；但自德意志戰敗後，烏克蘭得單獨生存的問題，又重復發生，迫在大戰中，烏克蘭的屬主屢易，最後鄧尼金敗北後，便由蘇維埃軍隊所佔。蘇維埃政府只在以前曾承認過烏克蘭共和國的單獨生存，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Ukrain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 的憲法，是由一九一九年三月十日烏克蘭蘇維埃大會所通過，

(註一) 例如 Bashkir, Kirghiz, Tatar, Crimean 及其它共十一國。

(註二) 一九二八年初，有十二地，在俾爾加河旁的德意志自治團體 (German Commune)，先是一個自治地，後改自治共和國。

(註三) 把一國分做若干省 (gubernias)，仍沿帝國舊制，只略為改變。

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最後組織是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所完成的。同時白俄羅斯共和國 (White-Russian Republic) 亦告成立，此一新共和國乃由一九一九年二月四日白俄羅斯蘇維埃大會所認可，實際是在一九二〇年八月正當俄波戰爭聲中所成立，其所以組成者，蓋感測非此即不足以誘致白俄對蘇維埃旨趣的同情，殆無疑義。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間，在亞什白強 (Azerbaijan)、亞美尼亞 (Armenia) 與喬治亞 (Georgia) 先後成立社會主義共和國 (註一)。同時蘇維埃政府又與基伐 (Kirva) 與布克哈拉 (Bokhara) 締結條約，承認兩地為獨立共和國，這種新機體造成蘇維埃國家政治構造的亂源，因此之故，一九二二年末至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擬設法改善彼此分離的蘇維埃共和國的關係，並通過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新憲法。

迨一九二九年末，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中包含以下的許多國家：(一)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二) 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三) 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四) 外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五) 烏茲伯克 (Uzbek) 社會主義蘇維

(註一) 參看第七章第三節。

埃共和國；(六)土可曼(Turcoman)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七)太特其克(Tadzhik)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俄羅斯與外高加索兩共和國是邦聯的，其它只是幾個聯合的單位而已。外高加索邦聯共和國是在一九二二年末併合了幾個本相分離的外高加索共和國而成，烏茲伯克與土可曼兩共和國於一九二四年成立，乃代替外黑海流域與庫倫(Khorezn)與希克哈拉諸共和國。太特其克共和國在一九二九年以前是烏茲伯克共和國的一部分。

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组织正如蘇維埃國家的政治構造一樣需要改良。聯邦中的七個重要共和國，都有政府的組織，和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一般無二；也都有一个蘇維埃大會、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一個人民委員蘇維埃，但現時聯邦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全聯邦蘇維埃大會，至於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近乎與昔日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相似，現時包含兩院：全聯邦蘇維埃(The all-Union Soviet)與民族蘇維埃(Soviet of Nationalities)，在全聯邦蘇維埃中，約有四百人，代表統一的共和國，按每一共和國的人口平均選出；在民族蘇維埃中，含有聯合的和自治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代表——五人選一人——及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各自治地的代表——每人選一個。

全聯邦人民委員蘇維埃祇包含聯邦各委員會的委員長，如外交、陸軍、海軍、貿易、交通、郵電、勞工、財政以及全國經濟最高會議和工農視察團。蘇維埃的聯邦制度與歐美的聯邦主義不同，正如蘇維埃的議會主義與西歐和美利堅的民主制度不同，蘇維埃的聯邦主義實是一種特殊的種類，基於每一個聯合的共和國，各有相同的普魯列塔利亞獨裁政治的階級主義，實際只是共產黨的獨裁政治，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組成後，共產黨便改做「全聯邦的共產黨」，但自在名義上改變後，共產黨却依然是中央集權的，由此可以看到蘇維埃的聯邦主義是並不如外表那樣鬆散的。共產黨實是個別蘇維埃共和國之統一的力量，這是非常有趣的事，差不多在所有聯邦的每一個共和國中，共產黨中以俄國人佔其大半，共和國的土人反居少數。不過我們須知道蘇聯的聯邦主義畢竟比不得蘇俄議會主義那樣地人工化。在龐大俄國的領土上，愛鄉土主義的力量極其強盛，這種愛鄉土主義給予蘇維埃聯邦主義一個堅固的基礎。我們可說將來俄羅斯的政治構造任憑如何現象，其聯邦主義也許永不會消滅的，反之，必能着着發展的。

第六節 蘇聯公民的權利

如以蘇維埃憲法與多數近代憲法相比較，則前者並不主張公民平等和個人自由的原則，蘇維埃法律上的平等原則，換做階級區別的原則，社會分做「工人」與「非工人」兩部分（註一），根據這個原則，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會分做幾類人，用以分配民間的食物，可謂備極慘酷。自「戰時共產主義」告終後，仍保留舊制，在社會分做幾個階級，非工人的政治權利，則被剝奪，已如上述，工人且得享受其它許多的特權，例如蘇維埃法庭對出身為普魯列塔利亞者犯罪時，實際上常常予以寬貸，有時更不予處罰，而且工人及其子女還可得到享受高等教育的優先特權，又組特殊的工人會所，以謀他們的福利。不過工人與非工人關於侵犯個人自由與家庭自由的那些自由權利，同樣都被剝奪，只自新經濟政策施行後，他們始得到一些保護私有財產的有限權利，蘇維埃政府授權與其機關，尤其是特種委員會（「基卡」），得逮捕及處罰公民，並無任何一定的手續，新經濟政策後，解散「基卡」，於一九二二年另組機關，

（註一）按照共產主義的理論，所指「非工人」一類，如實業家和商人等，在蘇俄以外各國並不為然。

卽所謂G. P. U.，但這不過是名義上的改變而已。G. P. U.的代理機關，賦有逮捕反革命、土匪、販私者的全權，至於有無特殊證據，概置諸不問，其它罪犯，則由G. P. U.高級機關的唯一當局逮捕之，在形式上，所捕人民如不釋放，須限兩星期的拘留期內，提出審判；但如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授權，得不依照規定，任意將罪犯單獨執行。

蘇維埃政府早已否認有所謂家庭的安全，政府與共產黨都有權逐出住居着的人民，而另換租戶（註一）。一九二二年發出一道命令，宣佈政府有逐出住所中的租戶之權，只須由法庭一紙命令，卽可執行，但命令並未禁止如果以爲他人的房屋太大而發生強入他人房屋的情事。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私產——無論是動產或不動產——都歸國家所有，勒索和充公的事一任政府機關的意志，不需要計量與顧到責任。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人民委員會蘇維埃命令，承認寓懲於征的原則，且許以此種懲罰之形式在法庭與行政機關中應用之。

蘇維埃國家沒有出版自由，按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將出版書籍雜誌的一切活動，都交給「勞動階級與貧苦的農民」，換句話說：實際上則操在共產黨與蘇維

（註一） 工會會員有權佔據城市中心的最優良房屋。

埃政府的手中。一九一八年秋剷除一切私人的出版，迨自新經濟政策後，蘇維埃政府才迫得允許私人的出版權，但須經過嚴格的檢查。凡煽惑他人反抗蘇維埃政府的作品，及用假造材料激動輿論或激動宗教的或民族主義的狂信，都在禁止之列。每一種出版物須經檢查者看過同意而簽字，祇有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中央委員會、共產黨的地方委員會、國家出版局(State Publishing House)的出版物、公報、伊士凡士夏報("Izvestia")以及科學院的科學論說文等等，都是不受檢查的。

按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却公然承認公民有集會自由權，而且又給工農以適當的開會處所。但在實際上呢？非經共產黨或政府許可，不得公開集會，甚至於科學社舉行會議時，也得先由政府明顯許可，任何大會——無論是地方的或全國的——舉行時，總該先得主管政府機關的許可。

除了共產黨以外，蘇維埃國家不許組織任何政黨。許多會社是由一九二二年命令所特許的，但有一個條件，須得到內政委員會的許可。

在蘇維埃國家，實際上也並沒有信仰自由，依共產黨的眼光看來：『宗教等於所給人民

的鴉片」，由此之故，蘇維埃政府擬限制教會的行動，而對反抗教會的那種反宗教宣傳，却處處予以可能的便利，實在主義的理論是以共產主義為國教的，在形式上看來：蘇維埃國家的政教是分離的，但事實上教會早被政府所壓制了，教會在法律上的權利已被剝奪，並不認它是一個法人，故亦不能享有財產，教會中的一切財產，尤其是正教(Orthodox Church)，早於一九一八年被蘇維埃政府攫奪殆盡，政府且命地方蘇維埃將教會房產轉給「禮拜者」(Clergy)，若輩有收取教產之權，教會中的高級組織，無論是中央的或地方的，蘇維埃法律都不予許可，抑且禁止之(註一)，教士則屬非工人一類，其特殊權利也被剝奪淨盡，如牧師在學校中供職，凡司法、農業、糧食、以及合作運動各方面的事務，都被禁止担任。

這樣說來：蘇維埃政府所讓給公民者，祇極有限的一部分權利，而且一旦宣佈圍攻或戰爭時，連這點權利甚至也被奪去。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發佈關於「革命自衛非常策略」的命令(註二)，此中含有八十人反抗時代帝政立法的惡烈成分，按照一九二三年的命令，對改革

(註一) 實際上各種宗教組織依然存在，正教情形比較最為惡烈；但於一九二七年亦得到一半的認可。

(註二) 當蘇維埃政府初年，「非常策略」的命令是不需要的，因為那時整個狀態，都認為「非常的」。

命或人民反對政府合法行動的時候，都施以非常的策略，此外又宣佈軍法，一旦指定領土變爲軍事行動的場合及遇非常狀態，規則不足以防禦革命時，都得施用。致一九二三年的命令，實未限制政府機關宣佈非常或軍事狀態的權力，如政治機關，或在事實上說，如共產黨領袖們認爲必要時，即得施行非常的策略。

第七章 蘇俄的外交政策（一九二四）

第一節 第三國際

蘇俄的內政與外交是都由共產黨所統治的，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正式代表，在事實上並不是俄羅斯的代表，而只是共產黨的代表。在蘇俄的領土內。共產黨是一個唯一的中央集權的政黨，但在國際事務上呢？它只是第三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政治組織的份子之一。

第三國際是個有組織的國際共產黨，其總部設於莫斯科，直至世界大戰告終後，始有組織共產國際的可能，布黨利用戰事的最後數月間，對那些捉到俄國來的俘虜們，散佈共產的宣傳，戰事停止後，他們就立刻迅速地組成第三國際，召集國際第一次大會的宣言，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廿四日由列寧和托洛斯基所發表的(註一)，第三國際第一次大會遂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對全世界的工人們，發表一張冗長的宣言，並選出各部的主任。第三國際最初的活動時期，頗欲激起俄羅斯以外各國的共產革命，在匈牙利和布凡里亞(Bavaria)確曾引起過革命，但不久就被平定了(註二)；至在英美，也曾計劃過革命的事。

布黨鑒於戰後革命運動都告失敗，於是起草一個在國外宣傳的有系統的綱領，一九二〇年七月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後，定出一個新的計劃，以總部設於莫斯科的第三國際，引導全世界的共產宣傳，為便利起見，分為好幾個宣傳的特別區域，歐洲分成六個這樣的區域；華

(註一) 好像威爾遜總統在普林基坡召集會議時一樣情形，見以上第四章第六節。

(註二) 共產政府曾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廿一日至八月一日一度成立於匈牙利之巴拉甘(Bela Kun)，至於一九一九年

四月七日所成立的布凡里亞蘇維埃政府，為時更暫。

備「世界革命」所支出的費用極大，簡直無可確計，一九二三年共產國際的預算，至少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它要想做一個有力的蘇維埃世界政府，可是如今它還只是個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的補充物，在形式上說來：莫斯科直變做了一個共產世界的中心。

共產黨對於亞洲的人民，施以大力的宣傳，共黨與蘇維埃政府的領袖們開始如火如荼的活動，訓練革命的領袖，說是爲了亞洲的人民；而亞洲人也表示他們極願諦聽他們的號召，蓋自歐洲人在東方佔有經濟與政治的特權後，亞洲人漸漸感到反歐的激迫，故布黨煽動家的革命宣傳，初在東方得到極大的勝利，不過畢竟因爲這般人太拘泥於共產的理論及與一般宗教勢不兩立之故，遂處處受到阻礙，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巴庫 (Baku) 所舉行的東方人民大會 (Congress of Eastern Peoples) 中，謾罕默德主義 (Mohammedanism) 似較共產主義爲強盛，齊諾維夫 (Zinoviev) 反對宗教的演說，激起謾罕默德教人的憤激。

在中亞細亞、近東、波斯或土耳其等地，都不是適宜施行共產主義之現存的社會組織，俄國革命足以表明共產理論祇能誘惑一般工人和幾個智識份子；但在波斯或土耳其，根本就沒有工人和智識份子。

英國很怕共產宣傳及於印度，不過印度人民之強烈的宗教情感，總是一個抗拒共產觀念發展的堅牢屏障。至於在中國呢？情勢就不同了，在那裏俄羅斯共產主義的影響，比在波斯或土耳其強大得多，許許多多的中國智識份子和勞動階級都同聲採納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黨中左翼，且表同情於共產主義。（譯者按：現在中國情勢早已不同，共產主義已成過去一現之曇花矣；且著者謂「許許多多（Considerable）中國……採納共產主義」一語，譯者亦期以為不然，過去盲信或盲從此項主義者容或有之，但以「許許多多」形容之，恐未免過甚其詞矣）。中國共產黨亦隨之組織起來，加入共產國際的組織中（註一）。

第二節 西俄邊界的重行劃定

除世界革命的國際問題以外，共產黨尚有相當的國內問題，最要者為保護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領土一事。照共產黨的理論，否認純粹國內問題的存在，不過由於實際政治的需要，迫使俄國共產黨勢必維護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統一，正如他們不得不承認聯

（註一） 參看以下第八章第四節及第七節。

邦中的民族權利一樣。共產黨領袖們想掩飾他們的民族主義，求訴於勞動階級，即所謂「社會主義祖國」(‘Socialist Fatherland’)之自衛，此一口號最先是在一九一八年初蘇德談判時特別所提出來的，但這並不能阻止共產黨與德意志締結一個慘酷的和約，其中有一個條件，竟把烏克蘭脫離俄國(註一)，自德國崩潰後與德軍退出南俄後，烏克蘭領土便成爲俄國內戰中雙方所攘奪的目的物，各國都對烏克蘭看做是俄國實際上的一部份(註二)，最後勝利屬蘇維埃，於是烏克蘭即成爲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一部份。

然而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西南邊界，並不與俄羅斯帝國昔日的疆界相合，巴塞拉比亞(Bessarabia)會於一九一八年春間被羅馬尼亞軍隊所佔，不過蘇維埃政府迄未放棄對巴塞拉比亞的要求，即至今日，還是如此。一九二四年在烏克蘭領土內成立一個特殊的摩爾代維亞蘇維埃共和國(Moldavian Soviet Republic)，好像這是供巴塞拉比亞人民使用的一塊政治吸鐵石一般。

(註一) 參看以上第三章第七節。

(註二) 雖然蘇維埃政府已正式承認烏克蘭是個獨立國家，參看以上第六章第五節。

轉顧極北方面，還有許多俄人所居的俄國領土，按照一九二一年的和約（註一），已被蘇維埃政府割給波蘭了，在波蘭以北，則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所定的邊界，都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疆域。一九二〇年蘇維埃政府又與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與芬蘭締結條約。

第三節 近東與中東方面的外交

蘇維埃政府東部方面的邊界，並不如西部那樣地確定，可是最後竟近乎達到昔日俄國的邊疆。

以下讓我們對蘇維埃在近東與中東方面的政策，作一檢討。

蘇維埃政府對於土耳其的政策，一些也沒有成功，按照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俄國將巴統（Batum）喀斯（Kars）與阿達根（Ardagan）割給土耳其，巴統與一般的外高加索兩

（註一）參看以上第四章。

地先由英軍所佔(註一)；隨後巴統始由蘇維埃軍隊所得；最後則由俄國保留，喀斯與阿達根則在實際上已割給土耳其了。

英國佔據外高加索，在形式上說：只是暫時的性質，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在一九一九年，英國外交對於中東方面抱有極遠大的野心，一九一九年八月九日，英國波斯間在德里蘭(Torran)訂一協定，實際上即以波斯變為英國的保護國，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甘叢爵士(Lord Curzon)演說：『不列顛大獅站在波斯權利和自由前為一傲慢的勇敢的保護者』。英軍駐於安齊里(Enzeli)與馬什得(Mashed)，還有一小部進入俄羅斯的土耳其斯坦，佔據末夫(Merv)，而敗退蘇維埃軍，在後者中，則包含許多在杜先克(Dushak)地方的匈牙利俘虜有幾個英國軍官且想在整個的土耳其斯坦建立起英國的統治，但因英吉利本土政治局面的未臻穩定及共產國際在英國的宣傳，迫使英國不得不放棄他們的中亞細亞的計劃，至一九二〇年，英軍遂退出土耳其斯坦外高加索與北部波斯諸地(註二)。

(註一) 參看以上第四章。

(註二) 一九一九年英波協定，未經波斯國會批准，迄未履行。

英國人走了，却好了俄國人，使蘇維埃的統治在中東方面得以確立，在亞什白強（Azərbayjan）與亞美尼亞（Armenia）的蘇維埃共和國早於一九二〇年建設起來了。同時喬治亞共和國亦與蘇維埃政府締結和約，翌年在喬治亞起了一個共產革命，此由莫斯科所主使的，隨後也宣佈是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註一），建立外高加索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加入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中。

在土耳其斯坦呢？蘇維埃政府則須對付土民的起事，即所謂「白斯馬基」（“Basmachi”），這個運動是汎土耳其斯坦的，也是汎謨罕默德的，其領導者是那有名的土耳其將軍白夏（Fuver Pasha），他到土耳其斯坦時，假裝是一個蘇維埃的朋友，不料後來加入了一「白斯馬基」，有一個時期，蘇維埃政府的地位非常不穩，最優良的戰略家加米尼夫竟出來主持一切行動，終於一九二二年七月被他壓平了亂事，白夏即於是役死亡。

蘇維埃政府取得了全局的統治權後，即在土耳其斯坦從事行政的改革，基於工人代表，許以相當限度的自治，一九二一年春間在塔什干（Tashkent）也建立起蘇維埃政府，追基伐

（註一）見以上第六章第五節。

奧布克哈拉兩共和國成立後，蘇維埃政府即於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與她們訂結條約的關係，數年後此兩共和國又併入烏茲白克蘇維埃共和國中，遂加入了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註一）。

在中東方面重行建設起舊俄的版圖，蘇維埃政府進而在波斯施行一種新的政策，一九二二年二月廿六日與波斯結一條約，按照條約，蘇維埃政府排斥「舊俄政府所抱的帝國主義的政策」（註二）。並將雙方所結或俄國與第三者所結關於波斯的那些以前一切同盟與條約，概行廢止；蘇維埃政府又將俄國人所建造的及所有的特久爾發（Djula）至大不里士（Tavriz）間鐵道交給波斯，此外又將安齊里至德黑蘭與喀斯文（Kazvin）至哈馬丹（Hamadan）以及波斯借款銀行統統交還波斯，關於黑海南岸的漁業，將在日後會議中討論，確定專利時期，但蘇維埃政府則保留專利漁場之權利，蓋黑海漁場是波蘇間久懸不決的談判案及雙方的誤會所在點，至一九二七年十月，才最後簽訂一個協定，規定黑海漁場則由俄波公司所專利，主席為

（註一）參看以上第六章第五節。

（註二）蘇維埃政府與土耳其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所訂條約，亦有同樣規定。

波斯人，此後廿五年，魚的生產概歸兩國平均分配。

第四節 日俄關係

自西俄柯爾察克戰敗後（註一），蘇維埃政府並無立刻征服整個東部西伯利亞的必要。

一九二〇年又發生俄波之戰及與南俄胡蘭吉的內爭。到了一九二〇年春，協商國軍隊及捷克人始離去海參崴（註二），只有日軍依然佔據海參崴及海岸等地，謝米諾夫（Ataman Semenov）是他們的代理人，維持外貝加爾區域的統治。柯爾察克的殘部退入滿洲的環境，蘇維埃政府遂決計在東貝加爾湖組織一個緩衝的國家。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四日蘇維埃政府承認「遠東共和國」，以赤塔為首都，其第一任內閣總理為克拉斯諾西柴霍甫（Krasnoshchekov），前為芝加哥律師，新共和國組成後，便對日本軍隊之繼續佔據及日本扶助白俄軍殘部等事，提出抗議，同時「遠東共和國」請求蘇維埃政府予以援助，於是蘇維埃軍隊於一九二〇年秋間入

（註一） 參看以上第四章第十節。

（註二） 最後奧國軍隊於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撤退。

赤塔；但日本政府亦於一九二一年春間扶助在海參崴所組織的反布黨政府，其軍力包括白俄的殘部，不過在未經日本認可他們開入海濱區域前。已被日人解除了武裝。一九二一年九月，日本與遠東共和國開談判於大連，結果不幸決裂，後交一九二二年二月華盛頓會議審議，又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在錦州談判，最後日本始宣言將於一九二二年十月末自動撤回西伯利亞各重要地方的軍隊，在這裏，沒有解決的唯一問題是日本人要求取得山克哈林島(Shakhalin) (註一)的北部。

如果沒有日本人的扶助，海參崴政府當然未能抵抗布黨的，結果白俄殘部退入上海，海參崴遂由蘇維埃軍隊所佔領，如今遠東共和國於莫斯科已沒有用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共和國「國民會議」投票，將一切權力委諸蘇維埃政府所指派的革命委員會，所謂遠東共和國於是便壽終正寢了。

蘇維埃政府卒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廿日與日本締結條約，按照該約，雙方須重申樸次茅斯和約(Peace of Portsmouth)中之條款，日本放棄山克哈林島北部，不過社會主義蘇維埃聯

(註一) 山克哈林島北部一半地方本於一九二〇年秋間爲日軍所佔。

邦共和國須同意將此島北部一半作爲日本的若干殖民地。

第五節 蘇俄與中國蒙古滿洲的關係

講到蘇維埃政府與中國的關係，應考慮帝俄時代所留下來的兩個尙未解決的複雜問題：
(一)中東路問題；(二)蒙古問題。

在一九一五年大戰聲中，中國內蒙古與俄羅斯曾訂過一個三方協定，在蒙古建設一個中俄的聯合保護國。後於一九一九年正當俄國亂象環生時，中華民國便決定要改變蒙古的情勢，歸併於華，不幸西伯利亞的俄國內戰，又立刻影響到蒙古來，一部分白俄陸軍於一九二〇年初被布黨趕入蒙古，不久蘇維埃軍隊便進侵蒙古來干涉，說是要肅清那白軍遺跡，經蘇維埃的煽動，在蒙古即起一次革命，也創立革命的政府；新蒙古政府遂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與蘇維埃政府訂立友好條約，這種情況當然激起中國統治團體之極度的憤慨。

蘇維埃政府在中國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中東路的管理。一九一九年宣言，蘇維埃政府自願完全放棄該路的權利，此一宣言發表時，正當西伯利亞尙處於白軍的統治之下及中東路

由協商國委員管理聲中。蘇維埃政府早已放棄一切以前不屬於己的物事，可是一年後，當情勢變遷之餘，蘇維埃政府對於中東路的態度，也跟着轉變了。當蘇維埃政府佔據海參威時，中東路又恢復昔日之重要，蓋該路是俄國領土兩部分間的捷徑。蘇維埃代表越飛 (Joffe) 於一九二二年公然對中國政府告知蘇維埃政府的新觀點，但同時中國外交部要求俄軍退出蒙古，而須承認中國在蒙古的主權，越飛與中國外交部的交涉，苦無結果，後於一九二四年蘇維埃代表加拉罕 (Karahan) 與中國簽一協定，允許中國關於蒙古的要求，按照協定第五節，蘇維埃政府『承認外蒙古為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尊重中國在該地之主權』。蘇維埃政府也允許撤退在蒙古的俄軍；至關於滿洲與中東路，蘇維埃政府與中國同意視該路是一種純粹的經營的企業，而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也承認中國在鐵路區域領土內，享有法權及警察統治權，蘇維埃政府又確申中國有購買該路之權，鐵路的管理權則操在董事會的手中，半數董事由中國政府所委派，其他半數乃由蘇維埃政府所委派，其主席則由中國人所推定；但是此一問題並未由條約完全解決，因為還雜有美日及以前俄亞銀行那些鐵路債權者各種不同的要求，而且還須顧到當時滿洲的獨裁者張作霖的意見。一九二四年九月三十日蘇維埃政府與張

作霖簽訂一個條約，其款項幾與上述協定相同。

第六節 新經濟政策時代的外交政策及基諾亞海牙兩次會議

蘇維埃政府和任何布爾喬亞國家一樣，爲的要保護它自己的疆域，因此先後與各鄰國及與它國訂立商業及政治條約，在這方面第一次的發動，可溯自新經濟政策時代，首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英國與蘇俄簽訂商約，蓋新經濟政策綱領，允許對外國人表示讓步的。

那時歐羅巴外交的趨向，正與蘇維埃的意旨相合，至一九二二年，歐洲還未恢復戰後的餘困，政治組織與經濟福利都未臻穩定，大多數的歐洲政治家都深信如欲重建歐洲，非與俄國恢復尋常關係不爲功，力持此見者爲勞喬治氏，他說：『非與俄羅斯締結和約，歐洲的和平必不保』。歐洲一般工商國家的輿論，都以為俄羅斯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她是原料的來源地，也是歐洲工廠出產品的一個最好市場；至於俄國的統治者無論是個共產主義的政府或是個資本主義的政府，那是無關緊要而不必顧慮的事，邦交應立刻重新建立起來，那時歐洲各國都爭先恐後欲與俄國締結新的邦交，而且那幾個戰勝的列強還唯恐德國或許會攔斷了俄

國的貿易，誰料蘇維埃的外交正唯如此得狡猾地在西歐運用她們的恐妒心理。

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協商國在康魯 (Canne) 所開的最高會議，即欲與蘇俄恢復邦交的第一步，她們討論各種條件，以便重整被大戰所敗壞的各國經濟，而都以俄國視為開展經濟的主題。她們定了兩個條件出來：(一)俄國須承認以前一切債務；(二)須發展一個尋常的財政及商業組織。同時最高會議採納不干涉各國經濟生活的原則。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續開會議於基諾亞 (Genoa)，這是有蘇維埃代表出席的第一次國際外交會議，蘇維埃代表的初次宣言是極商業化的，使許多歐洲的政治家希望可以訂立相當種類的協定，蘇俄代表齊切林 (Chicherin) 試探口氣地宣示他自己準備承認俄國在戰前與戰時的債務，其方法把充公的財產移給外國的所有者，或給予相當的賠款，不過各國務須立刻在法律上承認蘇維埃政府及須具有極大的信任；齊切林又反而要求賠償協商各國干涉俄國內戰時的損失，於是協商各國對齊切林的提議，顯然發生意見紛歧了，英意兩國願意致慮的，但法比兩國甚至拒絕討論，其實不同意點是關於法比兩國以前在南俄的殖民地一事，其時勞合喬治還欲與蘇維埃政府訂直接協定，取得英國的經濟特權。俄國煤油出產品與出口物的總

量，都已歸皇家荷蘭仙爾公司 (Royal Dutch-Shell Company) 所獨佔，這事揭佈後，美國的「觀察報」就警告會議說：美國必堅持對俄國煤油取門戶開放政策。

由於協商各國利益的衝突，基諾亞會議總告失敗，不料此舉却助長了蘇德的修好，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蘇維埃政府與德意志單獨在拉普洛 (Rapallo) 簽訂一個協定，規定兩國對於賠償戰債損失之相互的要求；德國放棄擁護德人所要求的以蘇維埃政府所充公的財產作為賠款，關於此事，是由「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所提出來的，但未滿足其它各國同樣的要求」。德俄遂從此恢復完全的外交與領事關係，條約第五條謂：「兩國政府對於供給兩國之經濟必需品，須共同贊助之……德意志政府宣示在可能範圍內，準備締結及履行關於兩國私有企業之經濟契約」。

凡基諾亞會議所未決的問題，統交一九二二年六七兩月間在海牙 (Hague) 所召集舉行的若干「專家委員會」(“Commissions of experts”)，那時莫斯科因鑒於以前難與資本主義的國家相妥協，早懷有一種不能議和的態度，蘇維埃代表在這種不妥協的情調中來到海牙，因此之故，海牙會議又是一回失敗，雖然協商國代表似乎比以前多多準備欲與蘇維埃企圖諒解

呢！

第七節 洛桑會議

雖然以前有兩次連續會議的失敗，然而蘇維埃政府仍然接受同年秋間將在洛桑 (Lanzanne) 舉行新國際會議的邀請書，此次會議的主要目的，在討論達丹尼爾斯海峽 (Straits of the Dardanelles) 問題，欲與土耳其簽訂一個永久的條約。蘇俄與土耳其到洛桑時，携帶一個共同的政策，兩國都要求除土耳其以外，這海峽須封鎖一切軍艦，反之，英國却希望各國軍艦及商業艦可在海峽中通行，推究英國所以抱此態度的原故，因要保持在英國所控制下的高加索一部分，尤其是巴統地方是巴庫煤油的出路。最後經法國的調解，總算得到了一個折衷辦法，規定軍艦可以通過海峽，不過其噸數不得超過黑海邊之主要海軍國家——即俄羅斯——軍艦的噸數。土耳其代表不願先前曾與俄國協調，忽接受了這個提議，但俄國代表齊切林却拒絕簽字，而警告各列強說：如無俄羅斯烏克蘭及喬治亞等國的參加，問題不能算是解決了。

這樣看來：似乎洛桑會議並沒有得到實在的結果；不過要知道蘇俄的外交正與各國一樣，一心要想抓住簽訂一個國際條約的機會，以此可足爲在法律上被簽字條約各國承認了蘇維埃政府，因此卒於一九二三年七月末，蘇維埃代表終於同意在君士堡丁堡（Constantinople）簽訂一個條約，此一條約還是在洛桑所擬定的，不過簽約諸國却宣佈道：關於海峽問題保留日後提出新議案之權，因爲他們以當時的統治制度認爲大不滿意的。

第八章 列甯去世後的蘇維埃內政與外交政策

第一節 列甯的繼承者及托洛斯基的反對

在布黨統治制度的初年，列甯實是俄羅斯的獨裁者，一九二二年五月廿五日他忽然病了，至同年十月才漸漸恢復了健康，重負艱巨，但至十一月，他的身體愈趨愈壞，翌年三月重染大病，未能言語，不幸竟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廿一日與世長逝了。

列甯雖然已死，然而死後許多時候，列甯的靈魂還是繼續在統治着俄國，他的言論，不

曾是其產主義的聖經；他的信徒唯從此中覓得政治的引導，黨中任何雄辯家所說的話都不能抹殺列甯的辭句，莫斯科列甯的坟墓是共產主義的寶座，那彼得大帝的都市彼得格勒，現在改名爲列甯格勒(Leningrad)，『列甯的都市』了。

列甯死後，即引起一個問題，誰來承乏俄羅斯共產黨的領袖，亦即誰爲蘇維埃政府的主腦？最初代以三頭政治——加米尼夫、齊諾維夫與斯達林，以這三個布黨人物任常務之職，加米尼夫的真名是羅山汎爾特(Rosenfeld)，他是最不革命的，但也是最有學問的；齊諾維夫名亞勃汎爾白(Apfelbaum)，是一個既沒有道德也缺乏才能的驕傲魯莽的人，他在黨中所以能得到一個領袖地位者，祇歸功於對於列甯的諂媚的態度；斯達林是喬治亞人，名特求格喜維里(Djugashvili)，是一個有堅定意志與無可諱言的組織才能的人，所以才能取得蘇維埃政府的重要地位。

次於列甯的最重要的領袖和俄國革命的最顯赫的雄辯家，厥惟托洛斯基，殆無疑義；可是他的權力盡被那三頭執政部所剝削，因而逼得他立刻起來作反抗的運動，在他的政策中，是個人的動機湊合了主義的理智，他永遠不會是一個正統派的共產主義者，一九〇五年革命

與下一年，他曾挑撥布爾希維克與門希維克兩派的不和，有時他加入後者集團中，迨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後，他才終於加入布黨方面，而最後却變為布黨起事領袖之一；不過此後他所發表的意見，有好幾次被列甯或共產黨大多數人所不同意，所以這實是意想不到的事，列甯死後，他竟是純粹共產主義思想的代表者，他要想壓服齊諾維夫與加米尼夫，但缺少真實的革命精神，他指斥兩個星期以前，他們兩人曾在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投票反對，托洛斯基的這種攻擊引起黨中領袖們急劇的聲辯，於是一黨中遂分成了許多系派，托洛斯基乃為反對中央委員會一派的領袖。

第二節 一九二五年的農民政策及新的反對力

托洛斯基的黨徒攻擊黨中抱有布黨傾向的大多數人，宣告他們自己是純粹共產主義的保衛者，新經濟政策是托洛斯基派所反對的主要鵝標。當一九二二年列甯在日的當兒，黨大會曾宣言要結束「回到經濟邊綫」的事，已如上述，可是列甯死後一年，妥協的新時代即行開始，最要是關於農民者。

一九二五年春間，蘇維埃政府與農民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共產黨的主要理論家普拉甫達（真理）報（Pravda）主筆布哈林（Bukharin）會承認雖然新經濟政策是如此，但「戰時共產主義」的影響，依然可在鄉村經濟方面觀察出來，農民們都不相信蘇維埃統治制度之下，會恢復他們的田地，兩年以後，一九二七年初，即斯達林也不諱認一九二五年的農民問題會重重地統制過共產黨的，他說：「我們在鄉村中的代理人都被殺戮，而代理人的屋子也被農民們放火燒去……在有幾個地方，尤其在邊境區域上，我們應與有組織的集團的行動相爭鬥，而我們也應壓平喬治亞的真正的農民起事。」

蘇維埃政府看到這些事實，因此決定實行有利於農民們的政策，一九二五年春間所開第十四次共產黨會議，即同意了這個新的農民政策，斯達林在會議席上所說明共黨的宗旨道：「現在最要的問題是如何在工人的周圍，將農民的中產集團聯合起來；我們應該說服農民中產集團的同情心」。同時，蘇維埃邦聯主席加立雷（Kalinin）與蘇維埃政府總理雷可夫（Рыков）也極力為農民救濟方面說話。

蘇維埃政府的新農民政策，可作為新經濟政策之遠大的開展，但此一政策，却激起共產

黨中新的反對力的爆發，這情勢變得更其危殆一黨的統一，因為蘇維埃的兩個領袖齊諾維夫與加米尼夫也加入了反對派，他們對於新農民政策的批評，說這是蘇維埃領袖放棄純粹共產主義的一個好例；當共產黨執行委員會解釋此一政策在聯合農民中產團體的一種手段時，反對派領袖們就攻擊執行委員會在那裏救濟富農了。但這是應當知道的事，其實蘇維埃領袖們要想把農民分成幾個團體，按照第十五次大會的議事錄，規定貧農團體的每年收入，每人為三十元，中農團體每年每人為四十六元，富農團體每年每人為八十八元。此外，反對派還攻擊大多數黨中領袖們於黨的管理取專斷主義，他們要求撤廢政治局之專制的權力。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中，反對派領袖們對於大多數人提出極苛刻的批評，可是大會却終於同意了中央委員會的政策。斯達林於戰勝反對派之餘，不想對反對派再取任何懲罰的策略，他祇限於警告他們就算了，他說：『黨是需要統一的，如加米尼夫與齊諾維夫有這種期望的話，統一即能得到，否則便談不到此』。

第三節 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的共產國際

列甯死後蘇維埃的外交政策，仍遵照列寧所揭發的兩條路綫：（一）用共產國際來造成世界革命；（二）以新經濟政策施於外交關係中，換句話說：是爲對付布爾喬亞的目的與商業協定以及迫使它國予蘇俄以法律上的承認之事。一九二四年可說是蘇維埃外交政策最活動的那一年，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發起人克拉辛（Krasin）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共產黨第十三次大會中演說道：『如要禁阻蘇維埃統治制度破產，則靠外來資本的援助是不可少的事』。他又說：『如要得到外來的助力，必須採取更和平的態度，而應使世界革命的旗幟降低一下』。

共產國際並未接受克拉辛的意見，反之，那時共產國際的主席齊諾維夫却表示相信國際革命的新潮正在起來，一九二四年六七兩月間在莫斯科所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完全同意齊氏的見解，因而採取一種不妥協的政策。雖然共產黨領袖們的心地是如此激烈，可是說也奇怪，其時正式的歐洲外交却表示願意予蘇維埃政府以法律上的承認，這原因一半由於歐洲的輿論並未完全覺悟共產黨政策的轉變，而他們反而還在希望蘇維埃的外交予以讓步。

英法兩國工黨與左派選舉勝利後，也走着同樣的趨向，英國首先給予蘇維埃政府以法律上的承認，在一九二三年末，這種承認早已定在英國工黨的政綱中，故工黨上台後，卽於一

九二四年二月一日麥唐納 (Mac Donald) 內閣第一次會議時通過須履行誓言，意大利 挪威 與 地利 希臘 與 瑞典 於英承認後兩月，也相繼步其後塵，但是英國之承認蘇俄，並不是無條件的還留着若干久懸不決的交涉案件：(一)英國換文上祇同意承認帝俄時代的那一部分地方，而以那地方須是願意服從蘇維埃當軸者為限；(二)英國政府需要蘇維埃承認以前俄羅斯所有的債務；(三)要求蘇維埃政府須自檢反英的宣傳，尤其在東亞方面為最要。一九二四年四月蘇維埃代表馳往倫敦，其目的欲與英國政府進行交涉，但經過數月後，交涉仍無結果，當英國要求蘇維埃承認俄債時，蘇維埃代表就要求轉向英國借一筆款子，使其政府得以償付債務。直至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雙方始簽訂協定，這是一個離奇的文件，因一切重要問題倒反而聽着沒有解決，說雙方決定以後再行簽訂一個實質的協定。

這樣看來：麥唐納 想與蘇維埃結交友好關係一事，可證明是失敗的了，其原因祇歸咎於麥氏 的不孚衆望，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他在國會中大敗，因是不得不解散衆院，十月廿九日重復選舉，在選舉前沒有幾天，齊諾維夫 的秘密信件，在英國新聞紙上登載了出來，信內包含一個欲準備在英國作共產黨起事的訓令，因此激起選民極大的憤慨，於是保守黨便戰勝了

工黨(註一)。新保守黨政府廢止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的協定，但並沒有收回二月一日所同意的承認，所以這時期英蘇的關係是用一種離奇的折衷辦法而結成的，以前外交上的承認似祇待實行好了；不過事實上雙方只是趨於完全隔膜而已。

雖然英國是失敗了，但法國則繼起倣尤之，一九二四年五月左派領袖赫里歐(Herriot)獲得選舉勝利，十月廿八日法國政府也在法律上承認了蘇維埃政府；不過俄羅斯應感激法蘭西的問題，一時却未能解決，隨後的交涉尙多，當時在法國和在英國一樣，也將共產黨的秘密訓令公佈出來，這也是共產國際方面的革命宣傳，殆無疑義。於是在摩洛哥(Morocco)的法軍所與亞勃特愛爾克里姆(Abd-el-Krim)的反叛部落激戰，因受到這種宣傳而動搖，此外，在保加利亞也發生事件(註二)，準此以觀。可知共產宣傳的遍處歐洲了。

(註一) 共產黨說這通信件爲不確。

(註二)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有人欲行刺保加利亞皇鮑里斯(Tsar Boris) 一保加利亞將軍卽於是役犧牲。當其出殯至教堂時，葬禮甫竣，突起災禍，結果一五〇以上的人被殺，幸暴動的主使犯不久卽逮捕到案，可知共產黨在保加利亞的起事，終至徒勞無功。

第四節 中國革命的爆發

一九二四年後的東亞和西歐一樣，也發見共產黨活動的進展，關於那年中蘇條約之締結與蘇維埃外交在蒙古的努力，已經討論過了（註一）。那時中國的內部情況甚為混亂，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第一次中國革命後，內部的分裂在事實上已很顯著，其時袁世凱統治北方，孫逸仙統治南方，一九一六年袁氏逝世後，軍閥派便取得北方最高的統治權，而且還有幾個軍人自相殘殺，都欲奪霸權為快。蘇維埃政府想與滿洲軍事首領張作霖及被稱為「基督將軍」及軍隊駐於內蒙古的馮玉祥相勾結，一九二四年蘇維埃政府即與張作霖締結關於中東路的協定（註二），翌年雙方分裂，張與英日為友，於是蘇維埃政府即欲與南方的國民運動發生密切的關係；這個運動是在一九二五年發生的，不幸南方革命領袖孫逸仙正在那時忽溘然長逝，虧得他所組織的國民黨仍繼續他的工作，工農運動與國民運動相聯合，前者乃由智

（註一） 參看以上第七章第五節。

（註二） 參看以上第七章第五節。

識分子與學生們所領導的，因為這般人所受歐洲列強帝國主義的政策之侵略，最感切膚之痛，國民黨中包括一派頑強的共產翼，當孫氏在世時，國民黨曾與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發生極密切的關係，蘇維埃政府願意扶助中國南方的革命運動，一九二五年蘇俄派一千名軍事及政治教練到中國來，著名共產黨黨員鮑羅廷(Borodin)被派到中國來為廣東國民政府的顧問，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國民政府的統治範圍，沿海岸綫直達上海，又伸入揚子江的中部，凡國民軍所佔領的區域，都相繼模倣莫斯科政治制度的榜樣而成立政府。

第五節 歐洲的安定及羅迦諾條約

歐洲政治家們認識國際共產宣傳的危險，因是他們覺得有急速安定歐洲之必要。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所召開的羅迦諾(Bocarno)會議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之最重要階段，在會議中，德與英法共謀合作，訂一協定，以備作為解決爭端的仲裁。

蘇維埃的外交對羅迦諾會議看做是各國欲使蘇俄「孤立」與「組成聯合反蘇維埃戰綫」的一種嘗試，蘇維埃的戰術家很想要衝破這道戰綫，果爾，則德意志是最可侵害的一點；但是德

國雖然也被邀出席羅迦諾會議，她在歐洲的外交社會上，却不能得到平等的地位，因為她尚未被各國許可加入國際聯盟，因此蘇維埃便不期然而與德國結成很密切的關係，蓋德國也很想與蘇俄聯盟，準備恐嚇西歐各列強，以便逼使她們許其加入國聯（註一）。當德國代表團尚未離羅迦諾以前，齊切林即趕速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與德訂一貿易協定，而德國還允許蘇俄借以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羅迦諾會議後沒有幾月，迨一九二六年四月廿四日，蘇德條約即簽訂於柏林，規定雙方須維持友好的關係，如一國遇第三國武裝襲擊時，它國須嚴守中立（註二）；在條約中德國的換文上，還指出其目的在反對聯盟中之反蘇維埃的傾向，此一條約可證明德意志方面的機巧的活動，至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她終於被列強許可加入國聯了。

第六節 一九二六年的蘇維埃政府與英國

（註一）這種外交情勢很像基諾亞拉普洛時代，見第七章第六節。

（註二）這是德意志對於西歐列強在國聯三月大會中侮辱她的一種報答，其時雖然國聯也召德代表至日內瓦，但不許她做一個會員。

羅迦諾會議後，蘇維埃外交政策便加緊對大不列顛的進攻，莫斯科俄國共產黨機關報普拉甫達上說：『張伯倫(Chamberlain)以為他在羅迦諾包圍我們了，其實我們反可引着勞工羣衆在其家宅旁邊將他包圍起來』。

英吉利的勞工狀況實在是很不穩定的，一九二五年九月英吉利工會在斯卡鮑羅(Scarbro. town)舉行大會，以二、四五六、〇〇〇對一、二一八、〇〇〇人，通過一個急進的決議案，在原則上反對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勞資的糾紛。那年十二月齊諾維夫在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中說過：『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我們將希望英吉利的礦工起來作偉大的運動，蓋一個真正的革命勞工運動正在英吉利開始』。到了一九二六年三月，齊諾維夫又謂英吉利的社會災難，快要到來了；他說：『如果罷工實際已經開始，我們該首先援助他們，應付歐洲與工業戰爭的國際陣綫』。英吉利礦主與礦工談判決裂後，即引起一度大罷工，不過不久即被制止，全歸失敗。罷工罷到一九二六年秋，在這時期內，蘇維埃政府用金錢又用宣傳以聲援英吉利的罷工運動，那年五月，蘇俄所運給英吉利礦工的錢，計達一、三〇〇、〇〇〇元之譜，七月，莫斯科方面所接濟的增至二、二二五、〇〇〇元。

莫斯科的領袖們與英吉利工會理事會間，曾經英俄工會委員會的居間調解，成立過諒解，可是談判並不能導入協調，因為英吉利工會理事會並不準備接受莫斯科方面之不妥協的見解，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少數英吉利工會所開的倫敦會議確曾接受過莫斯科的見地，可是波綸茅斯（Bournemouth）英吉利工會大會在翌年九月開會時，却以二、四一六、〇〇〇的大多數票把它否決了。

第七章 蘇維埃於中國方面之勢力的盛衰

自援助英吉利罷工失敗後，共產國際即進而調換中央幹部的人選，前任國際主席齊諾維夫免職，另易布哈林主持一九二六年末在莫斯科所舉行的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在同年十二月所召開的俄國共產黨第十五次會議中，都批判齊諾維夫的政策是一個革命冒險者的政策（註一），但在事實上共產國際的政策並未變更，布哈林也和齊諾維夫一般，發表同樣不妥協的見解，他說『共產黨是反動的黨；共產國際是領導革命的遍處全世界的勞工組織』。

（註一）參看本章第十一節。

共產國際的領袖們如今轉而注意東亞起來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與土耳其結一友好協定，翌年十一月齊切林與土耳其外交部長會於敖得薩，稱土耳其為共同反抗歐洲帝國主義之蘇維埃的忠實同盟者。此外，蘇維埃又於一九二六年九月與阿富汗簽一協定；而在中國又是共產國際反抗歐洲帝國主義的主要戰場，其時中國國民革命軍正於一九二六年七月對北軍取新的攻勢，到了九月，漢口為革命軍所佔領，那年末可說是蘇維埃在中國勢力達到最高點的時期。

共產國際的領袖們要想擴張他們的活動，從中國又轉到荷屬東印度，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曾在東印度地方起過一次無結果的共產革命；至於在中國呢？翌年一月曾在漢口開始過一次罷工與宣佈抵制外貨，而同時強裂的反英運動遂即興起。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羣衆侵入漢口英租界，三月廿二日革命軍佔領上海，（除租界以外），廿三日即克服南京。

革命軍軍事行動的繼續進展，暫時會被內部分化所阻，黨中保守派溫和派與共產左翼的不和早於一九二六年秋間發生，到了翌年春間，這種不和更其增長。四月六日北京警察經外交團在文字上的允許，入北京蘇維埃使館搜查各種文件，發現蘇維埃的外交實與國民黨中的

共產左翼具有一種密切的關係，鮑羅廷顯然從中左右一切，這許多文件公佈後，蘇維埃顧問鮑羅廷完全失敗。蓋鮑氏擬在漢口組織一個純粹的共產政府，但終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七日迫得他不得不離開中國了。

翌年十二月共產黨黨徒又助成廣東的起事，一時曾擄奪廣東市，但經過三天戰鬥後，他們終於被革命軍所剿滅了。

第八節 大不列顛與蘇俄外交關係之破裂

當蘇維埃在左右中國事務時，急得英國政府日夜不安，自北京蘇維埃使館的文件公佈後（註一），世人都曉然蘇維埃政府想在中國激起一個皮歐的亂象，因是中國的國民運動起初是揭發反英的，蘇維埃之參加聲援，實是破壞一九二一年蘇維埃政府與大不列顛間的約言，故使英國政府憤而斷然處置，一九二六年那全年，漸漸先製造輿論，力促與蘇俄斷絕邦交。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蘇格蘭代表不顧外交上所予的特免權，侵入為蘇維埃合作社而設

（註一） 參看本章第七節。

的亞谷斯 (AROS) 有限商業公司總店、倫敦的蘇維埃局址及蘇維埃貿易代表團，內政部長說明因為政府中一種有關軍事秘密的文件，已被他們所竊去，因此才來搜查的，結果文件雖未搜到，然而獲得許多其它檔案。據英國政府所見：這是合法的舉動；但蘇維埃政府提出一通抗議書，宣佈英國當局破壞一九二一年協定所給予蘇維埃商業代表的特免權。至五月末，整個問題在英國衆議院中討論，首相包爾溫 (Baldwin) 在衆院中公佈所搜獲的許多文件，證明「在蘇維埃當局直接統治下之常規制度的存在，這些俄羅斯各機關所發來的含有監察性質的文件是秘密地送與英國或其它地方從事共產活動的各種人」。換句話說：包氏即欲揭破蘇維埃政府與共產國際兩物實是一而二而一的陰謀。

因此之故，與蘇俄斷絕外交關係的議案是先由國務院所提出，後經國會同意，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七日英國政府將此決議案轉交駐倫敦的蘇維埃代辦，同日包爾溫宣言道：「我希望鄭重地說：我們的絕交，其含義決不就是對俄宣戰」。於是兩國間的尋常貿易關係，也就停止，亞谷斯有限公司職員有的逐出英國，也有的許繼續留在英國工作。

第九節 關係煤油的爭端

當大不列顛對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是常常轉變的時候，美國的政策却是確定在一個原則上——不承認原則。大不列顛與蘇俄間的破裂，似乎是有利於美國的態度，不過美國財政界對於此一問題却從另一的觀點上去檢討的，他們看出須與蘇俄恢復邦交之理由，美蘇兩國間不斷的商業發展，是使美國態度利於轉變，如美國一九一七年的對俄貿易，可得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譜，較戰前總額多出一倍（註一）。

一九二七年秋間，英法兩國爲了蘇維埃煤油的商業利益起了尖銳化的衝突，即美國利益方面自己也發生內部分化。一九二七年七月，紐約美孚油公司與凡甘姆油公司（Vacuum Oil Company）爲了購買火油，遂與蘇維埃蘭甫柴大工團（Soviet Naphta Syndicate）締結合同，但紐結賽（New Jersey）美孚油公司反對這種處理，堅持當蘇維埃政府未談到共產理想以前，先須對以前那財產權利被剝奪的財主予以賠償；皇家荷蘭仙爾公司商人的頭腦提

（註一）一九一三年總額爲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亨亭 (Sir Henry Deterding) 也根據同樣的理由極力反對，蘇維埃代表說：紐結賽美孚油公司與皇家荷蘭仙爾公司都想同時取得俄國煤油出口的獨佔，因此蘇維埃政府不能同意予這些行家以獨佔的特權，提亨亭的答覆，承認他曾與蘇維埃談判過，不過同時他又重申道：他常常要求蘇維埃須對以前財主予以賠償。蘇維埃彼得冷托辣斯 (Soviet Petroleum Trust) 與英荷商人曾在一九二九年二月確曾訂過合同。蘇維埃的煤油於是釐定低價，以便皇家荷蘭仙爾公司方面可作解決以前財主要求的款項。

第十節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間共產黨中的反對派

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征服了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中的反對派（註一）後，並不就算完事，反對派仍想用種種的策略，藉以伸長他們在黨中的勢力，一九二六年在自己的委員會中及秘密的印鑄局中建立起自己的組織，一九二六年九月至十月初，反對派領袖們欲驅策勞工集團加入他們那方面，在列寧格勒與莫斯科許多大黨派工人面前，表現他們共同對中央委員

（註一） 參看本章第二節。

會的反抗，但努力的結果是不利於反對派的，因為工人都效忠於中央委員會，後來反對派領袖們覺悟他們的失敗，因於十月十六日呈請中央委員會自願停止黨內的鬥爭與加入黨內大多數方面工作；但斯達林並不預備接受那個請求，不過視爲一種真心的反悔而已。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與十一月所開的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中，把反對派攻擊得體無完膚，他指斥反對派的許多罪狀道：（一）反對派領袖們想引誘共產國際跟着革命冒險者的道路跑；（二）他們提議把苛稅的重担放在農民的仔肩上，因此好激起農工間之不可避免的破裂；（三）他們的目的在要寬弛俄羅斯的獨裁政治；（四）他們想在黨中建立一種「民主統治制度」，以摧殘中央委員會的獨裁政治；斯達林的結論說：反對派領袖們想用純粹共產主義的原則，假做掩飾他們的意向，其實他們的政策，已被投機主義所滲透，乃傾向於中產階級統治制度之恢復。斯達林的見解卒被共產黨會議所採納，中央委員會所同意。

共產黨內部的講和總不能持久的，迨一九二七年夏間，黨中大多數與反對派的關係又十分惡感緊張，斯達林決計要懲辦那反對派的領袖們，他指出黨中的分裂乃由托洛斯基與齊諾維夫那兩個最活動的領袖所造成，故卽於共產黨大會未舉行前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將他倆正式

開除黨籍了。

第九章 戰鬥共產主義之復興

第一節 全聯邦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舉行全聯邦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這次大會是極重要的，不但事關黨中的內部發展方面，抑且事關蘇維埃政府之於整個的俄羅斯。大會之召集，表明中央委員會已戰勝了反對派，最大多數的代表都是中央委員會的信徒，這時反對派的領袖已付闕如，托洛斯基已被共產黨所開除了，即許多勞工組織的代表大會中，也發表反抗反對派的演說詞。

中央委員會提議欲把反對派領袖們逐出黨外，委員會派一特別黨員研究此一問題，他報告說：「國中一切反動份子，在開始集中歸從反對派領袖們，如引報告書中的原文有云：『反對派領袖們已變做普魯列塔利亞獨裁政治的公開仇敵』。至十二月十八日，所有反對派領袖們盡被共黨所開除（註一），於是他們的政治生命就此告終。」

在種種進展上看來：第十五次大會並不如最初時那幾個專門觀察家所見：是代表向右轉的鐘擺，而實是向左轉的鐘擺。在經濟的觀點上看來：大會致全力注意那工業問題，需使俄羅斯迅速「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包括在黨的政綱中；至於農業，我們已看到在先前一九二五年所開的大會中（註二），曾實施過有利於農業經濟的許多策略，第十五次大會則

（註一）一九二八年一月末，托洛斯基被放逐到土耳其斯坦、阿剌木圖城（Alma-Ata）。一九二九年托氏又從俄國被逐至土耳其，其時加米尼夫與齊諾維夫欲請求中央委員會赦免，表示願意放棄他們的反對，因是他們才免被正式放逐，惟指定住在一定地方，不得在中部俄國省城裏處於曖昧不明的地位，迨一九二八年末，他們始被共產黨召回。

（註二）參看以上第八章第二節。

從經濟的觀點上看來：認識這種策略的價值所在，說是他們自採用墾種土地的區域後，已裨益不少；不過同時大會說：這種為蘇維埃而設的政策，其實行結果，是極不利於政治方面的，得使富農階級逐漸發展，因此之故，此次大會決計廢除以前對於農民的政策，故第十五次大會的決議，申述對富農階級有重新進攻之必要，且須使農業經濟大為改變，藉以符合社會主義的方式而後可。

凡農民特免百分之三十五的錢糧一案，則由大會所認可，這種特免是極有利於貧農階級的，此外大會所同意的策略，如關於農業合作運動、集合墾種荒地的進展以及大規模國有田產的擴張等等。

第二節 軍縮問題

對於外交政策呢？第十五次大會重申以前的外交路線，莫斯科進與布爾喬亞國家締結和平的關係，但同時仍預備與資本主義的世界孤單應戰。

第十五次大會議決：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須循着以下幾條基本的路線樹立它的外交政策，其一、實施國際和平的政策，爲此勢必與帝國主義的戰爭之危險相鬥法，此一國際和平政策，同時就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爲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條件；其二、用種種方法來加緊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工人與西歐各國工人以及與被壓迫國家的勞工羣衆間之弟兄的聯合；其三、繼續與資本主義國家謀經濟關係之有組織的發展，庶幾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可以獲得經濟的獨立。其四、不斷增備捍衛國家的工具，尤其是工農陸軍與工農海軍的軍力與戰鬥力；其五、積聚必需的經濟餘物，如米穀、物品、貨幣以及特殊的捍衛器具。

此一決議案的第一點，須注視一九二七年秋間蘇俄向國聯所提的軍縮提議。

一九二七年以前幾年，蘇維埃外交是伴作不理國際聯盟的，因爲共產黨以爲它只是一個國際資本主義的代理機關，隨後於一九二六年二月，蘇維埃政府亦被邀出席日內瓦的軍縮會議，蘇維埃政府却毅然拒絕之，藉口自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蘇維埃公使伏洛夫斯基（Vorovsky），在瑞士國境被刺後，已與瑞士政府斷絕關係，故未便至日內瓦，但以後蘇維埃政府却改變了態度。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宣稱將參加軍縮會議，且據蘇維埃總理雷可夫所說：

蘇維埃聯邦也同時準備爲整個的世界提出擁護及實行最完善的軍縮方案」。蘇維埃所送交會議的草案，主張立刻將常備軍力遣散一半，同時須毀滅武器與軍械，又停止陸海軍器的製造。遣散與毀滅的進行限定四年，最後所剩餘的軍力，只要夠保安及捍衛疆土之用好了，各國海軍即須撤廢，另組國際海警，關於監視實行軍縮協定事，責成一個永久國際委員會辦理，此一組織須基於平等的原則，由各國勞動階級參加組成之。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蘇維埃代表李維諾夫 (Litvinov) 用極長的演詞說明蘇維埃的提案，德士代表頗表贊同，但英國代表克興登 (Lord Cushendun) 則堅決反對，他演說道：「世界上有兩種戰爭，因有二種戰爭，才有兩種和平。兩種戰爭是什麼呢？國際戰與國內戰，而尤以後者爲最可怕。我們試問蘇維埃政府對於國內是否如同對於國際戰一樣地堅決反對？殆爲問題……過去幾年，那蘇維埃世界政策的整個基礎，乃欲在各國產生武力的作戰，即所謂內戰，由此蘇維埃始能實施他們的勢力。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末在我們尚未得到蘇維埃關於此事的任何担保以前，應該完全改變政策才好，我們還應當請問蘇維埃現任是否決計不干涉別國的事務？」美國代表吉卜生 (Hutch S. Gibson) 也不贊成蘇維埃的提案，但同時却

說明美國政府附議締結一個多方面的公約，互斥戰爭可作為國家政策之工具。

第三節 凱洛克公約與蘇維埃以及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情形

蘇維埃提案在日內瓦會議中否決了後，世界上都以美國代表團所表示的意見，作為以後國際外交步驟的起點。一九二八年八月廿七日非戰公約卒由十五國代表（包括英國自治殖民地）簽訂於巴黎，蘇俄既未被邀參加首先的簽字國家中，而以後美國請求簽字的各國名單中，也竟無蘇俄，因為美俄兩國早已斷絕外交關係，故美政府未能照會蘇維埃聯邦政府，卒由法國為居間者，正式照會蘇維埃政府請求加入非戰公約。

一九二八年八月卅一日蘇維埃政府表示願意接受非戰公約，但至於加入簽字一節，態度依然曖昧不明，蘇維埃政府的領袖們反而攻擊那公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詭計，只在欺騙欺騙勞工羣衆而已。

蘇維埃領袖們對於軍縮問題的真正意見，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與八月廿八日莫斯科所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中顯露出來，此一大會斷定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國家在準備

一個新的世界大戰，殆無疑義，大會即討論勞工羣衆爲避免那個也許迫在眉睫的戰爭起見，應取何法術。

按照大會的決議，全世界勞動者的任務有三種：其一、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魯列塔利亞應與其自己的政府相鬥爭；其二、全世界的普魯列塔利亞應保衛蘇維埃聯邦，共同反抗其仇敵帝國主義；其三、普魯列塔利亞應助長列強殖民地的革命運動。

爲要實行以上任務中的第一種，各國的普魯列塔利亞應立刻建設一個工人「細胞」(cells)的秘密組織，尤其在那種製造軍械的工人方面。如戰事爆發時，此一組織應用強烈的宣傳方法，促進採取一種「戰敗者」的政策，將各國帝國主義的戰爭變做一個各國普魯列塔利亞反抗中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大會對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實施一個特別的議決案，按照此一議決案，共產國際的緊急任務即應樹立起來，又須謀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上的共產黨的發展。

大會特別注意美國與拉丁亞美利加的關係，且以爲是十分緊張的。因爲恐怕北美帝國主義達到南方的拉丁各國，所以議決案中之特別一節，要健全拉丁亞美利加的共產黨，使其併

成一個統一的組織，得與美國的普魯列塔利亞謀活躍的合作。

除關於殖民地問題的議決案以外，還注重對黑人施以共產主義的宣傳，尤其是美國的黑人，議決案中有一節責成共產黨徒須向黑人中的工農們說明共產黨是能解決黑人問題和從白人資本主義的「野蠻的束縛」中，使黑人獲得解放的唯一的黨。

第四節 一九二九年之中俄衝突

一九二九年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外交上的最重要的發展是要管理中東路而與中國所發生的衝突及與英國欲謀新的外交關係。

我們已在上面看到（註一），一九二四年蘇維埃政府曾與滿洲督軍張作霖爲了聯合管理中東路，結一協定，可是此一協定如要發生效力是很困難的，蓋蘇維埃政府與張作霖間的關係，實太錯綜複雜，一九二八年張逝世後，情勢仍未進步，其子張學良承乏父權，對付布黨比他父親也並不如何好感些，中國當局——南京政府與張學良——都懷疑蘇維埃政府要想趁最

（註一）參看以上第七章第五節。

有利的機會來干涉中國的事務。

有人說：蘇維埃政府曾予馮玉祥以財政上的接濟，那時馮正欲謀叛南京政府，中國當局因於一九二九年五月廿七日入哈爾濱蘇維埃領事館搜查，但結果並未搜得關於馮的文件，只得着其它許多文件，乃是蘇維埃代理人在滿洲宣傳共產的鈔證，這種宣傳是破壞一九二四年的協定，中國當局遂於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在哈爾濱捕獲一百多名蘇維埃的公務人員，就有中東路的總經理，把許多人一律逐回蘇俄，而在滿洲一切蘇維埃工會的組織，也都無形停頓，於是中東路即完全操在中國人的手中了。

沒有幾天後，中蘇的外交關係就此破裂，戰爭的恐怖已很明顯了，國際外交界用盡種種的方法想避免戰事。國聯根據盟約第十一條，也有正式權利顧慮這個問題，因為雖然蘇俄不是國聯會員國，但中國究竟是會員國之一，從實際觀點上看來：很難希望國聯的干涉有實際的成效，於是換一個方法，訴諸非戰公約簽字國，因蘇俄與中國都會簽字於巴黎的凱洛克公約，在這種環境之下，美國務卿史汀生(Stimson)覺得他所能預聞此次衝突者，不過請蘇俄政府與中國注意那訂在凱洛克公約中之道德上的義務，因為俄美並未恢復外交關係，故由法國

外交部長白里安 (Briand) 爲史汀生與蘇俄政府居間人，英法都贊同史氏的宣言，結果蘇維埃與中國兩政府的答覆，都說已覺悟他們的義務，不再開戰。可是滿洲的危機仍留着沒有解決，蘇維埃政府則宣稱除非中國同意交還所捕的蘇維埃公務人員，才願開始談判。

其實雙方都在積極備戰，這種不安定的情勢，直延長幾個月之久，時時在交界上發生小衝突，蘇維埃藉口因爲住在滿洲的逃避的白俄新兵在俄國內戰時，都加入了中國方面；有人料到蘇維埃政府在最初衝突時，很想借助於中國的內爭，因此不急於開戰，但同時蘇維埃政府却集合西伯利亞的軍力，組成所謂特別遠東軍。

蘇維埃政府估算中國行將發生內爭，不久真的證實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南京政府征討反動軍隊，馮玉祥與國民黨中的極左翼相接合，爲後者之中堅，但是中國內部雖然如此紛擾，南京政府與滿洲軍事長官終未答應蘇維埃的要求。

到了十一月十七日，蘇維埃軍隊便冒天下之大不韙，從東部與西部的邊疆上沿中東路進攻滿洲，中國守衛兵奉命退却，因使蘇軍佔據海蘭泡，向哈爾濱進發。張學良遂不得不於十一月廿七日滿足俄國的要求，十二月三日蘇維埃政府與中國雙方簽訂草約。

同時有把此事置於國際的基礎上之舉，史汀生於十一月廿八日照會英法德日等國，提議用聯合外交的干涉方法，以維護凱洛克公約及制止戰爭，各政府交換意見後，史汀生即發致中俄照會兩通（致俄照會由法轉交），簽字於凱洛克公約的五十三國中的十四國，都擁護史汀生的通牒。

蘇維埃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即於十二月三日用抗議書駁斥史汀生的干涉，他聲辯道：蘇俄之取軍事行動，其目的爲了自衛。當史汀生的通牒發出的當兒，正兩國開始和平談判之時，在蘇俄的印象看來：史汀生想在談判中沾點光，那不能視爲一種友好的舉動。

以後史汀生便再沒有話說，中俄事件總算暫時告一段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廿二日蘇維埃政府與瀋陽當局連續開會，結果簽訂協定，恢復會議以前中東路的狀態。

第五節 英蘇恢復邦交

一九二九年春間英國初選，工黨重復執政，於是又攷慮英蘇復交的問題，蓋兩國還自一九二七年所絕交的（註一）。

因英國首相麥唐納不能為衆議院中的大多數所信服，所以他對復交問題，加以審慎，正和對付其它許多英國政治的難題一樣。

道一九二九年七月，英蘇兩國間又有信使往還，英國政府希望除復交後，須同時討論俄羅斯欠英國的債務及蘇維埃政府担保制止反英宣傳等問題；但蘇維埃政府却堅持復交中的專門問題須留待單獨磋商，初次談判不能涉及關於特別問題的條件。

英外相漢德森(Henderson)與蘇維埃駐巴黎大使杜甫格萊甫斯基(Dovgalevsky)曾作試驗的會晤，但毫無結果，因為彼此都不願答應條件，至九月末及十月一日，兩人會再度晤談，始得簽訂一個協定，漢德森正式讓步，允許兩國須先恢復邦交及交換大使，以後再討論其它問題，漢氏又非正式地獲得杜氏關於蘇維埃政府準備給予制止宣傳的担保。此一協定卒由英國議會所批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英國衆議院辯論英國問題，漢德森宣稱：他相信蘇維埃政府所謂不再宣傳，也包括共產國際的行動。保守黨反對與蘇維埃政府簽訂任何協定，不過衆院中大多數

(註四) 參看以上第八章第八節。

人却都投贊成票，貴族院則否決之，但並不影響事件的進行。

蘇維埃政府委派蘇維埃彼得冷托辣斯主席余可尼可夫 (Sokolnikov) 至倫敦，余氏的真名是白黎蓮 (Brilliant)，在革命前是個共產主義者，曾有一時屬於托洛斯基所主領的反對派，不過事後他是否認的，他從一個彼得冷托辣斯主席的資格，於一九二九年二月與英吉利煤油商人訂立合同 (註一)。又於同年十二月廿日將憑證呈獻給威爾斯太子 (其時國王害病，由太子代理)，同日他訪晤漢德森，兩人交換正式的担保，雙方政府各應自行約束反對彼此的動亂。

但不到兩個星期後，突然起了蘇維埃政府破壞義務的問題，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倫敦新共產黨報紙工人日報 (Daily Worker) 刊載一篇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對英國工人的宣言，說工黨政府是布爾喬亞的從僕，勸告英國工人準備從各幹部聯合大不列顛整個的勞工階級起來組織革命的勞工政府。漢德森向國會陳述關於蘇維埃政府共產國際行動應負責任問題的意見後，即送致余可尼可夫一封關於反對上述宣言的抗議書。

(註一) 參看以上第八章第九節。

第六節 一九二九年之美蘇關係

一九二九年蘇俄與美利堅的關係，並無顯著的變化，由於史汀生擬預聞中俄衝突與李維諾夫頑強的答覆（註一），兩國恐很難謀較密切的外交接近，有時蘇維埃政府試欲公然表示對美國的友好態度，例如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及翌年一月蘇俄幫忙找尋失蹤的美國飛機師愛爾遜（Erlson），又為許多參預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俄國內戰時的美國兵，設法替他們佈置住居與歸還家鄉，自密西根（Michigan）所調來補充的第三十三隊步兵中七十五人一行，一九二九年十月也由蘇維埃政府幫他們送上列寧格勒的輪船，回到祖家去。

對於俄羅斯工業化與五年計劃（註二），蘇維埃政府曾用盡心計，欲與美國擴張商業上的關係，如與許多美國行家訂立關於建築設備蘇俄工廠的契約，又聘請許多美國工程師為顧問，一九二九年美蘇間貿易的指數，達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之譜。

（註一） 參看本章第四節。

（註二） 參看本章第八節。

第七節 「可明探」(Komintern)的活動與蘇維埃政府的代理者

除了正式的外交行動以外，共產國際還領導着許多秘密外交，這在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膨脹的政策上占一大部分，共產黨採納了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的大會議決案後，遂開始在世界上的殖民地與主要資本主義的國家方面進行一個非常緊張而活動的綱領。

第六次大會指定八月一日爲一個特別的共產宣傳的紅日(Red Day)，故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那一天，在各國都確實出現大規模或小規模的共產黨起事，還有許多時候，共產黨在各國都按照共產國際一般的計劃而行動。

抑有進者。蘇維埃政府在國外外交與商業的代理機關常常就是共產國際個別代理人活動時之根基，自一九三〇年一月法國法院魚網部所審問山維立李維諾夫(Savelii Litvinov)爲外交委員長之弟)事件時，得到許多證據的口供，世人始注意上述的連鎖關係。

山維立李維諾夫是駐柏林蘇維埃商業局機關中的一員，他受共產國際之命，簽了許多期票，總額達二〇〇、〇〇〇兩，指撥商業局，這種期票由許多銀行大打折扣，實際只剩很少

數額，按照各種證據上所述，這筆款子是用在共產國際的宣傳方面的，但後來蘇維埃政府忽拒絕付款，因此便有人向法國法院控告山維立，說他沒有權力簽期票，其所有款子不遞交蘇維埃政府，全由他自己所侵沒了。不過法國法院却壓制了這個控告。

共產國際代理人與蘇維埃秘密警察（或G. P. U.）以及國外蘇維埃外交組織的關係，也可在駐巴黎俄大使館代辦白山陶甫斯基（Boedovsky）在法國報紙上所發表的一文中見之，白氏於一九二九年十月從俄大使館脫逃，蓋恐G. P. U.代理機關的抓捕，據白氏所說：逮捕他的原因，由於他與蘇維埃政府的不和，後者說他浪用政府的款子，這事件卒在莫斯科的蘇維埃法院中審理，被告缺席，判決白氏徒刑十年。同時蘇維埃政府執行一條法律，規定凡駐在國外的蘇維埃公務人員，如拒絕政府之召回，應處極刑，並沒收其財產。

第八節 五年計劃

全聯邦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宣佈工業化綱領，其形式即是所謂五年計劃（Five Year Plan），其期限自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起至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止，（蘇維埃財政年度乃自

十月一日起），這是一個蘇維埃政府之經濟活動的計劃。

五年計劃的鵠的，在增加俄國工業的生產，預算到第五年，工業制度不但能適應蘇維埃聯邦人口的需要，抑且可有贏餘輸出國外。

我們已在上述看到（註一）：蘇維埃工業至一九二八年已近乎達到戰前的標準了，有幾種事業，如農業機械的製造與電料用具的生產在那蘇維埃下的產量，且已顯然超過戰前的標準，但在它方面，還有幾種事業，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塊鐵的產量已比戰前低減了。

按照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所發表的節略，迨一九二七年，塊鐵的產量，祇有戰前產量百分之七十一，翌年仍無進步，於是蘇維埃的經濟學家於一九二八年秋間討論塊鐵產量的低減問題，可見五年計劃的目的之一，就在決計要免除這低減的現象。

鉄礦物的產量戰前有九、二一四、六〇〇米特噸，一九二八——二九年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有七、一〇〇、〇〇〇米特噸，一九三三年達一九、一〇〇、〇〇〇米特噸，據五年計劃所希望，其它許多工業也多少須發展到同樣的平均數。

（註一）參看第五章第六節。

五年計劃實行後第一年，煤的產量有四〇、六〇〇、〇〇〇米特噸，預計第五年須達到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米特噸，鋼鐵的產量要從四、八〇〇、〇〇〇米特噸增加到一〇、八四一、二〇〇米特噸，煤油的產量從八七、八〇〇、〇〇〇桶增加到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桶，電力的發生由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基羅米特點鐘增加到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基羅米特點鐘。

據五年計劃所預計，對於農業祇能少量地增加，如穀類的產額，第一年希望有七六、二五〇、〇〇〇米特噸，第五年祇增至九九、六六〇、〇〇〇米特噸。

工業與農業方面五年中投資的數額，預計六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約合三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包括建築頓河與基雷平斯克(Chelyabinsk)流域上的尼尼(Nizhni)、諾甫可羅特(Novgorod)、斯達林格勒(Stalingrad)、卡可甫(Kharkov)、羅斯多夫(Rostov)等地新的大工廠費用，以備製造汽車曳引機與農業機器。

按照五年計劃之開展工業，祇用一部分所必需的資本，但將來待生產至某一過程，生產當然能夠自給，換句話說：生產費減低而勞動生產量增加。五年計劃又增加捐稅，最要者在

加徵中產農民的稅收。最後，國外貿易的進出口須得到有利的平衡，以國內借款作為各種經費的來源。

第九節 五年計劃的第一年

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乃至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為止，照官報說：此一計劃不但已完全實現，且已過之無不及。政府公報說：那一年生產如與前一年相比較，已增加百分之二十三，換句話說：比計劃所預算的還多；蘇維埃新聞紙便據此說：五年計劃有修改的必要，以促進勞動的加速，許多人以為五年計劃只要四年就可完成，甚至於三年半也已足夠，可是不久便顯得分曉，有幾種重要的工業畢竟還沒有完成，例如煤的產量比原計劃少百分之五·八，塊鐵少百分之四·二；至於農業方面呢？原計劃料在第一年能擴張百分之七的墾種區域，但據正式的統計，公佈所擴張的區域，至多不過百分之四，且穀類的生產，實際上還一點也沒有增加，畜牧則非但沒有進步，抑且退步，計劃上希望增加百分之二·七的家畜，但實際反減少到百分之二·四。

縱然我們相信公報所說工業的生產大為增加，然而誰料生產越增加，物價也隨之騰貴。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全國經濟最高委員會主席團不得不報告全盤的工業情形，它說一九二八二九年出產的品質，已很顯著地在退步，有幾種製造的工業出產品品質比戰前低百分之三十、四十或甚至於五十。

在這種環境之下，可見所謂生產的增加，顯然只是一種空虛的估價，五年計劃第一年的結果，關於生產的實際價值，非但沒有什麼進步，抑且也許反而降低了。由此證明勞動生產力的確實增加，並不如公報之多，計劃上擬增加百分之十七，但實際祇百分之十四。

揆其所以失敗的另一癥結，在乎工業生產的製造成本並未減低，按照公報所說：生產的成本能減少百分之八，然而照工商報(Trade and Industry Gazette)所給我們的證據，說生產成本的所以會減低，不過機械地緊縮那維持出產品尋常品質的費用罷了。

工業與商業生產品的物價，都非常高漲，據全聯邦工會中央委員會的預算指數所說：一九二八年八月為二〇〇，但戰前祇一〇〇，迨一九二九年八月直達二三一，後於一九二八年——二九年，雖然工人的工資增加百分之八，但因購買力的關係，實際收入並未增加，按照

一九二九年工會理事會的統計，比去年竟降低至百分之九十七。

這樣看來：實際上五年計劃第一年，只見得蘇維埃國家經濟與財政的困難，所以政府不得不借助於發行紙幣，發行的數額顯然超過計劃中所定的限度，一九二七——二八年紙幣數甚至多至三四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照計劃一九二八——二九年，應再發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但事實上市面上流通的紙幣已達六七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足以破壞紙幣數額與保護金盧布的穩固的準備金之平衡，所以一九二四年的財政改革（註一），至此可說已傾覆殆盡了。

第十節 集合農場

五年計劃在農業的領域中，擬大大地增加所謂集體化的田區，換句話說：即蘇維埃農場（Sovkhoz）與集合農場（Kolkhoz）。迨一九二九年，集體化農業田區的生產，遠蘇維埃聯邦農業生產總額之百分之四及合為交易的生產百分之七——自從小農企業所生產的麥類祇

（註一） 參看第五章第四節。

供他們自己的消費而不爲出賣後，爲交易而生產的百分數即隨之增加。照五年計劃所說：一九三三年集體化田區的農業生產超過爲交易的生產總額百分之四十。

一九二九年秋間，蘇維埃領袖們開始討論農業生產有即速轉到集體的基礎上之必要，一九二八——二九年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已實施五十五區蘇維埃式的農場，這真是大量的企業，其總額達六、〇〇〇、〇〇〇以上英畝。一九二九——三〇年提議要將蘇維埃式的農場增加到一二〇區，總額須至一四、〇〇〇、〇〇〇英畝。

照蘇維埃政府的計劃，還想擴張集合農場，一九二八——二九年已有三〇、〇〇〇區的集合農場，一九二九年秋，提議要在一九三〇年增加到一〇〇、〇〇〇區，到了一九二九年，所已墾種的集合農場區域，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一九二九年秋，提議要增加到四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蘇維埃不但注意要增加集合農場的數目，且思有以擴充之。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決議要建設一片新的大集合農場，包括一、〇〇〇至五、〇〇〇區私人所有的土地，這樣一來，集合農場的性質便完全變了，一九二七年——二八年建設一種典型的集合農場，共合十二區的私有田。

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決議準備使俄羅斯的鄉村生活趨於極度的整個集體化，照新政策所說：這個新的包羅萬象的集體化須於一九三〇年秋或一九三一年春以前在倭爾加河下流和中流區域一帶以及北高加索完全實行起來，至於其它產穀的地方，遲至一九三一年秋或一九三二年春也須完全實行集體化了。

開發這種大的集合農場須借助於機械，如曳引機，收割聯合機等，所以在理論上總希望這樣的生產能力超出個別農民的企業，曳引機收割機的採辦，頗適宜於大規模企業的發展，至一九三〇年，俄將斯社會主義聯邦蘇埃維共和國中已有二五、〇〇〇架曳引機了，但因缺少完備的修理舖和有經驗的工匠，以致一半機器統是壞的，至於收割聯合機更壞，雖然提議要建造兩個大工廠，每年可製造二五、〇〇〇架收割機，實際上呢？直到一九三〇年才有這樣的機器。

所以在事實上是怎樣的呢？一九二九——三〇年有許多新集合農場，並沒有機械的設備，其所以然之故，可用農業經濟的觀點去證實這種企業組織，而在以後三年或四年中，也很難希望會有發展的。曳引機也很少數集合農場才能享受的，大多數還祇能用牛馬來耕種，換

句話說：還保持着傳統的農業方法。至於斯達林的新集體主義政策，也並無健全的專門原則，能像政治便利的動機那樣地生動引人。

第十一節 一九二九年之俄國勞工

蘇維埃如要轉到一個極左的共產政策，必為工人所阻難，尤其農民更不贊成，實施五年計劃在在需要勞工階級的助力，照計劃中所提議，須增加工資與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算是報酬工人的助力，但據我們所看到（註一）：五年計劃第一年因為購買力增加，實際工資就等於沒有增加；至於講到工人的生活標準，在住居區域看來：也並未有所改善，雖然新的房子已為工人蓋造起來了，但因為生產在逐漸增加，工人數目也隨之增加，所以房子總是不夠的。

- 一九二八——二九年指定每一個人所住的空間，從五·八方米特減至五·六方米特，迨至一九二九——三〇年，便連這點空間也得不到了。至於給養問題，工人家庭的生活狀況愈形艱難，因為在莫斯科及其他許多都市都實行一種紙券制度，以便分發給養物，但需時頗久

（註一）比較本章第八節所述。

、工人所得到的直接分配物，總比較都市居民的其他階級來得多。

工人的生活狀況既未改善，蘇維埃政府反變本加厲，需要更嚴酷的勞動，一九二九年九月起，改革蘇維埃工廠的管理，共產黨指導賦有經理經濟行政的無限權力，而禁止工廠委員會（工會的機關）干涉行政者的處理。

一九二九年秋間實行另一的計劃，要想增加工廠的生產物，採用不斷工作週制度，自以後，各種企業的工作，除了一年有五天休假外——五月中第一與第二個蘇維埃星期日，十一月七日八日兩天及一月廿二日，概無休息，每個工人工作五日得休息一日，實際上這種制度是極不宜於工人家庭的生活，因為同一家庭中，休息日常不在一天，以致很難有叙樂的機會。

工人們處於這樣難受的環境中，無怪他們常常恐懼發生怠工與陰謀家故意損壞廠中設備等事，以抗勞工階級。蘇維埃政府時時派「怠工專家」去查驗，因而煽動工人方面的猜忌，如一九二八年丹內次煤區礦工程師的怠工事件，或者乾脆地說：把有意嫌疑罪的人槍斃，又如一九二九年竟不經審問，將年老而有名的俄國鐵路工程師梅克(Von Meck)處以極刑。

第十二節 一九二九年之俄國農民

斯達林的政策，依然使農民忍受極重的負擔，他的口號是「進攻富農」(Победим)，實際上從一九二八年起而尤其在一九二九年那一年，除了貧農以外，都拒付各種稅收，據一九二九——三〇年所指定農業稅的全部稅額，一九三〇年一月命令向穀類或現錢方面徵取，且指定財政委員會的代理機關從事向農村方面或用任何方法分配第三項「工業化借款」的事務，至於以前國內借款已幾乎獨向縣城方面所徵(註一)，並命共產黨青年團同盟隊人員與貧農的許多活動組織，幫助財政代理機關，實際上向農民勒索的新稅是用強迫攤派借款的形式做去，而且農民如仍欲揮霍金錢者，須把錢存在政府的儲蓄銀行裏，將來取出，要經過不少的手續，非常麻煩。

審察一九二九年的捐稅與徵收情形，發見中產農場企業的實際凋疲，在這種環境之下，

(註一) 迨一九三〇年，發行三種「工業化借款」，照聯合報 (Associated Press) 所報告，其總數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或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無論那個農民如有兩頭或三頭牛的，常常自己殺掉一頭，因為否則便要視為富農之列，這種情形幾乎回復到一九一八年濟窮委員會的時代了。由於農村的艱難，致使許多外來的拓殖者不得不跑出俄國國境，這般人還是十八世紀或十九世紀所搬來的。例如一九二九年有許多瑞士人與一部分德意志的少數民族相率離俄。

斯達林的政策，在每個農村中都激起確實的內爭，有時富農與中農攻打或殺戮蘇維埃政府的代理人，或放火燒去蘇維埃農場與集合農場、蘇維埃政府也報以一個殘忍的恐怖，將農村中一切煽動不滿意政府者，無論是出名的或嫌疑的，一律槍殺，如一九二九年秋間所處決的富農，竟達上百個人之多。

一九三〇年一月決計要消滅整個的富農階級，首先取消以前的農村蘇維埃，重設以貧農所組成的新農村蘇維埃，凡富農的房屋都給傭工或無家的農民去住，一切財產與畜牧都歸集合農場的企業，同時並禁止富農參加作集合企業中的一員，迫使他們在大規模公共事業中工作，如作伐木者的苦役，其餘農民則使其參加集合企業，這種方法旨在使適當的穀類供給物，集中在蘇維埃政府的手中，自此便不用再恐懼富農方面的阻難或反對的了。

第十三節 新經濟政策的終了

一九二九年秋間蘇維埃大會製成新的預算，總數爲一一、六二一、一〇〇、〇〇〇元，擴充工業之財務上的需要與使農業集合化兩項，占預算中的極大數額，欲完成五年計劃的第二年，比第一年更要來得困難，一九二九——三〇年的估計表，可知生產已幾乎發展到百分之廿九，但一九二九年十月至十一月是五年計劃第二年的初期，工業方面顯見落後，不能達到計劃上的程度，一九三〇年一月蘇維埃報紙在討論着要嚴厲地「衝破」那各種的經濟路綫。

五年計劃第二年的初期，丹內次煤區祇完成原計劃百分之九十四，這意思就是說：蘇維埃工業在此流域上祇得到五〇〇、〇〇〇噸的煤，在烏拉爾地方所鑄解的塊鐵祇做到原計劃百分之九十，至在「尤加斯塔爾」(Yugoslav)工廠或南俄鋼鐵托辣斯所鑄解者也祇百分之九十二。一九二九年十月列寧格勒許多工廠所出產貨物的價值，達一七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或約八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但至同年十一月，祇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盧

布，或約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般的重工業，每人所攤分的額數降低到百分之四，有幾個工廠則計劃與實際相差竟有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以上，北俄的木業比原計劃減少百分之廿五強，其影響國外貿易甚大，因為木材和煤油是蘇維埃的大宗出口物。不但此也，且自農村經濟活動紛亂後與富農階級消滅後，如欲希望稅收昌旺，非常不易，以致後來紙幣的再度發行，實是不可避免的事。

凡此種種，顯出一九三〇年初，五年計劃在所謂新經濟政策的限度中，如再要有所施展，是不可能的了。

在當前蘇維埃經濟策略方面，顯然有兩條路線好做：其一，再度施行新經濟政策，但須把五年計劃廢止；其二，完全離開新經濟政策，返到純粹的共產主義時代。

一九二九年共產黨中起了幾個波動，所謂左翼反對派代表——如雷可夫布哈林與弗路金（Frunkin）——主張走第一條路；但斯達林是要循着純粹共產主義的路走去，他於一九二九年末居然把反對派克服，後者恐被黨所放逐，祇得自悔他們的路途是錯誤的。

於是蘇維埃經濟方法立刻返到「戰時共產主義」的時代了。

復用紙券制度控制消費，重新實現義務的勞動，起初行於製造物裝卸工作方面。組織工人與共產黨青年團份子的「恐嚇隊」(“Shock battalions”)，散佈在蘇維埃經濟路綫上，凡發生困難的地方，指派特別工人與紅軍幫助實行農田改革。在農業動作方面起來一個新的革命，要求穀類須歸政府存儲，不借助於任何貿易的過程，在這種情形之下，商業當然又是需要的了，各種生產物都變做自行交易，用懲罰檢查和逮捕的手段，消滅私營商人，一九三〇年初更使私營交易變做不可能的事，蘇維埃財政專家又重新像一九一八——二一年時代討論逐漸取締貨幣的必要。

一九三〇年開頭，新經濟政策說是已經完全廢止的了，一種新的戰鬥共產主義 (Military Communism) 的試驗在開始着，請拭目以觀其後罷！

(全書完)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俄復交後在南京譯竣。

參考書目(照原書擇要節錄)

I. 一般的

J. D. DUFF, editor, *Russian Realities and Probl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7).

V. D. KLUCHE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Translated by Hogarth. 4 vols. (London: J. M. Dent & Sons;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11-26).

- A. LEROY-BEAULIEU, *The Empire of the Tsars*. 3 vol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63 - 96).
- G. K. LOUKOMSKI. *La vie et les mœurs en Russie* (Paris: Leroux, 1928).
- T. G. MASRYK, *The Spirit of Russi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15).
- PRINCE D. S. MIRSKY,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 Benn, 1927).
- B. PARES, *A History of Russia* (2d ed. 1928;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6).
- S. F. PLATONOV, *Histoire de la Russie des rignes a 1918* (Paris: Payot, 1929).
- S. F. PLATONOV, *History of Russia*. Translated by E. Aronsberg; editd by F. A. Gold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5).
- M. N. POBKROVSKY,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8-). (In state of publication).

J. SPARGO, *Russia as an American Proble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1920).

D. M. Wallace, *Russia* (London, 1912; New York, Cassel & Co.,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H. W. WILLIAMS, *Russia of the Russians*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14).

ii 附記

(一) 法律與制度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the Russian Empire (May 6, 1906). Vol. II, "Modern Constitutions" by W. F. Dod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ndon: Fisher Unwin, 1909, pp. 181-195).

M. M. KOVALEVSKI, *Russi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hicago, 1902).

(11) 國概

J. KULISCHER, *Russ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Jena: Gustav Fischer, 1925).

J. WAVO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 2 vols. (2d ed., 1925; London and Toronto, 1914).

(12) 外交關係

R. N. Bain, *Slavonic Europ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oland and Russia from 1447 to 1796* (Cambridge Historical Series, 1908).

S. HSU, *China and Her Political Entity: a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Reference to Korea, Manchuria and Mongol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BARON S. A. KORFF, *Russia's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Last Half Centu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W. L. Langer, *The Franco-Russian Alliance, 1890-190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G. MICHON, The France-Russian Allian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629).

C. WALTER YOU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anchuri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W. W. 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2 vol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827.)

(四) 民族與國家問題

R. BUTLER, The New Eastern Europe (London: Longman, Green & Co., 1919).

S. M. DUBNOW,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3 vols.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16—20).

S. RUDNITSKY, Ukraine: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New York: Ukrainian Alliance of America, 1918).

JOHN F. BADDELEY,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08).

P. H. CLYDE,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in Manchuria, 1689—1922* (2d revised., 1928: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26).

G. N. CURZON, *Russia in Central Asia in 1889 and the Anglo Russian Question* (2d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889).

F. A. GOLDDER, *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641—1850* (Cleveland: The A. H. Clare Company, 1914).

A. KRAUSSE, *Russia in Asia. 1558—1899* (London: Grant Richards;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1899).

L. PASVOLSKY, *Russia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A. VAMBERRY, *Central Asia and the Anglo-Russian Frontier Question*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74).

G. F. WRIGHT, *Asiatic Russia*. 2 vols. (New York: McClure, Phillips and Co., 1912.)

III 戰爭與革命(一九一四——一九二〇)

(一)一般的與傳記

G. BUCHANAN, *My Mission to Russia* (Boston, 1923).

R. FULOP-MILLER, *Rasputin*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28).

F. A.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1914—17*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Century Co., 1927). Very Valuable symposium.

Gen. B. GOURKO, *Memories and Impressions of War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4—17* (London: Murray, 1918).

J. HANBURY-WILLIAMS, *The Emperor Nicholas II as I knew him* (London:

Humphreys, 1922).

A. SAVINSKY, *Recollections of a Russian Diplomat* (London: Hutchinson, 1928).

(11) 單張大譯

ALEXIS N. ANTSIFEROV, *Russia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War*.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0).

NICHOLAS J. ASTROV and PAUL P. GRONSKY, *The War an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the All-Russian Union of Towns*.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9).

M. T. FLORINSKY, "The Russian Mobilization of 1914," reprinted from th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XIII, No. 2, June, 1927.

- G. P. GOOCH, *Recent Revelations of European Diplomacy*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927).
- STEPHEN GRAHAM, *Russia and the World Wa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15).
- BARON BORIS E. NOLDE, *Russian in the Economic War*.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9).
- P. RENOUVIN, *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War, 28th June-4th August, 1914*, translated by T. C. Hume with a preface by Charles Seymou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8).
- J. B. SCOTT, *'The Russian Orange Book'* Diplomatic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pean War (New York, 1916).
- S. O. ZAGORSKY, *State Control of Industry in Russia during the war*.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9).

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8).

(三) 俄國革命

A. BILLARD, *Russian Pendulum: Autocracy, Democracy, Bolshevi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19).

C. K. CUNNING and W. W. PETTIT,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March, 1917-March, 1920. Documents and Pape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Howe, 1920).

A. KERENSKY, *The Prelude to Bolshevism: the Kornilov Rebellion* (London: Fisher Unwin, 1919).

J. MAVO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28).

S. OLDENBOURG, *Le Coup d'etat bolcheviste 20 Octobre—3 Decembre 1917* Recueil de documents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 Serge Oldenbourg (Paris:

Payot, 1929).

A. PETRUNKEVITCH, S. N. Harper, and F. A. Gold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 A. FOSS, *The Russian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1).

L. TROTSKY,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Brest-Litovsk* (London: Allen & Unwin, 1919). A pamphlet.

E. A. WALSH, *The Fall of the Russian Empire*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28).

(四) 經濟史略

GENERAL FOUKOMSKY, *Memoi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Fisher. Unwin, 1922).

IV. 蘇俄

(一) 一般的

W. R. BATSSELL, *Soviet Rule in Russia*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W. H. CHAMBERLIN, *Soviet Russia: A Living Record and a Histor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30).

E. J. DILLON, *Russia To-Day and Yesterday*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1930).

A. KARLGREEN, *Bolshevist Russia* (London: Allen & Unwin, 1927).

L. LAWT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6* (London: Macmillan & Co., 1927).

S. P. MELGUNOV, *The Red Terror in Russia* (London and Toronto: J.M. Dent & Sons, 1926).

P. MILIUKOV, Bolshevism: an International Danger (London: Allen & Unwin, 1920).

P. MILIUKOV, Russia Today and Tomorrow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22).

(11) 各家論著

A. L. P. DENNIS,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Soviet Russia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24).

MALBONE W. GRAHAM, Jr., "A Decade of Sino-Rassian Diplo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XXII, 1928).

V. A. MICHELLE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 Vol. IV No. 25 and 26, February 20 and March 6, 1929).

G. S. MOYER,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the Recognition of Soviet

Rus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26).

H. K. NORTON, *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of Siberia* (London: Allen & Unwin, 1923).

A. PALMIERI, *La Politica Asiatica dei Bolscevichi, I* (Biblioteca di Politica, N7, Bologna, 1924).

H. PARLETT, *Diplomatic Events in Manchu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F. L. SCHUMAN,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Russia since 1917*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8).

The Soviet Union and Peac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 Barbusse (London: M. Lawrence Limited, 1930).

K. S. WEIGH, *Russo-Chinese Diplomacy* (Shanghai,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8).

(11) 参考圖終

- S. BRON.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merican Business (New York: Horace Liveright, 1930).
- M. DOBB,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vol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28).
- HWANG JEN, Le Régime des Concessions en Russie Soviétique (Paris: Librairie Gamber, 1929).
- G. M. PRICE, Labor Protection in Soviet Russi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7).
- S. N. PRŌKOPOVITCH,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Soviet Russia (London: King, 1924).
- L. N. YUBOVSKY, Currency Problems and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Parsons, 1925).

希特勒與新德意志

蔣學楷編

德國是世界政治的鎖鑰，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要衝。它可以左右全世界的政局。戰後一切和平條約，安全保障，賠款問題，軍縮會議和統濟恐慌都導源於德國。過了四年的戰爭生活和十四年的和平生活，德國產生了一個希特勒。但是希特勒研究是誰？他的立場是什麼？他能否拯救德意志於共產資本兩種主義之中？這些問題就是本書所要解答的要旨。編者帶着諷刺的態度，用文學的筆調，描寫希特勒如何做木匠，如何做小兵，如何加入一個僅有黨員六人的政黨，而用美國式的廣告方法變為一百五十萬人的大黨。書中所採材料直至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止，其新穎為國內各出版物所罕見。可作政治教本讀，可作政治活動指南讀，更可作為文學作品讀。

三二開 一二三〇頁 —— 實價六角

黎明書局

非戰和平與世界公約

徐景薇著

著者有鑒於東北事變發生後，國際公約，失其功效，世界和平，岌岌可危，爰本其平日研究所得，著爲是書。全書共五萬餘言，於非戰公約之前因後果，加以系統的說明。關於非戰公約對於中日事件之關係，及此項公約能否消弭戰事，維持和平，尤有明確之批評。書末並附非戰公約全文（中英文齊備），美國史汀生關於非戰公約之演說詞，以及著者對於史氏演說之批評。凡欲知非戰公約之原委者，不可不讀，凡欲明瞭美國之遠東政策者，尤應人手一編。

實價九角

總代售處：上海黎明書局

外交評論社叢書之一

LASKY'S
GRAMMAR
OF
POLITICS

孫寒冰主編
現代政治思想小叢書之一
政治學典範要義

杭立武著

(附)蕭公權：拉氏思想
之背景 杭立武；
讀前文後

本書為當代政治學界權威英國拉思基氏政治學典範之概述。氏為近代政治思想上一元論批評者之重鎮，本書尤為其十載研究之晶結，公認為近十年來政治學第一

一部書。如美國義禮奧 (W. F. Elliott) 謂氏之此作，能將政治學之原理，以實驗主義之語詞，翻新解述，實近紀政治思想羣著中之惟一名著。華爾得 (P. W. Ward) 亦謂本書關於思想之析解，可稱登峯造極，關於實際之策畫，復類無限寶藏。是本書之重要，不難想見。唯全書原文卷帙浩繁，閱讀為難。今杭立武教授數萬言介紹之，而失原文精義，尤屬難能可貴。末附政治學家蕭公權教授拉思基思想之背景，及杭立武教授讀拉思基思想之背景後二文，闡隱抉微，有助於理解拉氏之學說尤多。

——三二開 一五〇頁——
▼實價四角▲

黎明書局版

外 交 評 論

二期一卷二

日內瓦之英國外交	吳頌皋
法蘭西與戰債問題	徐公庸
中俄復交與互不侵犯條約	心 白
日美關係之過去與現在	高宗武
法俄互不侵犯條約論	羅 晉
英自治殖民地之帝國外交上之地位哲學	宗 君
日人論日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陶 樹
公理與強權之應爭	貫 一
國聯調解之僵化	陶 樹

二期一卷二

東北事件之前途	同鯨生
羅斯福宣言的意義	徐公庸
論日外相內田之演詞	高宗武
中俄復交後我國應有之準備	完 初
德意志與中日兩國之外交關係	晉 齋
外交新慣例	熊應祚
過去一年的德國政局	高翼雲
英國之立場及其態度	邱辛白
日人論美國民主黨之對日政策	宗 君
美國民主黨政府之外交問題	辰 侯

三期三卷二

評十九國委員會報告書	吳頌皋
報告書之效力問題	徐公庸
中日關稅協定之真相	于能模
希脫勒內閣之前途	徐晉齋
戰債問題的檢討	袁醒吾
東北事變後之日本財政	劉百閑
拉斯基教授目光中之羅斯福	貫 一
武裝和平下之軍縮會議	陶 樹
國聯十九國委員報告書全文	編 者

期四卷二

憲法上之外交權	樓桐孫
日本退出國聯以後	湯 中
太平洋委託治理地問題	徐公庸
歐洲現勢之鳥瞰	袁醒吾
世界經濟會議與中國	壽勉成
設立不駐兵區域問題	王德輝
美國太平洋政策的兩個動向	潘楚基
德意志之軍備現狀	安 毅
羅斯福與美國金融風潮	陶 樹

——零售四角預定國內全年四元半年二元二角——

◁ 外 交 評 論 社 主 編 …… 黎 明 書 局 發 行 ▷

(一) 書新版出局書明黎

◀ 類濟經治政會社 ▶

- | | | | |
|-----------------|-----------------|----------------|------------------|
| 社會科學大綱(三版)..... | 孫寒冰著編.....(三元) | 近代歐洲經濟史..... | 孫寒冰合譯.....(一元六角) |
| 中國古代社會..... | 岑紀譯.....(一元六角) | 近代經濟思想史..... | 朱通九等著.....(一元六角) |
| 農村社會學大綱..... | 馮和法著.....(二元二角) | 價值學說史..... | 林一新合譯.....(一元八角) |
|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 | 馮和法著.....(一元八角) | 關巴衛克的經濟學說..... | 鄭學稼著.....(一元八角) |
| 文化與文明..... | 葉法無著.....(四角五分) | 價值論概要..... | 鄭宗儒等譯.....(三角) |
| 人口問題研究..... | 陳天表著.....(五角) | 土地經濟學..... | 章植著.....(二元四角) |
| 社會學研究法..... | 蔡敏聰著.....(二角中) | 勞動經濟學..... | 朱通九著.....(二元四角) |
| 日本殖民與人口問題..... | 包慎白著.....(二角) | 中國土地政策..... | 潘楚基著.....(九角) |
| 東亞文化之黎明..... | 汪馥泉譯.....(九角) | 地租論..... | 鄭學稼著.....(一元二角) |
| 農村合作運動..... | 侯哲荃著.....(五角) | 經濟學研究法..... | 朱通九著.....(二角) |
| 合作事業..... | 王世顯著.....(六角) | 西洋五大經濟學家..... | 唐慶增著.....(二角半) |
| 政治學原理..... | 吳友三譯.....(三元八角) | 戰後經濟學的趨勢..... | 朱通九著.....(二角) |
| 近代政治思想史..... | 陸國香等合譯.....(二元) | 最低工資立法的研究..... | 稽學楷.....(二角半) |
| 法制..... | 潘楚基合編.....(八角) | 日本對華經濟侵略..... | 侯厚培合編.....(一元五角) |
| 農政學..... | 張國幹.....(二元) | 日本經濟概況..... | 吳見農合編.....(一元) |
| 法西斯主義與新意大利..... | 董登合編.....(八角) | 統計學..... | 趙爾坪著.....(一元) |
| 憲法原理..... | 吳友三編.....(六角) | 分配論..... | 唐啓賢著.....(一元八角) |
| 經濟學..... | 李權時著.....(六角) | | 伍秉成譯.....(一元) |
| | | | 張業民校.....(角) |

外 交 評 論 社 叢 書 之 二

俄 羅 斯 現 代 史

◁ 此 書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

中 華 民 國 廿 二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初 版

▲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九 角 ▼

譯 者 陶 懋

校 者 吳 頌 皋

原 著 者 G. Vernadsky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市

發 行 者 黎 明 書 局

上 海 南 成 都 路

印 刷 者 黎 明 書 局



\$0.90